

# 目 录

<b>第一章</b>	帝国主义在旧中国投资问题概述 .....	1
<b>第二章</b>	鸦片利润和战争赔款是帝国主义在旧中国投资的 原始资本 .....	6
第一节	英美帝国主义的鸦片走私与利润转化 .....	6
第二节	战争赔款转化为投资 .....	17
<b>第三章</b>	帝国主义对中国金融的垄断及其对中国资金的 诈骗利用 .....	31
第一节	帝国主义金融储蓄机构对中国资金的吸收和诈骗 .....	31
第二节	帝国主义金融势力的侵略活动 .....	42
第三节	帝国主义企业利用中外合资和发行公司债券吸引中国人 的资金 .....	49
<b>第四章</b>	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土地垄断与房地掠夺 .....	56
第一节	帝国主义在中国大城市的土地垄断 .....	56
第二节	美帝国主义利用剩余军用物资掠夺中国房地产的阴谋 活动 .....	72
<b>第五章</b>	帝国主义对中国工矿业的全盘掠夺 .....	76
第一节	帝国主义对中国工业的全盘掠夺 .....	76
第二节	英国对开滦煤矿及法国对求新造船厂的掠夺 .....	87
第三节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及抗战胜利后美帝国主义对 中国工矿业的全盘掠夺 .....	95
<b>第六章</b>	高额利润的榨取 .....	104

第一节	帝国主义在旧中国投资的高额利润	104
第二节	帝国主义对中国工人的压榨	110
<b>第七章</b>	<b>旧中国的国际贸易、国际收支与华侨汇款问题</b>	<b>123</b>
第一节	帝国主义对旧中国外贸的控制和掠夺	123
第二节	旧中国国际收支逆差的弥补与华侨汇款问题	145
<b>第八章</b>	<b>帝国主义在旧中国投资的特征</b>	<b>150</b>
第一节	投资的虚伪性	150
第二节	投资的流动性	161
第三节	投资的垄断性	167
<b>第九章</b>	<b>帝国主义在旧中国投资的没落过程</b>	<b>186</b>
第一节	1931年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投资开始走下坡路	186
第二节	抗日战争开始后英美法在华投资进一步走向没落	193
第三节	抗战胜利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投资的残余	199
<b>附 录</b>	<b>一、各国货币折合率</b>	<b>204</b>
	<b>二、英美帝国主义历年运进中国的鸦片价值表</b>	<b>206</b>

## 第一章 帝国主义在旧中国 投資問題概述

解放以前，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及文化各方面，紧紧地控制着中国的命脉。帝国主义者依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了租界权、駐兵权、开矿权、筑路权、管理关税盐稅权、内河航行权、管理邮政电报权、开办銀行和工厂权、办学和传教权、領事裁判权等等，通过这些特权，它們把中国置于半殖民地的地位，使得我国国民經济陷于破产，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的境地。解放以前在上海一地开设的帝国主义大銀行和企业，有汇丰銀行、花旗銀行、麦加利銀行、有利銀行、德士古火油公司、亞細亞火油公司、怡和洋行、太古洋行、馬勒船厂、上海电力公司、法商水电公司、业广地产公司、沙逊系統房地产公司等等，它們实际上支配着全上海乃至全中国人民的生活。我們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主要被操纵在帝国主义的手里。这种情况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转变过来。从此，我們的国家才真正获得独立，我国人民才真正能够挺起胸膛站立起来。

关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經濟势力究竟有多大，它們对旧中国的政治借款和直接投資的总数究竟有多少，过去有不少外国人曾經对这个問題进行过广泛的調查研究，写了不少书，比較著名的有美国人雷麦所著、1933年出版的《外人在华投資》，日

本东亚研究所出版的《各国对华投资与中国国际收支》，以及日人樋口弘著的《日本对华投资》等。其中雷麦那本书的材料似乎更有权威，向为研究经济问题和国际问题的人辗转引用。雷麦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后任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对中国经济问题是比较有研究的，但由于他完全是一个代表帝国主义利益的资产阶级学者，对事物的观察当然都从帝国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而且，他为了避免叙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残酷侵略，竟歪曲事实，隐瞒真相。例如他谈到对中国的投资时，就不谈鸦片走私；谈到各国对华借款时，就不谈各国的政治阴谋。日本东亚研究所出版的《各国对华投资与中国国际收支》一书，有比较全面的统计数字，它的原始材料来自直接调查。在1940年前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为发动太平洋战争作好准备，实现以战养战，曾由日本军部、大藏省和外务省共同组织了一个规模很大的调查班，专门调查外国人在中国的企业财产，以便太平洋战争一发动即予占有。《各国对华投资与中国国际收支》一书，主要就是这个调查材料的汇集。这本书的统计材料虽然很多，但它的立场、观点、统计方法和对材料的取舍等等，毫无疑问，也同雷麦的著作一样，是代表帝国主义的利益，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书中所有统计数字，都没有从实质上加以分析，而且由于他们没有将1940年前后中国沦陷区通货膨胀的因素除外，故对帝国主义在旧中国投资数字的估计是过高的。

雷麦的《外人在华投资》及东亚研究所出版的《各国对华投资与中国国际收支》二书，可以作为资产阶级学者关于帝国主义在华投资论的代表作。据雷麦估计：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额，“在1931年达324,250万美元。再加上遗漏的数目，总数大约为33亿美元。如果再将各种估计所难免的错误也加以考虑，

則我們認定外人在華投資可靠的總額約在 30 億至 35 億美元之間。”<sup>①</sup> 雷麥還根據帝國主義在舊中國投資的目的及企業性質，列有一張比較詳細的統計表。為便於以後進行分析批判，現先將此表附志於下。

1914 年及 1931 年外人在華投資表

用 途	1914 年		1931 年	
	美金(百萬元)	百 分 數	美金(百萬元)	百 分 數
中國政府普通外債	330.3	20.5	427.7	13.2
運輸業	531.1	33.0	846.3	26.1
交通及公用事業	26.6	1.7	128.7	4.0
礦業	59.1	3.7	128.9	4.0
製造業	110.6	6.9	376.3	11.6
金融業	6.3	0.4	214.7	6.6
地產	105.5	6.5	399.2	10.5
進出口業	142.6	8.8	483.7	14.9
雜項	298.2	18.5	282.8	8.7
租界市政借款			14.2	0.4
總 計	1,610.3	100.0	3,242.5	100.0

根據雷麥分析，這些投資數字，最大部分都操在英、日兩國之手。1914 年時，英國為 60,750 萬美元，占外人在華投資總額的 37.7%；日本為 21,960 萬美元，占總數的 13.6%。1931 年時，英國為 1,189,200 萬美元，占總數的 36.7%；日本為 113,690 萬美元，占總數的 35.1%。英、日兩國合計占投資總額的 71.8%。<sup>②</sup>

又據日本東亞研究所的估計，在 1936 年時，帝國主義在華

① 雷麥：《外人在華投資》，商務印書館 1959 年修訂版，第 41 頁。

② 參閱上書，第 51~55 頁。

投資總額達 250,674.9 萬美元。詳細數字如次表。<sup>①</sup>

1936 年底各國在華投資額(單位：百萬美元)

國 別	投 資 額
日 本	564.377(關內部分,不計東北)
英 國	1,141.624
美 國	287.602
法 國	180.265
德 國	148.523
意 國	72.302
比 國	58.381
其 他	59.675
合 計	2,506.749

上列統計表,都是帝國主義分子站在侵略者的立場,根據侵略者的眼光,為着侵略者的利益而統計出來的虛假數字。各帝國主義國家在舊中國所謂 30 多億美元的賬面投資,實際不外是從販賣鴉片、戰爭賠款、發行債券、掠奪土地並依靠土地增值、掠奪工礦業、壟斷中國進出口貿易進行不等價交換以及高額利潤和利息的積累等等而來的。它們用中國人的錢來榨取中國人的血。它們在中國,事實上只有掠奪、搶劫和榨取,而並沒有什麼真正的投資。

現在就讓我們把帝國主義的投資黑幕揭開來看看吧! 在揭開這一黑幕時,本書所用的材料多是一般報章、雜誌、書籍、年鑑

① 參閱《各國對華投資與中國國際收支》,日本東亞研究所 1944 年版,第 4、72 頁。所列日本的數字,系按照當時的匯率,每日元等於 0.29 美元換算的(原材料為 194,612.7 萬日元)。這僅是關內部分,不包括東北。據日人樋口弘的估計,截至 1936 年底,日本在東北的投資額約達 30 億日元,對中國其他各地共 20 億日元,合計為 50 億日元(參閱樋口弘:《日本對華投資》,商務印書館 1959 年初版,第 17~18 頁)。

之类所习见的社会材料，“但这种社会统计，依然足以揭开黑幕，让我们可以窥见幕内麦杜莎（Medusa）的头。”<sup>①</sup> 让我们看看隐身在“投资”这顶帽子下面的是怎样一个吸吮中国人民膏血的魔鬼！让我们看看隐藏在这顶帽子下面的这个殖民主义魔鬼有着怎样的原形！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初版序，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麦杜莎系希腊神话中蛇发、面貌狰狞的三女魔之一。马克思用来形容资本主义这个怪物的丑恶面貌。

## 第二章 鴉片利潤和戰爭賠款是 帝国主义在旧中国投資的 原始資本

### 第一节 英美帝国主义的鴉片走私与利潤轉化

过去一百多年，英、美帝国主义者对中国最残酷的掠夺办法就是大量販賣鴉片，从中榨取金錢和物資，然后将鴉片利潤之一部分，轉化为各种投資。

在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早期，由于中国对英国出口大量生絲和茶叶，在中英貿易上，英国几乎年年都是入超的，如 1785～1789 年，中国对英輸出为 5,491,509 銀两，英国对华輸出为 3,612,764 銀两，英国入超額为 1,878,745 銀两。当时，英国对这项巨大入超額，是运送白銀来抵償的。

自 1790 年起，英属东印度公司运来的白銀銳减，到了 1830 年以后，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出賣大量匯票所得現金額每年高达二三百萬两。由此情况逆轉，中国反而要向英国运出白銀来抵付收支差額了。在短期內，中英貿易在出入超上所以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全部秘密就在于英帝国主义者采取了犯罪的手段，大量向中国推銷鴉片。这正如馬克思所說：“…… 当中国皇帝为了阻止他的臣民的自杀，对外國人輸入毒品和中国人吸食

毒品，一律加以禁止时，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鴉片和对中国非法出卖鴉片，变为自己財政系統的組成部分。”<sup>①</sup>

早在 1773 年(乾隆三十八年)，英属东印度公司为了弥补中英貿易上的逆差，就接受执行英国政府的对华贩卖鴉片的政策，开始对中国贩卖鴉片。从 1780~1816 年該公司公布的数字为每年对华輸出鴉片計 4,000~5,000 箱。据东印度公司航务长的記錄：1786 年中至少已有二千箱鴉片运入中国，較六年前每年所輸入者，已超过五六百箱。<sup>②</sup> 可见此时鴉片輸入的数量已經相当大了。当时清朝政府感到鴉片压力很大，曾屡次严令禁止輸入，但由于英国鴉片販子狡猾的走私和行賄，以及清政府的腐敗和官吏的貪污，禁令等于具文，实际并未发生什么效力。自 1816 年以后，东印度公司更肆无忌惮地鼓励英国商人向中国大量販运鴉片，因此数量激增，到 1838 年鴉片战争前夕，进口鴉片为 40,200 箱。茲将 1818 年以后鴉片輸入情况列表如下<sup>③</sup>：

1818 年	4,745,000 元
1822 年	8,822,000 元
1825 年	7,608,000 元
1831 年	13,744,000 元
1833 年	12,875,000 元
1834 年	13,964,185 元(21,785 箱，每箱以 641 元折算)
1837 年	25,000,000 元
1838 年	25,768,200 元(40,200 箱，每箱以 641 元折算)

由于鴉片大量进口，白銀滾滾流出，情形日趋严重，这才引

① 《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国》，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第 2 版，第 83 頁。

② 參閱范文瀾：《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第 9 版，第 5~6 頁。

③ 參閱上书，第 5~7 頁。

起了清政府的恐慌。1838年鴻臚寺卿黃爵滋奏折称：“粵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用扒龙、快蟹等船运銀出洋，运烟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1823~1831年——引者），岁漏銀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銀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漸漏至三千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江、浙、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以中国有用之財，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漸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sup>①</sup>黃爵滋这篇奏折，充分反映了当时鴉片流毒与病国害民之严重；虽然，他所列举的銀数不甚确实，但白銀外漏之危险由此可见一斑。清政府从統治阶级利益出发，也不能不申令严禁。英国殖民主义者看到鴉片利潤这样优厚，自然不肯放弃这种买卖，于是变本加厉，竟不惜用战争手段来达到推銷鴉片的目的。鴉片战争遂由此发生。

鴉片战争的結果，中国失败，除割地賠款外，并开辟广州、厦門、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这样就更为英国侵略者販运鴉片开了方便之門。

从1840~1857年，鴉片的年进口量从20,619箱增至72,300箱，引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恨。尤其在广东方面，群情激憤，反抗侵略的空气更加浓厚。广州爱国人民組織了平英团、升平社学等群众爱国团体，一方面反对清政府，同时也坚决抵抗英国的侵略。此时，英国侵略者便借口“亞罗号”事件于1857年联合法国共同发动了第二次鴉片战争，迫使清朝政府于1858年签订了比南京条約更可耻的天津条約。天津条約的主要内容是：(1)

---

<sup>①</sup> 齐思和等編：《鴉片战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新1版，第463頁。

各国公使駐北京，用平等礼节。(2)开放牛庄、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等处为通商口岸。(3)耶穌教和天主教可入內地自由传教。(4)外国人得在內地旅行通商。(5)中国人和外国人涉訟，由領事会同中国官員审判。(6)修改稅則，減輕商船吨稅。(7)外国商船得駛入长江各口岸通商，外国兵船得在各通商口岸游弋。(8)对英国賠款 400 万两，对法国賠款 200 万两。(后来北京条約英法賠款又各增加 800 万两。)(9)各国都享受最惠国待遇。天津条約除上列各条款外，还正式承认販运鴉片为合法貿易，改用“洋药”名义进口，每担仅收稅銀 30 两。

自鴉片成为公开貿易的商品后，每年进口都在 5 万箱至 7 万箱之間，鴉片貿易金額每年都在 3,000 万两左右，鴉片进口額占进口商品总額的 30% 以上。例如 1870 年进口貨总值 6,900 万两，其中鴉片占 2,600 万两；棉布、毛織品、五金、煤、煤油、米及其他雜貨共 4,300 万两。又如 1880 年，进口貨总值为 7,900 万两，鴉片进口額为 3,200 万两，棉布、毛織品、五金、煤、煤油、米等进口額为 4,700 万两。由此可见进口貨中鴉片所占比重之大。<sup>①</sup>

现在我們再来看看当时整个中英貿易的輸出輸入額。中国对英輸出額，計 1818 年为 14,144,000 元，1825 年为 14,401,000 元，1833 年为 17,814,000 元。英国对华輸出額，計 1818 年为 16,004,000 元，1825 年为 15,932,000 元，1833 年为 22,304,000 元。<sup>②</sup> 从 1818 年至 1833 年这 15 年間，英国对华輸出額增加 630

① 參閱范文瀾：《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第 9 版，第 215 頁。

② 參閱上書，第 4 頁。中国对外貿易的貨幣單位，1856 年以前，一般以銀元為單位；1856 年后，以兩為單位。銀元含有純銀 874 又 1/2 厘，兩含純銀 525 厘。

万元，中国对英輸出增加 367 万元。同一时期中，英国对华的鴉片輸出額惊人地增加着：从 1818 年的 474.5 万元增加到了 1833 年的 1,287.5 万元。換句話說，就是在 1833 年英国对中国輸出總額 2,230 万多元中，有将近 1,300 万元是靠輸出鴉片取得的，只有 900 万多元属正当貿易品如棉布、五金之类。同一年，中国对英輸出額为 1,781 万多元，輸出貨物都是絲茶等等。当时如果不是有大宗鴉片进口，中国可以出超約 881 万元，但由于有鴉片进口，反而入超約 449 万元，要以白銀去抵充。

自 1840 年第一次鴉片战争到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 75 年間，英美等国販运到中国来的鴉片价值逐漸增加，尤其是 1848 年以后，逐年增加到 2,000 多万乃至 5,000 多万銀两。根据已有的材料，鴉片战争以前 1816~1837 年度的鴉片进口总值为 188,514,393 元，（缺 1835~1836 年度。1838、1839 年度数字也未統計在內。）約折合 132,756,600 两。鴉片战争后 1840~1914 年間 75 年中的 52 年（有 23 年材料缺，可參閱本书附录二“鴉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历年运进中国的鴉片价值表”）鴉片进口总值为 1,624,639,249 两，平均每年进口鴉片額为 31,243,062 两。根据推算方法，缺材料的 23 年，也以每年进口值 31,243,062 两計，23 年的推算数字为 718,590,426 两。这样，从 1840~1914 年間 75 年的鴉片进口总值为 2,343,229,675 两。加上鴉片战争前 1816~1837 年間的进口額 132,756,600 两，合計为 2,475,986,275 两。再加上 1816 年前以及 1914 年后的进口額，历年运进中国的鴉片总值，至少为 25 亿銀两。

英国侵略者是怎样經營鴉片这项罪恶买卖的呢？馬克思在《鴉片貿易》一文中說过：“英国政府以帝国政府的資格，假装着与鴉片貿易全无关系，甚至訂立禁止这种貿易的条約。可是它

以印度政府的資格却又強迫孟加拉省種植鴉片，使該省的生产力受到極大的損害；它強迫一部分印度農民種植鴉片，用整款辦法引誘另一部分農民也去種植，用嚴格壟斷的辦法操縱這種毒藥的大規模製造，派遣大批的官方偵探來監視以下的全過程：種植鴉片，把它交到指定地點，熬制得使其適合中國吸食者的口味，裝入特別便於走私的箱中，最後運往加爾各答，由政府標價拍賣，把它從國家官吏手中移交給投機商人，然後轉入走私商人的手中，運入中國。英國政府在每箱鴉片上所花的費用約及250盧比，而在加爾各答拍賣市場上却按每箱1,210至1,600盧比的价格出售。”<sup>①</sup> 馬克思這段敘述，把英國政府種植和販賣鴉片的罪惡，赤裸裸地揭發出來了。英國政府和鴉片商人以每箱250盧比代價的鴉片（每盧比的幣值等於3兩5錢，中國兩約四錢，250盧比約折合100兩）運到中國販賣，每箱價平均以500兩計，每箱暴利近400兩，即以五分之一“成本”，攫取五分之四的暴利。照此計算，英美等帝國主義歷年運進中國的鴉片總值25億兩，其淨利也達20億兩。這被林則徐稱為“傷天害理”、“人神共憤”的販毒行為；甚至連英國人蒙哥米爾·馬丁也認為很不道德，說出了如下一段十分憤慨的話：“不用說，‘奴隸貿易’比起‘鴉片貿易’來，還是仁慈的。我們並不會毀滅非洲人的肉體，因為使他們繼續活下去是合乎我們的直接利益的；我們並不會敗壞他們的本性、毒害他們的智慧，也不會毀壞他們的心靈。但是販賣鴉片者在使不幸的人們的精神本質腐化、墮落和毀滅以後，還毒殺他們的身體，而每時每刻都向貪欲無厭的吃人神貢獻新的犧牲者。英國的殺人犯與中國的服毒自殺者互相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版，第87頁。

竞争，向吃人神的神座上贡献祭品。”<sup>①</sup>

英国鸦片贩卖者从贩卖鸦片中得到的暴利，除了换取中国的土产品和白银以外，还剩下部分在中国通商口岸运用，美其名曰“投资”，以便对中国人民进行更深入骨髓的剥削。英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开设的一些大企业，不论金融资本、工商业资本、房地产资本或交通运输业资本，都和鸦片贸易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如怡和、太古、沙逊及哈同等大资本集团，众所周知，原来都是大规模贩卖鸦片的商行，怡和洋行的创办人渣甸和孖地臣（即马特逊），就是两个大鸦片贩子。怡和洋行从1843年在上海设行起，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止，一百年间，始终是上海的大垄断资本，经营着各种企业如纱厂、轮船公司等，而它的资本原来都是从贩卖鸦片积累起来，它的发展是建筑在毒杀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的基础上的。它开始仅贩卖鸦片，后来为了便于走私偷运，便兼营航业；航运发达了，再办船厂及其他工厂。沙逊家族则是世代相传的鸦片商和地产商，从贩卖鸦片发大财后才陆续开办银行及投资地产的。哈同原来在沙逊洋行工作，日子久了，看到沙逊经营鸦片和地产大发其财，他也学会了沙逊那一套，自己经营鸦片和地产，从此生财有道，不过三四年间，即成为上海著名的大富翁，到1931年他死的时候，单单每年的房地租收入就达250万两规银。至于操纵中国经济命脉几十年的汇丰银行，是新旗昌洋行、太古洋行、老沙逊洋行、怡和洋行、天祥洋行、太平洋行、泰和洋行、亚细亚火油公司、和记洋行、仁记洋行等与鸦片买卖关系最深的十家英商合资开办的。1865年汇丰银行开办时，资本250万港币中极大部分都是从鸦片资本中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版，第81页。

轉化过来的。因为当时正值第二次鴉片战争結束，鴉片大量进口，英国鴉片販运者手中积累了大量现金正愁沒有出路；另外，那时也正值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李鴻章、左宗棠等忙于鎮压捻軍起义，清政府庫存如洗，急需借外債来維持軍餉，英帝国主义看到这种情况，便将英商組織起来，开办汇丰銀行，作为对清政府貸款的机构。汇丰銀行成立后，即用高利貸形式对清政府貸款，一方面支援清政府鎮压农民革命，借此取得优越的政治条件；另一方面，可以趁机漁利，在經濟上取得种种特权。如1866年借給左宗棠的500万两貸款，年息竟达8厘，而且还要以稅收作抵。同时汇丰銀行还凭借英帝国主义的威势，在业务經營上先后取得了四种特权：(1)发行鈔票权；(2)壟断外汇权；(3)關稅、鹽稅的保管权；(4)吸收存款权。自此，汇丰銀行便借发行鈔票、吸收存款、保管關鹽兩稅以及壟断外汇等謀取暴利，資力日益雄厚，成为一个庞大的壟断金融資本，在我国北京、天津、漢口、廣州、福州、廈門等十六个城市設有分支机构，直接控制我国的經濟命脉。

此外，英帝国主义还把庞大的鴉片利潤及由鴉片利潤壮大起来的金融資本，大量轉化为政治借款和鐵路借款，即所謂間接投資。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对清政府的鐵路借款，中英公司占了絕大部分。这个中英公司是誰創設的？原来就是大鴉片販子怡和洋行和汇丰銀行于1898年合資設立起来，专为对中国进行鐵路投資的；是英帝国主义控制了我国沿海和內河的水路交通之后，企图进一步控制我国鐵路交通的工具。怡和洋行的最初創办人渣甸，原来是东印度公司的医生，早在1820年以前就开始由印度走私鴉片到中国来，是一个最疯狂的鴉片走私犯。此

人机詐百出，冒險成性，当时广州人都称他为“鉄头老鼠”。1828年，他与另一鴉片走私商人孖地臣合伙經營渣甸·孖地臣公司（即怡和洋行），<sup>①</sup> 大规模进行鴉片走私。他們不但在广州推銷鴉片，而且沿海北上，一直到渤海灣一带。早在1837年，許球的奏折中即曾大力检举过渣甸为非作恶、猖狂无忌的活动情形。林則徐尤其痛恨这个恶棍，他說：“鴉片之到处流行，实以該夷为祸首。”总之，过去一百多年中，英帝国主义在中国形成的垄断資本，实以疯狂走私鴉片起始，怡和、沙遜两集团的发展过程即是很好的証明。因此，我們說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所謂企业投資、政治借款、鉄路借款等等，极大程度上都是鴉片利潤的轉化，是完全有事实根据的。

美帝国主义者也是販毒凶犯，其罪恶决不輕于英国，只是他們比英帝国主义者更狡猾詭譎，一双血淋淋的手，常常被帶上白手套掩飾起来。美国資本家豢养的传教士，过去曾在中国大力作过宣传，說什么販賣鴉片，仅是英国人的罪恶行为，美国人是不干这行生意的。但客观存在的事实，是无法抵賴的。例如1858年在中英天津条約上把鴉片改称“洋药”使其进口合法化这一重大罪恶，就是美国駐华公使列卫廉干的阴險勾当，他在这件事上，同英国侵略者做到了最“真誠的合作”。美国人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上說得比較坦率：“在这种貿易中，除去其他国家的人民之外，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同样地参加进去了，虽然由于机会的不同而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英国人主要是从加尔各答販运孟加拉鴉片，但也經營一些麻洼的鴉片。……美国人从

---

<sup>①</sup> 參閱陈真等編：《中国近代工业史資料》第2輯，三联书店1958年第1版，第53頁。

英国商人和銀行家的委托中收到大量的孟加拉和麻洼的印度鴉片；但是他們自己也开辟了一条鴉片貿易的支路，而在这条支路中直到一八三四年英国人是被排挤的。他們販运土耳其鴉片，有时直接在士麦拿购买，但更通常的是从伦敦的保稅倉庫中购买，輸入广州与麻洼鴉片竞争……。”<sup>①</sup>

美国人摩理逊在其所著《麻塞諸塞海洋史》一书中也承认：“自从这个世紀的开始，貝金斯洋行以专販斯迈拉烟土入华为业。約瑟夫庇宝蒂及每个波士頓或沙伦的商人，都是如此……由悬挂英国旗船只而运华的鴉片，也有一部分为美商旗昌公司及赫尔特公司所有。不到数年即有波士頓的飞剪式船一队……在中国海岸以零丁島为据点，专门包揽鴉片走私，……在广州有一个小商行，是一个沙伦水手及木匠开设的。他們知道中国人尊重死者，将大批鴉片，装入若干棺木之内，冒称船上水手死尸，抬入陆上发售。”<sup>②</sup>美帝国主义者无耻到用这种手段来走私鴉片，他們还有什么嘴臉說他們的手很干净呢？摩理逊在同一书上又說：“就是基督教的传教师都不反对此項貿易（指鴉片貿易——引者）。他們乘坐販运鴉片的飞剪式船来到中国；他們也从販运鴉片的公司及商人手中接受捐贈，他們都說，鴉片无害于中国人，象酒的无害于美国人一样。”<sup>③</sup>从这几句話中，基督教传教士們的伪善和丑恶完全暴露了！整个十九世紀，美国沒有停止过販毒行为。1880年11月22日，美国駐天津副領事毕德格給駐华公使的报告內承认：“美国商人过去是参加这一貿易的，在今

① 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第1版，第235～236頁。

② 轉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2年初版，第37頁。

③ 轉引自上书，第39～40頁。

天，美国的船只还是把鴉片在中国到处販运，……所以，作为在华外人來說，由于享有自由販卖鴉片的权利，美国人与英国商人是同样地不名誉的。”<sup>①</sup>

中美間的早期貿易，中国輸到美国去的貨物价值，远超过美国輸到中国来的貨物的价值，其中差額，美国都要用白銀来抵充。但自1820年以后，美国侵略者采取非法走私的手段，用輸出鴉片来弥补中美間的貿易逆差，不再把白銀运到中国来。据一位大规模从事鴉片走私的美国商人說：从1827~1830年，美国人每年銷售鴉片1,200~1,400担，在中国人心中，美国人与土耳其鴉片是分不开的。1840年以前，由美国輸入中国的鴉片，相当于美国对华輸入总值的十分之一。但这仅仅是公开的数字，实际情况誠如美国人自己所說：“在那时，美商与鴉片貿易的关系，远較統計数字所表示的为深密。这项买卖的存在就給予他們一直接利益，因为这项貿易可使美商不必再向中国輸入現銀，所以用伦敦的匯票代替了。鴉片的銷售量越来越多，英美以及其他洋商，可以用卖鴉片的款項买进貨物，而不必用現銀了。在鴉片貿易的这一方面，美商所得好处远較任何其他国家的商人为多。从1820年后，美国皮毛的出产日少，美国的紡織业方在幼年时期，……当时美国商人的資金仍是比較短少，金銀的供应是有限的。因之，鴉片貿易，与販运奴隶釀酒的买卖相同，成为許多美国大資产的基础。”<sup>②</sup>这就是說，美国大資产阶级的發展，走私鴉片是重要基础之一。美国人走私鴉片的暴利，除

① 轉引自卿汝焜：《美国侵华史》第2卷，三联书店1956年第1版，第498~499頁。

② 齐思和等編：《鴉片战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新1版，第278頁。

了抵償其貿易逆差外，有一部分留在中国轉化為其他企業的資本，也有一部分被他們匯回美國作為發展美國資本主義的資本。因為十九世紀初期，正值美國資本主義開始猛進，迫切需要資金。例如，1844年美國侵略者派來中國的特使——帶着艦隊迫使清朝政府訂立望廈條約的顧盛，就是一個大鴉片販子，他早年在廣州貝金斯洋行走私鴉片30年，是在華最有財有勢的奸商；到1830年，他以巨富身分，腰纏萬貫，帶着中國仆役多人回美，大事經營工商業。正因為他有了錢，後來才當選為國會議員，並“榮膺”為遣華特使。

英美帝國主義者是一丘之貉，都是鴉片走私犯，他們販賣鴉片毒物來抵償自己的貿易逆差，來掠奪中國的物資財富，這種傷天害理絕滅人性的作法，不僅造成了中國人的不幸，而且真正在人類歷史上犯下了滔天罪行！

總之，英美帝國主義的所謂在華企業投資，肯定其全部都是由鴉片利潤轉化而來的亦無不可。前面我們估算過，過去英美等國走私到中國來的鴉片總值約為25億銀兩，合為19億美元。即使照雷麥的估計，英國1931年的所謂在華投資額為118,920萬美元，美國1931年為19,680萬美元，兩者加起來也遠不及輸入鴉片之數。

## 第二節 戰爭賠款轉化為投資

帝國主義對華侵略，大體上可劃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自鴉片戰爭開始，直到1900年的義和團之役。在此期間，英、美、法、德、俄、日等國主要是武裝進攻，為更大規模的掠奪創造

政治条件，而英、美两国除武装进攻外还大量贩卖鸦片，作为进行经济掠夺的资本。第二个时期，是辛丑条约订立后，各国以贩卖鸦片所得暴利及大量的战争赔款，更转变为大规模的直接投资，它们以不平等条约作为护符，从经济上来控制中国的命脉和榨取高额利润。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00年的义和团之役，这60年间，有过1856~1861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以及1900年英、美、法、德、俄、日、意、奥八国发动的所谓“八国联军”的进攻（即义和团之役）。60年间，各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发动多次侵略战争，而每次战争的结果，都是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一次不平等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果，订立了中英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订立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及北京条约。中法战争订立了中法天津条约。甲午中日战争，订立了马关条约。义和团之役，订立了辛丑条约。由于帝国主义者先后迫使清朝政府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中国堂奥大开，帝国主义者升堂入室，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进行着种种压榨与摧残。在这些条约中，清政府除被迫承认了许多不平等条款、开辟了許多租界和割让了土地外，还被勒索了大量赔款，为帝国主义提供了在中国进一步从事掠夺的资本。当时主要赔款数额如下表：

鸦片战争赔款	21,000,000元(约合15,110,000两)
第二次鸦片战争赔偿英、法款	16,000,000两
帝俄伊犁事件赔款	约6,000,000两
中日甲午战争赔款	230,000,000两(包括退回辽东半岛的勒索款3,000万两)
另甲午赔款利息	约80,000,000两
义和团之役的庚子赔款	450,000,000两

庚款利息	約 530,000,000 兩
共 計	約 1,277,000,000 兩

庚子賠款，照原條約規定為 45,000 萬兩。按 4 厘利息計算，分 39 年付清（到 1940 年），本息共計 98,000 余萬兩。賠款還要付息，這種苛刻條件，世所少見。此外每年用銀兩折合外幣付款的虧損約合 300 萬兩。當時，這筆賠款雖由外國公使團指定海關稅、內地關稅及鹽稅三項作為賠款來源，但這些稅款除抵償舊債外，遠不足繳付這筆巨大賠款，因此，清朝政府每年都向各省攤派 2,000 多萬兩充作賠款之資，弄得各省山窮水盡，羅掘俱空。當時帝國主義之榨取這筆巨款，實含有最險毒的政治陰謀。因為義和團之役，最充分地表現了中國人民不可侮的精神。當時連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也不得不承認說：“……吾人在此却有一事不應忘去者，即中國領土之內，……共有人口四萬萬，均屬於一個種族；並且不以宗教信仰相異而分裂，更有‘神明華胄’之自尊思想，充滿腦中。此外更有一事，亦復不應忘去者，即吾人對於中國群眾，不能視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實際上，尚含有無限蓬勃生氣；更加以備具出人意外之勤儉巧慧諸性，……則余相信中國前途，尚有無窮希望。”<sup>①</sup> 帝國主義者發現“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實為下策”（瓦德西對海辣特訪員談話）。<sup>②</sup> 由於帝國主義感到無法用武力征服和統治中國，他們乃想出經濟壓榨的狠毒手段，用巨大的賠款榨取中國人民的膏血，

① 翦伯贊等編：《義和團》第 3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新 1 版，第 86 頁。

② 轉引自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冊，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第 9 版，第 398 頁。

迫使中国山穷水尽，永远不得翻身。这就是庚子赔款如此苛刻之真因。这笔赔款之俄国部分，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苏联政府即宣告停止收受。德国部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7年2月后）也停止支付。美、英两国曾假惺惺作态，先后申明自愿放弃一部分赔款，但附有条件，即应将退款作为文化教育经费，由中美两国及中英两国共同派员组织基金保管委员会，款项由该会自由支配。一向由美帝走卒胡适把持垄断的“中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及“中英庚款委员会”，就是这样设立起来的。所谓“基金委员会”，实际上是美英帝国主义分子操纵的、便于他们进行奴化教育与侵犯中国教育主权的机构。通过这个机构，他们可以直接干涉中国若干大学和科学文化研究机关的行政和人事。帝国主义者除了获得以上巨额赔款外，在战争过程中，凡是被其占领过的地方，都遭受了蹂躏和浩劫。譬如北京两次淪陷敌手，就遭受了两次大规模的抢劫，我国数千年积存下来的珍贵艺术品和财宝几被掠夺殆尽。

关于帝国主义把战争赔款直接间接转化为投资的情况，只要我们将各个时期帝国主义者向我国勒索到的赔款数同它们在我国的投资数作一对比，就可了如指掌。现在我们分两个时期来进行对比。

第一个时期，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4年中日战争。这个期间，英法帝国主义向中国勒索的赔款，计有第一次鸦片战争南京条约规定的对英赔款2,100万元（约1,511万两）；第二次鸦片战争对英法赔款1,600万两。另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在广州勒索了600万元，到宁波抢走白银17万元，勒索军费120万元。英军攻占上海时，向上海居民勒索了50万元。英军攻占镇江、瓜州时又勒索了300万元。两次鸦片战争英、法帝国

主义向我国索去的赔款及帝俄伊犁事件赔款共計約4,300万两。它們在战争过程中的搶劫和攻占北京时的大掠夺，尙未計算在內。

那么，从1840~1894年間，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所謂“投資”究竟有多少呢？我們可分两方面来談：一为它們的企业投資；一为它們对清朝政府的政治借款。企业投資方面，在这一时期的数字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当时帝国主义在中国还没有取得設置工厂权，只有少数非法設立的小工厂，一般还着重于商业的掠夺，而且主要是英国由鴉片利潤轉化过来的商业企业，如洋行、銀行、航运机构之类。当时它們在中国設立的企业单位，包括公用事业、加工工业、机器繅絲业、船舶修造业等，共計104个单位，其資本額总計为19,724,000元。<sup>①</sup>同一时期，各国对清朝政府貸款有12笔，合計約3,600万两。<sup>②</sup>但这些貸款，在1894年前也都已将本息还清。

根据这个对比，可见这个时期帝国主义对华的政治貸款，全部是战争賠款和掠夺的轉化，其企业投資部分則主要是鴉片利潤的轉化。当时無論企业投資或政治借款，都是以英国为主。因为这一时期的战争賠款和鴉片利潤也以英国所得最多。

第二个时期，从1894年中日战争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这一时期，有两笔最大的战争賠款：一为甲午战争的对日賠款23,000万两，另加利息約3,000万两；一为庚子賠款45,000万两，加利息53,000多万两。其中对日賠款是全部付

---

① 參閱孙毓棠編：《中国近代工业史資料》第1輯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234~247頁。

② 參閱賈士毅：《國債与金融》，商务印书館1930年版，外債編，第4頁。

清，由日本帝国主义独得的。庚子赔款，则由十多个国家分赃，但以英、美、法、俄、日、德六个帝国主义强盗所得占绝对多数。其分配情况如下表：

庚子赔款分配额及百分比①

国 别	各国分配额(海关两)	折成各国货币	占百分比
英 国	50,620,545两	7,593,081.750镑	11.24901
美 国	32,989,055两	24,440,778.810美元	7.31979
法 国	70,878,240两	265,793,400.000法郎	15.75072
意 国	26,617,005两	99,813,768.750法郎	5.91489
日 本	34,793,100两	48,953,891.700日元	7.73180
比利时	8,484,345两	31,816,293.750法郎	1.88541
葡萄牙	92,250两	13,837.500镑	0.02050
西班牙	135,815两	507,431.250法郎	0.03007
德 国	90,070,515两	275,165,423.325马克	20.01567
奥 国	4,003,920两	14,394,093.400克勒尼	0.88976
荷 兰	782,100两	1,404,651.600佛乐林	0.17380
帝 俄	130,371,120两	184,084,021.440卢布	28.97136
瑞典、挪威	62,820两	9,423.000镑	0.01396
杂 费	149,670两	22,450.500镑	0.03326
合 计	450,000,000两		100

庚子赔款的支付是从1902年开始的，规定到1940年付清。其付款数额各期不同②：

① 贾士毅：《国债与金融》，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外债编，第41~43页。百分比由引者计算的。

② 参阅刘秉麟编著：《近代中国外债史稿》，三联书店1962年第1版，第30页。

1902~1910年每年支付	18,829,500两
1911~1914年每年支付	19,899,300两
1915年付	23,283,300两
1916~1931年每年支付	24,483,800两
1932~1940年每年支付	35,350,150两
支付本息总数	982,238,150两

从1902~1914年的庚子赔款，是全部按照规定付出的（1908年后，美国表面上虽退回了一部分，但实际上轉为由它支配的文化侵略經費），付款額包括鏹亏，大致为29,000万两。现在我們把这笔庚子赔款和对日赔款本息約26,000万两加起来，合計为55,000万两。而同一时期，各国借給清朝政府及北洋軍閥政府的10笔主要政治借款和12笔鉄路借款的实收总数約73,090万两，二者仅相差約18,090万两。但我們不能忘記，在同一时期，还輸进了6亿銀两以上的鴉片！（关于借款数字，可参閱本书第八章材料。）

日本帝国主义对华投资的原始資金，很明显主要来自甲午战争的約26,000万两赔款本息。另外在庚子赔款中，日本又分得了34,793,100两，連同利息共約7,600万两（折合106,854,177日元）。这些巨額赔款，不仅滋养了日本資本主义的发展，而且培植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經濟侵略，扩大了它的所謂“对华投资”。据日本前外务相井上馨說：“在这笔赔款（指甲午赔款——引者）以前，日本財政部門根本料想不到会有好几亿的日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这里有三亿五千万日元滾滾而来，无論政府或私人都頓觉无比地富裕。”<sup>①</sup>井上

① 轉引自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版，第307~308頁。

这段話，真正表露了日本侵略者的心情。单单甲午战争赔款，就等于当时日本国家財政四年半的收入。这是对中国多么巨大的一笔掠夺和榨取啊！日本帝国主义除利用这些赔款之一部分加速发展其本国的工业外，并利用馬关条約所取得的在华設厂权，以赔款的大部分直接在中国大量開設矿厂。在甲午战争以前，日本在中国根本談不到什么投資，只有微小的普通貿易往来。1893年日本对华貿易額总数不过4,900万日元。但中日战争后，由于日本得到了一笔庞大赔款，形势大变，开始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經濟侵略。首先，日本的国家銀行——橫濱正金銀行，于1896年在香港、1899年在天津、1900年在牛庄、1902年在北京陸續設立分行，台灣銀行于1900年在厦門設立分行，日本帝国主义就用这些銀行分支机构作为对中国进行經濟侵略的金融調度机构，也就是作为所謂对华投資的負責机构。例如，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兼并我国当时最大的鋼鉄企业——汉冶萍公司，就由日本兴业銀行和正金銀行等采取放高利貸的形式，大量貸款給汉冶萍公司，計从1902年到1913年这一期間，貸款达17笔之多，总金额达3,800多万日元，息率都在6厘以上，有的甚至高至8厘，而且借款条件苛刻，规定以汉冶萍的鉄矿砂低价卖給日本鋼鉄所作原料为交换条件。

现为說明日本帝国主义获得中国赔款增强資力以后，又通过国家銀行以貸款投資形式进一步掠夺中国資財的事实，特将最有代表性的橫濱正金銀行等对汉冶萍公司的貸款情况列表于下<sup>①</sup>。（关于日本企图兼并汉冶萍的經過，可参閱本书第五章。）

---

① 参閱汪敬虞編：《中国近代工业史資料》第2輯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120頁，“汉冶萍公司所借日債統計”表。

### 横滨正金銀行等对汉冶萍公司的貸款表

(1902~1913年)

时 期	出 借 銀 行	数 額	总 率
1902年	大仓組	250,000日元	8厘
1904年1月	日本兴业銀行	3,000,000日元	6厘
1905年	大仓組	2,500,000日元	
1908年6月	正金銀行	1,500,000日元	7厘
11月	正金銀行	500,000日元	7厘
1910年9月	正金銀行	1,000,000日元	6.5厘
11月	正金銀行	1,227,125日元	6.5厘
1911年3月	正金銀行	6,000,000日元	6厘
1912年2月	正金銀行	120,000两	7厘
2月	正金銀行	3,000,000日元	6厘
6月	正金銀行	500,000日元	6.5厘
12月	正金銀行	2,500,000两	6厘
	正金銀行	207,567日元	
	台灣銀行	154,097日元	
	三井物产会社	1,000,000日元	
1913年12月	正金銀行	6,000,000日元	6.5厘
12月	正金銀行	9,000,000日元	7厘

日本帝国主义除利用战争赔款扩大金融势力作为对华侵略的开路先锋外，在航运业和制造业方面也接踵而来。日本邮船会社于1896年开辟欧洲航线和澳洲航线，均以中国沿海港口为重要寄港。1896年大阪商船会社在日本政府直接补助和支持下，开辟了中国内河航线——长江航路；1899年大阪商船会社得到台湾日总督之补助，又开辟了通航中国南部的航线。1907年日本政府将原航行于长江的日本邮船、华南汽船、大东汽船等合并组成日清汽船会社，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垄断中国航运业之专业机构。从此，这个日清汽船会社就与英国的怡和、太古以及中国的招商局形成鼎足而立之势，它的船只经常航行于中国沿海港口及长江各口岸。此外，日本在上海的两个纺织业托辣斯——

上海紡績株式會社和內外棉廠，也都是在1902年以後，先後兼併或收購了中國的興泰紗廠（1902年被收購）、大純紗廠（1905年被租辦）和三泰紗廠（1908年被併入興泰）等等而逐漸擴展起來的。後來，日本帝國主義在上海的棉紡業所擁有的紗錠竟達100萬錠以上，幾占上海棉紡業之半數。至於日本在中國最大的壟斷企業——南滿鐵道公司，1906年創設時資本額2億日元，到1930年時，除歷年發放的巨額紅利和股息外，企業財產竟達8億多日元。這個壟斷企業的基础南滿鐵路，雖然是日本帝國主義在日俄戰爭後從帝俄手中取得的，但全部企業設在中國，作為日本在華投資而論，我們也可以說它是凭借戰爭手段和戰爭賠償暴發起來的。現將日本帝國主義運用戰爭賠款在中國開設起來的49家廠礦企業列表於下<sup>①</sup>：

廠 礦 名 稱	資 本 額 (單位千元)	設 廠 年 份	廠 址
雲龍軋花廠(中日合辦)	140	1897年	上海
上海紡績株式會社一廠	425	1902年	上海
江南制革廠(中日合辦)	210	1904年	上海
商務印書館(中日合辦)	1,000	1904年	上海
上海絹絲公司(中日合辦)	559	1905年	上海
日信豆粕第一工場	530	1905年	漢陽
上海紡績株式會社二廠	839	1905年	上海
日信豆粕第二工場	487	1906年	漢口
營口水道電氣株式會社(中日合辦)	487	1906年	營口
日清燐寸株式會社	202	1906年	長春
牛莊小寺油坊	1,558	1906年	牛莊
秋田商會制材部	420	1906年	大連
滿洲制粉株式會社	1,000	1906年	鐵嶺
東亞制粉株式會社	487	1907年	漢口
九成紗廠(中日合辦)	461	1907年	上海

① 汪敬虞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上冊，科學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7~13頁。

厂 矿 名 称	资 本 额 (单位千元)	设 厂 年 份	厂 址
满铁沙河口工场	640	1907年	大連
满铁煤气工场	594	1907年	大連
西森造船所	148	1907年	大連
满铁辽阳工场	251	1907年	辽阳
川崎船厂大連分厂	500	1908年	大連
小野田水泥株式会社	1,000	1908年	大連
大連电灯厂	2,595	1908年	大連
日薄豆粕制造株式会社(中日合办)	892	1908年	大連
大矢粗精米所	123	1909年	大連
滿洲石硷株式会社	307	1909年	大連
三泰油坊	357	1909年	大連
东亚烟草株式会社	1,227	1909年	营口
长春电灯厂	539	1909年	长春
奉天电灯厂	410	1910年	沈阳
小寺油坊	238	1910年	大連
内外棉株式会社第三厂	750	1911年	上海
斋藤油坊	118	1911年	大連
安东电灯厂	153	1911年	安东
鉄岭电灯厂(中日合办)	130	1911年	鉄岭
鴨綠江制材厂(中日合办)	105	1912年	安东
大連制冰株式会社	523	1912年	大連
开原电灯厂	249	1912年	开原
辽阳电灯厂(中日合办)	125	1912年	辽阳
内外棉株式会社第四厂	1,339	1913年	上海
北满制粉会社	132	1913年	哈尔滨
安东自来水厂	233	1913年	安东
安东煤气公司	106	1913年	安东
大連寺儿沟油坊	400	1913年	大連
滿鉄印刷厂	143	1913年	大連
中和公司(中日合办)	200	1905年	吉林天宝山
撫順煤矿	656	1907年	奉天撫順
博东公司(中日合办)	92	1908年	山东博山
本溪湖煤矿公司(中日合办)	2,000	1910年	奉天本溪湖
彩合公司(中日合办)	100	1911年	奉天本溪湖

由上表可見日本的在华企业，全部都是甲午战争以后設立起来的，是运用战争赔款发展起来的。而且这49家企业中，有14家是中日合办，利用中国人的資金扩大企业经营以加紧对中国的經濟侵略的。

当然，我們在这里不能生硬地理解为一笔赔款就等于一笔借款。借款方面英国最多，它除了用赔款轉化为借款外，它的鴉片利潤也可轉化为借款。所得赔款最多的是日本，但它并不是将全部赔款都又用来借給中国，而用一部分发展其国内工业及作为在华企业投資等等。所以，战争赔款、鴉片利潤轉化为政治借款及企业投資之間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不能很生硬地来理解。

至于从1914~1936年間，帝国主义对华貸款的数目，更远不及中国在这时期所支付給帝国主义的赔款本息及借款息金，在这期間，实际上是中国多付出去了2亿多元。其情况可从下表証明①：

### 旧中国对外借款及支付赔款本息与借款息金对照表

(1914~1936年，单位：千元)

年 份	借 入 款 数	支 出 款 数	收 支 相 差 額
1914~1930年	97,000	70,900	(+) 26,100
1930~1931年	—	114,400	(-) 114,400
1933~1936年	310,000	440,800	(-) 130,800
合 計	407,000	626,100	(-) 219,100

根据以上分析，帝国主义的所謂对华貸款主要是赔款的轉化，跃然可見。其中有些所謂貸款，則根本就是將到期未予支付

① 參閱銀行学会編印：《民国經濟史》，銀行周報社1948年初版，第270頁。

而須延期支付的賠款更名為貸款的。

此外，在抗日戰爭期間英、美對華戰時貸款問題，也擬在這裡附帶說明一下。從1937～1945年，美英兩國對華戰時貸款已經公布的計有美國戰時貸款8筆，合計為74,780萬美元；英國戰時貸款共7,550萬英鎊。<sup>①</sup>我們必須指出，此項戰時貸款，無論從貸款本身或從歷史慣例來看，都與普通的國際借貸或國際投資有着重大區別，性質也不同，而且其中不少貸款，還被蔣介石用以準備內戰。同時，英美帝國主義給予這些戰時借款，實質上也有乘機侵略的企圖。如英國在1937年給予的中英廣梅鐵路（廣州～梅縣）借款三百萬英鎊，中英浦信鐵路（浦口～信陽）借款四百萬英鎊，中英滇緬鐵路借款一千萬鎊，就是企圖乘機攫取這些重要鐵路路權的。美國在1940年給予的中美滇錫借款兩千萬美金，中美塢砂借款兩千五百萬美金，也就是乘機企圖攫取中國重要礦產資源的。更重要的是，這些借款根本不能算作一般的國際投資，而是應當作為戰時債務來看的。大家都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曾發生所謂“戰債”問題，即大戰期間英、法兩國向美國所借近100億美元的戰時借款問題。這筆美國貸款，英、法兩國從來不承認是美國投資，也沒有準備償還。其理由：第一，認為“戰債”是為有利於展開戰爭的補助金，是共同負擔的戰費，與其他軍需品一樣，因而沒有償還的必要。第二，“戰債”和德國賠償有必然的聯繫，若德國不拿出賠款來，則英、法等國也無法償還“戰債”。<sup>②</sup>所以，後來這個“戰債”問題只好不了了之。美、英對我國的戰時貸款，其情況與性質大体上與第一次大戰期

① 劉秉麟編著：《近代中國外債史稿》，三聯書店1982年第1版，第243頁。

② 參閱彭迪先：《世界經濟史綱》，三聯書店1949年滬初版，第375頁。

間美国对英法的貸款相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置身事外，到1917年才参加大战与英、法并肩作战。我国抗日战争初期，英、美隔岸观火，但1941年太平洋战争发生后，中、英、美三国已经是同盟国，处于共同对敌作战的地位。因此，英、美对华的战时貸款，实质上应当視作为击败敌人的“共同負担”的战費，沒有偿还的必要；也不能与一般的投資混淆。这一点，連英国人耿爱德也认为英国的战时貸款，只能“作礼物奉款，似不能列入投資一类也”。<sup>①</sup>至于抗日战争胜利后，截至1948年6月止，美帝国主义給予蒋介石进行反人民内战的“援助”，計有借款14笔，“救济”物資4笔，租借法物資2笔，軍事“援华”2笔，剩余軍用品“售让”与“贈与”7笔，合計其实际动用数約50亿美元。<sup>②</sup>这种“援助”，一方面是剩余軍用物資，許多是废品；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給予蒋介石“援助”是助长中国内战，帮助蒋介石屠杀中国人民，实际上就等于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参与中国内战，直接对中国人民进行侵略。象美帝国主义这样的“援助”或“借款”，我想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认为是投資吧！

---

① 陈真等編：《中国近代工业史資料》第2輯，三联书店1958年第1版，第17頁。

② 參閱吳承明編：《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資》，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版，第78頁。

### 第三章 帝国主义对中国金融的垄断及其对中国资金的詐騙利用

#### 第一节 帝国主义金融儲蓄机构对中国资金的吸收和詐騙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經濟侵略是无孔不入的，尤其是外国金融势力对中国侵略更甚。解放以前，帝国主义金融資本凭借帝国主义在华軍事、政治、經濟上的特权，成为控制中国經濟命脉的太上皇。英帝国主义的有利銀行、麦加利銀行、汇丰銀行，美帝国主义的花旗銀行、大通銀行、运通銀行、美丰銀行、中华懋业銀行以及統一銀公司、普益銀公司等，日本帝国主义的橫滨正金銀行、台灣銀行、朝鮮銀行、日本兴业銀行、三井銀行、三菱銀行、住友銀行、正隆銀行、华南銀行、天津銀行、济南銀行、东亚兴业銀行、中日实业銀行、中华汇业銀行、东洋拓殖会社、日本特殊銀行团、海外投資銀行团等，法国的东方汇理銀行、中法实业銀行，比国的华比銀行，德国的德华銀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銀行，荷兰的荷兰銀行，等等，无一不是以殖民地銀行的姿态出現的。帝国主义在中国設置了这許多銀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垄断中国經濟的金融网，直接控制着中国金融业、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并且还操纵着关税、盐稅以及国家財政；因此，帝国主义金融資

本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过程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在中国经济中心的上海，帝国主义的金融势力更一向居于支配地位。上海中外银行界及银行业以外之其他行业所组织的银钱业公会的16名委员中，帝国主义银行占8席，上海银行业公会占5席，外业公会占3席，并指定麦加利银行经理或其代表人为第一任主席。至于汇兑经纪人中，外籍竟占53人，中国籍仅占16人。外滩的高楼大厦，大部分都为帝国主义银行所占，如汇丰、麦加利、朝鲜、台湾、正金、华比、荷兰等银行都集中在这里。

帝国主义金融势力之所以能够压倒华商银行，很多人认为是因为帝国主义银行资本雄厚，华商资本薄弱无法与之竞争的缘故。其实这种看法根本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够垄断中国金融，主要还是由于各种不平等条约在作祟，而并非帝国主义银行真正有什么雄厚的资金。帝国主义银行在中国设立之初，其资本额都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完全以买空卖空起家。就以最大的金融垄断集团汇丰银行来说，它开办时资本不过250万港币，后来靠投机赚了大钱，才陆续扩充到实收资本额2,000万港币。帝国主义银行的业务经营，完全是运用一套投机倒把的伎俩，吸引中国人的资金来进行剥削和榨取的。

帝国主义银行垄断地位之形成和发展，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鸦片输入和战争赔款造成了中国国际收支的逆差。前面已经叙述过，英美等国在已往一百多年中输入中国的鸦片总值，至少有25亿两。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历次侵略战争中向清朝政府索取去的赔款，又在12亿两以上。这些款项的支付，都要通过帝国主义的银行，因而造成了它们操纵垄断的地位。单单这两笔巨款，就把中国人民的脂膏血汗都吸吮干净了，因而使得中国根本无法积累资金来发展国民经济。

帝国主义銀行凭借特权在中国吸收存款和发行鈔票，也是它們形成壟断地位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两項銀行业务，原为国家主权所系，任何独立国家都絕不容許外人在国内設立銀行广泛吸收社会存款和滥发鈔票。发行鈔票权必須由国家金融机构来掌握，絕不容許普通銀行、尤其不能容許外国銀行来发行，因为它与国家財政、国家通貨以及物价等都息息相关。吸收存款也是一样，一般独立国家只允許本国銀行經營儲蓄业务，这样一方面可以維護本国銀行的业务經營，促进金融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国家可以根据存款情况及建設需要情况，引导这些存款用之于国家最需要和最有利的地方以发展国民經济。但旧中国的情况則完全不是这样，各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設立的銀行都大事办理儲蓄业务和滥发鈔票，因而直接危害到我国国民經济。帝国主义銀行因享有不平等的治外法权，不受我国政府和法制的約束，它們就在我国滥发起紙币来。以1935年为例，在我国直接发行紙币的計有汇丰、麦加利、有利、德华、橫濱正金、台灣、朝鮮、花旗、美丰、东方汇理、华比等11家銀行(包括英、美、日、法、德、比等6个国家)，发行紙币总額折算华币4亿多元。<sup>①</sup>

### 帝国主义銀行在中国发行紙币綜合情况估算表

(1935年，单位：元)

国別及銀行名称	发行額
英国(汇丰、麦加利、有利)	91,644,270
美国(花旗、美丰,1933年数字)	100,237,290
日本(正金、台灣、朝鮮)	101,170,941
法国(东方汇理)	124,992,612
德国(德华)	57,325
比国(华比)	719,746
合 計	418,822,184

① 參閱顧可編著：《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华銀行发行紙币概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52~56頁。

至于帝国主义銀行在我国吸收的存款，数字更为惊人，因为中国許多有錢有勢的官僚、軍閥、买办、地主都把自己搜刮得来的銀錢存到帝国主义銀行去。1932年，在华設立的帝国主义銀行共有30家。其中有利、麦加利、汇丰、沙逊、花旗、运通、大通、友邦、正金、台灣、住友、三菱、三井、朝鮮、东方汇理等15家主要帝国主义銀行所吸收的各项存款，将近115亿元。<sup>①</sup> 这些存款当然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商业性的活期往来存款。但即使只有百分之十的定期存款，也就有11亿元，数字非常可观了。汇丰銀行是对我国进行經濟侵略的金融机构。早在1898年，为了取得沪宁綫路权，以便进一步控制江浙一带的鐵路交通，汇丰銀行就暴露了它的侵略野心。当时該行經理給英国外交部的一封信里曾說：“……沪宁鐵路綫应由英国取得，这是极端重要的，所以我立刻代表計劃中的英国辛笛加和著名的怡和洋行——它已經在这个問題上和中国方面保持接触——进行协商，以修筑这条鐵路。”<sup>②</sup> 汇丰的企图和野心，在这封信上完全暴露出来了。它把吸收到的大量存款，一方面用高利貸的形式，几乎包办了对中国反动政府的各种政治借款，以取得种种特权如海关管理、筑路等，另一方面，它又作为帝国主义企业的后台老板，支持帝国主义企业来扼杀华商。它只对外商放款，一般不对华商放款。汇丰銀行吸收中国軍閥、官僚的存款条件也很苛刻，数目少的、短期的不接受，同时利息低微，有些存款就根本没有利息，如遇有政治、軍事风潮时，竟还有人愿意倒貼利息。有人估計过，自

① 參閱1935年《上海市年鑑》金融篇，第35、36頁。

② 轉引自汪敬虞編：《中国近代工业史資料》第2輯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328頁。

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时期，单汇丰銀行吸收的中国人存款，差不多就等于英国全部在华投資(包括政治借款)。一直到1935年年底，上海汇丰銀行的定期存款还有2亿元，这个数目，与中南、大陆、盐业、上海商业、新华、浙江兴业、浙江实业等7家当时最大的华商銀行的存款总数相等。中国的对外汇兌，也是一向由汇丰銀行操纵的。上海外汇价格和黄金价格都以汇丰挂牌为标准。抗日战争时期，虽然伪法币膨胀得很厉害，实际币值下跌很多，但国民党政府为便利帝国主义取回利潤及官僚財閥逃避資金和貪污舞弊，还一直維持外汇的自由价格。1939年，国民党反动政府为維持法币的对外汇价，向麦加利和汇丰銀行借款500万英鎊，另由交通、中国两銀行合拨500万鎊，共計1,000万鎊作为外汇平准基金，交由上海汇丰銀行挂牌結汇。不到一年，1,000万鎊基金就被吃得精光，法币汇价从8便士縮到3便士。在这一幕可耻的买卖中，日本帝国主义占了大便宜，孔、宋財閥和英国銀行也获得了大好处。据說，仅麦加利銀行和汇丰銀行就掠夺了500万鎊以上。帝国主义銀行的所謂在华金融投資，就是这样从掠夺中积累起来的。

除了以上所述帝国主义銀行的經濟侵略以外，还有一家法商万国儲蓄会借儲蓄名义詐騙了中国人大量的金錢。这是一个大詐騙机构，我們在这里有特別詳細地談一下的必要。万国儲蓄会是几个法国冒险家于1912年在上海設立的。設立时，号称資本4万两銀子(一說65,000两)，但实际并未收足。該会业务发达后，于1914年又在泰国和爪哇設立分会，1924~1926年又先后在法国、阿尔及利亚和越南設立分会。該会斂財致富的方法，就是发行有奖儲蓄会单，用賭博的方式，利用小市民的侥幸心理，来詐騙市民的金錢。

万国儲蓄会发行的有奖儲蓄会单，分全会、半会、四分之一会三种。全会每月应儲入法币 12 元，15 年到期取还本息共 2,000 元。按月开奖一次，中特奖者可得奖金 5 万元，头奖 2,000 元。奖金全部是由儲款本金中提出的，第一年儲款 144 元中提奖金 36 元，万国儲蓄会佣金 48 元，开支 60 元。所以第一年儲款的大部分都被万国儲蓄会这些騙子用佣金和开支名义吞沒了。第二年起在儲款中照提奖金 36 元，佣金 5 元，其余 103 元才作为还款准备。儲蓄会章程规定：凡儲蓄不满 2 整年，中途停儲 3 个月，会单即被取消，儲金全部沒收。凡儲蓄满 2 年以上，中途停儲过 5 个月，会单亦作取消，所儲整年的存款，可按年数的长短打 4 折至 8 折还本；不足整年的零星月份存款則被沒收。由于儲蓄时间过长，儲戶一般不能坚持 15 年，大多儲了一个时期，即因种种原因而中途停儲。因之，被万国儲蓄会吞沒的存款数量是非常惊人的。而且，即使存满 15 年，万国儲蓄会照会单付的利息仅为 5 厘，而当时一般銀行、錢庄存款利息为 6 厘，定期、长期的甚至可达 1 分。

万国儲蓄会依仗法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以奖金为誘餌，儲蓄会单的发行量日益扩大，分支机构遍及全国。1912 年仅 350 戶，至 1918 年增至 8,688 戶，1921 年 22,400 戶，1931 年 113,200 戶，1933 年 124,800 戶，1934 年达 131,800 戶。在 1934 年，每月收进的儲款达 150 万元。茲将万国儲蓄会收款数额列表于下<sup>①</sup>：

---

① 参閱《中国經济月刊》第 4 卷第 7 期。

万国儲蓄会收儲会款数额表(单位:元)

年 份	儲 款 結 存 額
1925年	13,400,000
1928年	28,010,000
1929年	34,190,000
1930年	42,420,000
1931年	45,000,000
1933年	62,000,000
1934年 6 月	65,000,000

万国儲蓄会吸收到大量儲款后，便用来投資于房地产及有价証券，并在上海設立中国建业地产公司、保太保險公司、工业研究公司、洛由人寿保險公司、印度支那建业地产公司等子女公司，儼然成为与汇丰銀行、东方汇理銀行等并駕齐驅的銀行財团。万国本身的帳面資本額最后亦增加到 600 万元，所有增資都是由历年盈余款項拨充的，它的全部在华活动資金以及被它搞到越南、法国、阿尔及利亚去的許多資金，都是中国人的存款。它在有奖儲蓄这一个幌子下，沒收了大量中途停儲戶的存款，剝削了儲戶将近一半的定期存款利息，即低利息收进，高利貸放出。同时，由于存款还本期为 15 年(这是一种少有的长期存款)，就使它有充分的时间和条件来运用这一大笔存款，如万国儲蓄会及中国建业地产公司在上海的 900 多幢房屋，其中包括若干幢华貴的大楼公寓如毕卡第公寓(现为衡山飯店)、戮司康公寓(现为淮中大楼)、巴黎公寓(现为巴黎新村)等，都是运用儲款建造起来的。房屋造成后，由于房租奇高，押租又重，至多十年、八年就可以收回建筑成本，白白取得房屋，成为純粹的剝削利潤。茲将万国儲蓄会利用儲款情况列表于次①：

① 參閱《中国經濟月刊》第 4 卷第 7 期。

万国儲蓄会对客戶儲款利用情况簡表(单位: 元)

利 用 途 径	1932年9月30日	占百分比	1934年3月31日	占百分比
外国及上海外人企业中投資	11,842,823.98	21	19,329,492.91	31
购买中国政府債券	11,396,813.76	22	8,589,044.33	13
购置房地产	7,681,941.48	14	7,680,983.64	12
房地抵押	2,958,528.39	5	2,729,116.23	4
会单抵押	19,688,751.98	38	23,255,446.27	36
哈尔滨定期存款	200,000.00		购买财政部公債 2,321,750.00	4
合 計	53,268,859.59	100	63,905,833.38	100

万国儲蓄会先后抽逃了大量資金到国外去,解放后,发现它大量积欠中国儲戶的存款及稅款,即是把它在上海的一切财产及房屋充抵,也仍亏欠累累。这个在上海滩上煥赫一时的帝国主义大財团之一的万国儲蓄会,帳面資本达 600 万元,子女公司又不少。解放以后以鉄的事实剝开了它的皮,才知道它竟是这样一个大可恶的大騙子和倒挂戶,在这块罪恶的招牌下竟被掠夺去了这么多中国人的資金! 但是,雷麦他們的《外人在华投資》統計里,竟然也有“法商万国儲蓄会”、“法商中国建业地产公司”的一大笔金融投資和不动产投資。很明显,这是他們有意把中国人自己的資金当成是外人在华投資了。

因此,早在1935年中国經济学社等 22 个学术机关团体就曾对万国儲蓄会以儲蓄为名、賭博詐騙为实而吸引我国資財、破坏我国經济的罪恶伎俩,通电声討。电文大意是:“国民儲蓄,自有正当途径,断不可以賭博方式行之,尤不可任外国人在我国境内借賭博式之儲蓄,以吸收我劳苦民众血汗易得之金錢,其中如法商万国儲蓄会在商埠及内地之势力,实令人怵目惊心,其組織及办理成績如何,中国政府不得监督过問,其内容則道路頗多传

說，亦无从臆断，惟其吸收資金，除获利不計外，已多至 6,500 余万元，现正方加无已，竭举国之脂膏，供外商之利用，則危險状况，实不言可喻，……届此有奖儲蓄会尙未結束之时，尤望同胞未曾加入者，絕對不可再行加入；其已經加入者，暫時不可单独退会，任其挾持，……务期达到收回儲款全部本息之目的而后已，当此国民經济困难之时，同胞惟有刻苦耐勞，寸积铢累，从事正当生产之投資，方能自救，万不可逞侥幸之心，存非分之想，尤不可以血汗之資金，供外商巧取，……”<sup>①</sup> 这个电文，已把万国儲蓄会破坏我国經济的罪恶活动，揭露得很清楚了。我国爱国人士虽然大声疾呼、通电声討，号召全国人民反对万国儲蓄会这类寡廉鮮耻的帝国主义侵略机构，但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宋子文、孔祥熙等，竟为虎作倀，对万国儲蓄会处处予以便利和庇护。1929 年 3 月該会与伪財政部长宋子文勾結，訂立密契，任令該会在全国各地推广业务，并多方予以支持。孔祥熙接任伪財政部后，于 1932 年 8 月 19 日发布命令，“准其立案，按照該会章程在中国境内应准自由营业”。1933 年 12 月，伪財政部向該会借款 250 万元；該会負責人受宠若惊，认为“財政部对万国儲蓄会与其他中国大銀行相等看待，这是光荣名誉的代价”。后来，虽然社会輿論激烈要求取締万国儲蓄会这个大賭博榨取机构，但孔祥熙仍然千方百計地为万国儲蓄会掩护，“想制訂一項不妨碍万国业务的法令”，其丧心病狂，到了极点。1935 年 2 月 2 日，伪財政部在輿論压力下，发出了一个騙人的命令：“根据儲蓄銀行法第十四条规定，有奖儲蓄应禁止之，已办之有奖儲蓄应即停收儲蓄存款，其結束办法由財政部拟定。”事实上，这是一个欺騙

<sup>①</sup> 1936 年《上海市年鉴》金融篇，第 11~12 頁。

花招。这則命令公布后，万国儲蓄会根本不遵守，除結束了一部分中小城市的业务外，所有通商口岸大城市照旧繼續收儲；再則所謂“結束办法由财政部拟定”这一点，根本沒有下文。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以前，万国儲蓄会也还没有办理結束。由此可见，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与封建官僚統治者完全是狼狽为奸的。

帝国主义銀行、万国儲蓄会等在中国发行的紙币数額如此之多，吸收存款如此之巨，那么它們本身的資本究竟有多少呢？許多人都认为帝国主义銀行資本雄厚，一些軍閥、官僚、买办等等也都认为帝国主义的銀行資本大，信用著，存款最可靠；其实，帝国主义銀行的資本并不雄厚，若干較小的銀行根本就是买空卖空的騙局。现将1935年上海26家帝国主义銀行的資本額列表于下①：

上海外商銀行資本額一览表(1935年)

銀行名称	本位	名义資本	实收資本
有利銀行	英鎊	3,000,000	1,050,000
麦加利銀行	英鎊	3,000,000	3,000,000
汇丰銀行	港洋	50,000,000	20,000,000
大英銀行	英鎊	5,000,000	2,594,160
沙遜銀行	英鎊	1,000,000	500,000
花旗銀行	美元	127,500,000	127,500,000
美国运通銀行	美元	6,000,000	6,000,000
大通銀行	美元	5,000,000	5,000,000
友邦銀行	元	500,000	500,000
橫濱正金銀行	日元	100,000,000	100,000,000
台灣銀行	日元	15,000,000	13,125,000
住友銀行	日元	70,000,000	50,000,000
三菱銀行	日元	100,000,000	62,500,000
三井銀行	日元	100,000,000	60,000,000
上海銀行	元	100,000	100,000

① 參閱1937年《上海市年鉴》金融篇，第93、94頁。

銀行名稱	本位	名義資本	實收資本
朝鮮銀行	日元	40,000,000	25,000,000
漢口銀行	日元	1,000,000	250,000
東方匯理銀行	法郎	120,000,000	120,000,000
匯源銀行	元	2,000,000	2,000,000
華美銀行	美元	1,000,000	1,000,000
荷蘭銀行	荷盾	80,000,000	35,000,000
安達銀行	荷盾	90,000,000	33,000,000
德華銀行	元	6,440,000	5,705,000
華比銀行	法郎	200,000,000	200,000,000
莫斯科國民銀行	英鎊	1,750,000	1,635,000
又品放款銀行	法郎	70,000,000	70,000,000

以上 26 家帝國主義銀行的實收資本，照 1935 年匯率折合華幣約計 10 億元。這是它們總行的資本額。至於它們在中國設立的分行，則根本沒有什麼資本可言。它們靠吸收存款和發行紙幣來進行活動。帝國主義銀行一向宣傳的資金雄厚、存款可靠，完全是一種騙局。事實證明，過去至少有 20 家帝國主義銀行因資金匱乏、周轉不靈而倒閉停歇。一百年來，中國的軍閥、官僚、買辦把搜刮到手的民脂民膏存進帝國主義銀行，因銀行倒閉而“吃倒帳”的數目也是十分驚人的。如清朝政府的一個親王，是搜刮能手，素稱富有，大家都知道他有一百幾十萬到二百萬兩的現銀沒有下落，傳說他把銀子窖藏在他王府的地下。後來北洋軍閥張懷芝做參謀總長，駐扎在那個王府里，他便發動下屬來“挖銀窖”，結果毫無所得，一時成了喧騰中外的笑柄。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原來，那位親王早把自己的大量金銀存進帝國主義銀行吃了“倒帳”了。又如中華懋業銀行、德華銀行、華俄道勝銀行、中法實業銀行、菲律賓銀行、美豐銀行等之倒閉歇業，我國人民所受損失實難以計算。

## 第二节 帝国主义金融势力的侵略活动

帝国主义銀行既然利用它們的在华特权，在中国領土内发行大量紙币，吸收大量存款，又利用战争賠款和貿易入超的差額，把中国的現金銀集中在手里，因此，外国銀行团便成为操纵中国一切經濟事业和金融事业的“独立王国”。它們对当时中国的財政、工商企业以及交通運輸事业，几乎具有生杀予夺之大权。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所說：“帝国主义列强經過借款給中国政府，并在中国開設銀行，壟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財政。因此，它們就不但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資本主义，而且在金融上、財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sup>①</sup>

帝国主义銀行把中国人的資金集中到手里以后，它們又怎样运用这笔資金来进一步奴役和剝削中国人民呢？換句話說，它們的“金融业务”是怎样进行活动的呢？它們运用这笔巨款的主要方針，就是将它轉变为所謂对华投資，通过所謂投資的方式来深入骨髓的剝削和侵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所謂投資，絕大部分都是由帝国主义銀行經手和直接执行的。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它起了先鋒队和劊子手的作用。帝国主义銀行将吸收到的存款和发行的紙币轉化为投資的形式，大体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間接投資的政治借款；第二类是直接投資于

---

<sup>①</sup>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28頁。

帝国主义企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帝国主义对中国最重要的 10 笔政治借款，包括汇丰銀借款、金借款、怡和借款、瑞記借款、汇丰新借款、俄法借款、英德借款及續借款、克利浦斯借款、善后大借款等，总数約 7 亿銀两，几乎全部是由在华帝国主义銀行經手的，其中虽有一部分在国外募債，但也完全由在华帝国主义銀行負責經理和主持。此項政治借款，是帝国主义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最沉重的枷鎖，也是最毒辣的一种剝削。政治借款对我国有五大不利：

1. 借款折扣大，仅以上述 10 笔借款而論，由于折扣关系，竟少付了約 7,000 万两銀子。款未到手，即先被打折扣，而且被扣去的空額也要照样起息，这簡直是一种公开的掠夺。

2. 政治借款都以关税盐稅作担保。这两种稅是我国的財政命脉。帝国主义分子为了控制我国財政，便以控制稅款为名，派員深入我国稅收机关，直接干預和掌管关盐两稅的收支，并规定稅款必須存在帝国主义銀行；海关稅务司一席向由英国人担任，并且指定是汇丰銀行的代理人。我国各地海关上自稅务司下至查貨員都任用了大批外国人員，这是早已人人皆知的事实。盐务机关也是一样。在盐务总署內，名义上設中国总办一員，外人会办一員，但所有发給引票、汇编各項收支报告册据等等，都須由总、会办共同負責。各产盐地方的稽核所則設立中国經理一人，外国协理一人，共同担負征收、存儲盐稅之責任。中外經、协理以及稽核所所需中外人員的任免事項，須由总、会办会同批准。由此，帝国主义分子占据了盐务重要职位，一切大权也操于外人之手。外人工資奇高，生活待遇又远較中国職員优越，在关、盐两稅收机关中，帝国主义分子形成了一种具有特权的特殊

势力。

3. 由于借款担保确实，利息又高，帝国主义者为了长期控制我国财政税收，保持长期高利贷的榨取，借款期都定得很长，如英、德借款还款期为36年，英、德续借款为45年，善后大借款为47年，俄法借款为36年。在规定期限内分期还本付息，一般都不得提前偿付，如果中国政府欲提前偿还借款，则在本息之外还须加付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十不等的补贴，即每还百两银子，须加付2两到10两。这完全是剥削之上再加剥削的苛刻规定。

4. 还款付息时，经办银行一律规定加收千分之二点五的手续费。由于借款数字巨大，这笔手续费是非常可观的。

5. 借款如系用于国外购买军火或某些材料，则不仅货价运费较一般国际市场上正常价格为高，而且多以过时的剩余次货滥竽充数。这也是帝国主义者极其卑鄙恶劣的一种作法。尤其是通过供给军火助长了中国内战，帮助反动统治阶级屠杀人民，其恶果更大。

总之，各帝国主义在华的主要侵略势力——帝国主义银行，吸收中国人的金钱，再以最苛刻的条件和最恶劣的作法借给中国反动政府，层层盘剥，利上加利，使帝国主义银行团直接控制着中国财政金融的命脉。名为政治借款，实际上则是致中国人民于死地的一服毒药。

帝国主义银行在中国除按最苛刻的条件给予中国反动政府以政治借款外，它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中心任务，就是运用中国人的金钱，通过金融活动支持在华帝国主义企业的发展，以打击中国民族工业的兴起。

帝国主义在华直接经营的所谓企业投资，包括矿山、铁路、轮船、工厂、码头、仓库、房地产、国际贸易等等。1931年，帝国

主义在华经济势力最盛时期，据雷麦统计，属于这一类的投资总额不下 19 亿美元。我们姑不论这个统计数字之正确程度如何，但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的各个部门均有很大势力，而且在航运、纺织等若干重要经济部门占有绝对优势地位这一点，则是事实。

帝国主义企业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如此顺利地发展起来呢？分析起来有政治原因和经济原因两种。所谓政治原因，就是它们享有不平等的政治特权；所谓经济原因，就是它们有帝国主义金融势力作后盾。英国的汇丰、麦加利、有利银行以及日本的正金、朝鲜、台湾银行等，最初在中国设立的目的，就是执行殖民地银行的任务。汇丰银行总行虽然设在香港，但它的重要营业方针，则完全取决于设在伦敦的最高决策机构“伦敦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设有 6 个委员，除汇丰银行 2 人外，其余 4 人则是英格兰银行、威斯敏特银行等 4 个最大金融集团的代表。汇丰银行在中国的一切重要活动，都由伦敦委员会决定。任何在华帝国主义银行，都要听命于本国财政部、外交部的指示，并直接接受领事馆的领导。因此，帝国主义银行的一举一动，当然都以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为依据。帝国主义银行的性质和使命既然如此，那么，它们的业务活动和放款范围，显然是以有利于帝国主义企业的发展为最高原则。

许多帝国主义工矿企业与银行都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帝国主义银行对外商在华企业最突出的支持就是信贷业务。在上海的英商最重要的 48 家企业，都与汇丰银行有密切的信贷关系；与麦加利银行有关系的有 30 家；与有利银行有关系的有 9 家。其中若干家根本就是银行资本与工商业资本共同经营的混血儿。著名的怡和集团、太古集团都与汇丰银行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怡和系统专事经营铁路投资的中英公司，是汇丰银行与

怡和洋行合資开办的。安利洋行、沙逊洋行、华懋地产公司、上海地产投资公司、远东营业公司等，与沙逊银行的资金和人事关系都属于一个系统，难分难解。日本的三井银行与三井洋行、三菱银行与三菱物产会社，实质上也都是两位一体。

帝国主义银行除了将吸收到的存款直接投资于各帝国主义工商企业，使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结合以外，还有一个最普通的手法，就是透过信贷关系来资助帝国主义工商企业的发展。其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1. 承购或代銷股票。在华帝国主义工商企业創設或增資时，发行大量股票，由銀行出面承购或代銷。

2. 經理和承购公司債。帝国主义工商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已与銀行資本相结合。这也就是帝国主义时代金融資本与工业資本的结合。許多帝国主义工矿业营业困难或业务扩大，需要发行公司債时，为了使債券在市场上易于出售，就由銀行出面代为經理发行，或经由銀行自行承购。如1934年中和地产公司为了抵押哈同的遺產，发行公司債1,800万元，即完全由沙逊銀行代为出面經理和发行。1935年，上海汇丰銀行手中持有的有价証券达262,233,304港元；麦加利銀行持有的有价証券达18,571,188英鎊(包括一部分政府債券)；正金銀行持有的有价証券达494,515,174日元。<sup>①</sup>这些有价証券，极大部分都是帝国主义工商企业发出，在外商經營的証券交易所众业公所上市的；帝国主义銀行这样大规模地运用存款来經營有价証券，不仅它們本身可以获得厚利，而且还有力地帮助了帝国主义工商企业的发展。

---

<sup>①</sup> 參閱1937年《上海市年鑑》金融篇，第95~101頁。

3. 信用透支和押汇。帝国主义銀行对于外人工商企业的另一种有力支持和优惠待遇，就是信用透支和押汇。凡是帝国主义企业单位与銀行有往来存款，訂有透支合約者，在业务經營上需要款項时都可向銀行透支。这是一种最普通的信用放款形式。帝国主义銀行为了打击中国民族工商业，一般不直接对中国工商企业放款，而以較低的利息对外商放款，由外商轉手以較高的息率借給中国工商企业。在1937年，业广地产公司向汇丰銀行以5厘息透支的款項有900多万元；它透支到的这些款子轉手以7厘或8厘的高息押进中国人的产业，从中得到一笔中間剝削。汇丰銀行这种放款手法，显然一方面翼助了帝国主义企业，另一方面也就打击了中国人的企业，使中国工商业負担奇高的利息，成本加重，永远无法与帝国主义企业竞争。此外，由于帝国主义銀行垄断了我国的国际汇兌，它們就用优惠的押汇条件来支持帝国主义企业，把持我国的进出口貿易。例如在华的进出口洋行，要买办大批猪鬃、桐油、茶叶、大豆、蚕絲出口，帝国主义銀行就对进出口洋行放款，加强其购买力，这些放款采用押汇方式，俟进出口洋行把貨物运到国外市场出賣后，才在国外收还。反之，帝国主义銀行在国外收到了这笔还款后，又用以借給对华出口的貿易商，資助它們在国外购买貨物运到中国出賣后，再在中国收还。在华进出口洋行，由于有帝国主义金融势力的滋养和培植，所以它們的力量非常雄厚。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我国的国际貿易业，几乎百分之百都为帝国主义进出口洋行所垄断。1920年以后，我国商人才逐渐直接参加国际貿易，但仅占进出口总額的百分之十左右，仍然处于洋行的附庸地位。1930年，中国进口貨物总值为2,040,599,000元，出口貨物总值为1,394,167,000元，进出口总值为34亿余元。但据1932

年中国銀行营业报告书所述的国外汇兌情形，該行开出出口业的信用証仅 62,287,000 元，进出口押汇仅 43,358,000 元。从这些数字来看，可见我国銀行在国际汇兌上仍处于绝对劣势地位，帝国主义銀行則具有决定性的力量。

帝国主义銀行不仅垄断我国国际汇兌，而且因为它们在我国各重要地区濫設分支行，以致我国国内汇兌亦直接間接地大受其控制和影响。例如：1. 汇丰銀行在上海、天津、北京、汉口、广州、福州、厦門、青島、沈阳、哈尔滨、烟台、大連、重庆等处設有分支行；2. 橫濱正金銀行在上海、天津、北京、汉口、青島、济南、牛庄、大連、沈阳、太原、长春、哈尔滨等处設有分支行；3. 花旗銀行在上海、天津、北京、汉口、青島、哈尔滨、广州等处設有分支行；4. 东方汇理銀行在上海、天津、北京、汉口、广州、昆明等处設有分支行。此外，麦加利、台灣、朝鮮等銀行也都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九江、汕头等重要地区設有分支行。因此，帝国主义銀行的业务活动深入中国各地，什么地方設有分支行，它們的存款、放款、汇兌业务就到达什么地方，它們发行的紙币也就在該地流通。在国内汇兌上受影响最大的，就是所謂“貼水”問題以及外币汇价較高的問題。因外币汇价高，以及各地互汇貼水涨落不定，以致我国的汇兌市价經常动蕩不定，因而許多工商企业的营业也随之而經常处于不稳定状态。

总之，帝国主义銀行通过发行鈔票、吸收存款以及放款、汇兌等各項业务活动，用中国人的錢来发展它們的經濟势力，用中国人的錢来剝削中国人，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最恶毒的一种杀人不见血的手法。而在解放以前的将近一百年中，帝国主义金融势力就这样支配着中国的經濟命脉，中国人在經濟生活上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帝国主义金融势力的压迫和打击。

### 第三节 帝国主义企业利用中外合資和发行 公司債券吸引中国人的資金

帝国主义除了用金融机构吸收和詐騙中国人的資金以外，还有帝国主义企业也采取金融性的手段，用中外合資和发行公司債券的办法，运用中国人的資金来剝削中国人民。

早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初期，在外商資本中，实际上就有大量的中国人的資金。尤其是美帝国主义的所謂“在华投資”，极大部分是中国的資本。如旗昌洋行、金利源洋行的資本，中国人的資金就占了很大一部分。1930年根据美商自己的报告，也承认他們实际輸进中国的資本，只有帳面上的“在华投資”总額的36%。<sup>①</sup>由此，所謂1936年美国在华342百万美元的投資，实际上就要打很大的折扣。帝国主义早期在上海、汉口創設的工厂企业，名义上虽为外商投資，在外国或香港注册，实际上却是利用了华商乐于购买外国公司股票的心理，出資的股东很多是中国人。如汉口和丰面粉厂，1905年开业，名义上为英国公司，在香港注册，而实际上股东多数是中国人，仅有两三个英、德商人作挂名股东；注册时資本75,000元，全是中国人的。茲将1896~1910年这一期間在华外国厂矿中的中国股东列表如下<sup>②</sup>：

---

① 参閱魏子初：《帝国主义在华投資》，三联书店1954年第3版，第18頁。

② 汪敬虞編：《中国近代工业史資料》第2輯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1065頁。

### 在华外国厂矿中的中国股东示例

厂 矿 名 称	年 份	股 东 姓 名
上海鴻源紗厂	1896	朱葆三 朱新芹 余高达 林記 叶記 李記 金方昌 大昌号 张东达 洪达 殷其記
	1904	林长炎 徐明越 张元千
上海老公茂紗厂	1896	鍾良越 鍾业勤 駱卫記 譚东新 秦記
	1904	駱芬記 大勤号 平順号 鍾良越
上海瑞記紗厂	1897	吳少卿 益記
	1898	孙仲英
	1899	吳金甫
	1904	魏升甫 吳少卿 何献川
上海怡和紗厂	1897	唐杰臣 翟地山
	1907	源昌号 祝大椿 翟貴堂
上海协隆紗厂	1897	黃佐卿
上海紡績株式会社	1904	源升号 康兴号 吳忠記 源方号 唐金其 裕記 大昌恒
	1909	殷錫昌 苏葆箴 朱立三 陈紹周 王泉保 謝升 徐庆林
上海增裕面粉厂	1896	大金 李卓記 忠紹号
	1907	张源清
上海面粉厂	1907	金邦記 云記
威海卫范碱金矿	1904	何云記 虞洽卿 邢云晋 张林国 张平翁
重庆江北厅煤矿	1909	虞洽卿 鍾良越 王开礼
上海祥泰木行	1904	云記 紹云号 宋丁宏
上海万隆鉄工厂	1906	鍾业勤
	1908	吳少卿
	1896	賈竹銘
	1897	席南祝
上海耶松船厂	1898	鍾法亭
	1906	鍾业勤
	1908	孔新銘
	1909	朱記 康記
上海华章紙厂	1910	林庆隆
	1897	潘金保 吳少卿 何金洲
上海洗毛厂	1898	平記 包金伯 吳南春
	1907	叶中蔡
上海增裕榨油厂	1907	叶中蔡
上海东方制冰厂	1910	吳少卿 苏晋西

上海許多外商企业都利用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在上海市面上公开发行公司債券和股票，吸引中国人的資金，以充实和代替外資。它們发行公司債券的手段，都是十分恶毒的，有时甚至完全是买空卖空的欺詐行为。例如美商上海电力公司名义上是美商开办，但实际資本大部分是中国人的。1928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因鉴于1927年中国大革命时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它认为上海租界也将靠不住，乃奸詐地企图化公产为外人私产，将公有的上海电力公司出卖。当时，美国摩根集团的通用电气債券公司以8,000万两銀子的价格出面承购，但成交时，仅付款3,000万两。随后，所謂美商上海电力公司就在上海发行公司債券和优先股票約11,000万两。此項債券、股票，很大部分是中国人购进的。但通用电气公司却完全取得了上海电力公司的所有权和管理权。从此每年所賺到的高額利潤，就完全落到自己荷包里了。这是何等奸詐的作法。<sup>①</sup> 1930年工部局特許經營的华洋德律风公司的上海电话公司，美国人也是用同样方法攫取到手的。当时美国人以1,000万两承购，但实际上仅付180万两。随后即以“美商上海电话公司”名义，在市面上发行1,500多万两的公司債券和优先股票，大大超过全部买价；多余部分則作为自己的普通股和企业营运金。上海电力公司和上海电话公司都是获利最厚的企业。上海电力公司每年盈利都在600万元以上，1928年为700万元，1934年为660万元。不久，这家企业就

<sup>①</sup> 參閱陈真等編：《中国近代工业史資料》第2輯，三联书店1958年第1版，第341~349頁。在此应当說明一下，美商公司发行的股票，狡猾地分为普通股和优先股二种。优先股只固定收取利息，对公司沒有选举权和管理权，一切实权完全操纵在普通股手中。故只要掌握普通股，就可支配整个公司。

将所得盈利又在沪西创办了沪西电力公司（后改为中美合办）。美帝国主义者取得上述三家大企业，实际上根本没有拿出多少资本，完全是凭借投机取巧、欺詐混騙的手法得来的。上列三家企业的資財，占美商在上海总資产的90%（房地产除外），美孚油公司、德士古油公司、中美油公司三个公司占6%。美帝国主义者一向吹嘘他們在上海有多少多少投資，现在剥开来一看，原来是这样的虛假和丑惡！

美帝国主义者在上海的几家房地产公司，如中国营业公司、普益地产公司等，也是买空卖空，虛有其表的。中国营业公司于1900年开办时，資本額不过1万两，到1925年，根据美国为侵略中国特制的“中国貿易条例”，扩大投机，进行了一次所謂改組。改組时，帳面資本也不过15万两。改組后即招搖撞騙，募集中国人的股本，规定資本額100万两，先筹足25万两。当时中国营业公司为增强势力，首先决定发行7厘分紅債券100万两。1926年又向市场上招股，資本額增为200万两。1931年再度修改公司章程，資本額扩大为800万两，实收500万两。这些新增股款大都是中国人的，最多时中国人的投資額約占該公司資本的80%。在1930年和1931年，又发行公司債券750万两。从此該公司即积极进行投机倒把、买进卖出、押出押进、盖房子收高租等等活动，攫取高額利潤，如1931年一年的淨收益即近100万元。但好景不常，买空卖空的騙局，究竟不能持久。1935年上海白銀外流风潮发生后，銀根奇紧，物价跌落，押出的款收不回，买进的卖不出去，向銀行透支的款和发行的公司債券又要还本付息，在这种情况下，内部空虛的中国营业公司便陷入了絕境，不得不停业清理。

普益地产公司是一个名叫萊文的美国人开設的。萊文于

1904年1月到上海，在工部局工务处任普通职员，几年后，这个冒险家开始进行投机活动，加入了中国营业公司，专做地产投机。后来，他为了扩大活动，更多地吸收中国人的资金，又创立了普益银公司，仍然以地产投机为主，并吸收存款，发行股票。数年间，他的房地产大增，产值达60万两以上。至1926年，他又把普益银公司的房地产部划出来，成立了普益地产公司，资本额定为60万两。普益地产公司的业务范围很广，包括房地产投机、抵押、买卖、打样、估价、经租、道契挂号和保险等等。但其主要营业方针，则为发行股票和公司债券，进行冒险投机。普益地产公司发行的股票，有普通股甲、乙两种及优先股甲、乙两种，原定发行股票总额1,100万两，但实际没有发足。1931年发行股票最多时，也不过520万两左右。在1930年，普益地产公司发行了两次银元公司债券，第一次为规银1,260,200两，第二次为规银3,000,000两，年息6厘，均定期30年。当时购买债券者有华侨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交通银行、中兴银行、浙江兴业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等。普益地产公司的诈骗方式，除发行股票和公司债券外，还另有一种吸收资金的方式，即从1926年起开始发行了一种“普益生利券”，这种生利券完全是存款的性质。至1931年，普益发行的股票已达520万两；公司债券4,260,200两，生利券2,593,715两，三者共计竟达1,200万两。莱文这个冒险家，除了经营普益地产公司和普益银公司外，他还创设了美丰银行、美东银公司等等，均自任董事长。莱文最主要的敛财诈骗手法，不外发行股票、债券、吸收存款以及抵押投机等等。一到1935年上海因白银外流而银根奇紧、地价跌落时，普益地产公司就只好停业清理，莱文系统的企业接着也就全部破产。中国营业公司和普益地产公司等破产后，受损失最大的当然是中国

人，他們所有的股票、債券、生利券等等，几乎全部落空。到1939年，狡猾的美帝国主义者利用通货膨胀，收回了已经大大跌价、形同废纸的股票、債券，又利用了有利于殖民主义的“中国貿易条例”，才使这两个詐騙机构复业。

帝国主义在旧中国开办企业，广泛利用中外合資和发行公司債券的办法引誘中国資金这一点，連英国人耿爱德也坦率承认。他說：“在上海集資經營之股份公司(外埠較少)，遵照香港条例(即英国法律)注册者頗多，当其成立之时，发起人与公司董事，多数皆为英籍，然其募集之大部分資本，不尽为英人所繳，所发之股票亦不尽为英人所有也。……純属于英人者几何，虽不能确定其平均总额，若以市面价額三分之一为其約中数目，似不为过，然观近年来中国投資家对于外商股票之广大注意，則或不及此数，亦未可定。”<sup>①</sup>这就是說，英国人在上海開設的股份公司，其“大部分資本”即三分之二以上，都是属于中国“投資家”的。而真正属于英国人自己的資本則不及三分之一亦未可定。耿爱德是久居上海的英国人，他这个論述，自然有所依据，而且同前面所述的情况，也完全符合。由此可见，帝国主义利用中外合資和发行公司債券的手段来榨取中国人的錢，是达到了如何的高度；有些人仅凭外商招牌，不問其資金来源，而一概把它列为“外人投資”，又是如何的不合情理。

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企业投資中，中国人的資金究竟有多少呢？因目前尙无全面統計，对这个問題还不能作出确切的答

---

<sup>①</sup> 陈真等編：《中国近代工业史資料》第2輯，三联书店1958年第1版，第12頁。耿爱德系久居上海的外汇經紀人，写过很多經濟論文，也出版过有关中国貨幣的书。

复。但根据已经知道了的一些材料来看，帝国主义者用中外合资名义、用发行股票和发行公司债券等方式吸引去的中国人的资金，大致要占到他们在华企业账面投资额的50%。在1936年，英、美、法、日、德等国在关内外的企业账面投资额为269,847.4万美元。<sup>①</sup>如以半数计，其中约有13亿美元应是中国人的资金。我估计在关内外帝国主义企业账面投资额中约有半数是中国人的资金的依据是：(1)帝国主义在华的重要煤矿业，多是中外合资；(2)英美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公用事业、制造业和房地产投机商，都发行大量股票和公司债；(3)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企业利用了大量中国人的资金。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后，用日本和伪满洲国名义合办的企业更多，其资金都是从东北人民身上榨取去的。

---

<sup>①</sup> 参阅吴承明编：《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版，第161页。

## 第四章 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 土地垄断与房地掠夺

### 第一节 帝国主义在中国大城市的土地垄断

在帝国主义对华侵略中，开辟商埠租界、强占土地、进行房地投机，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1842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中最主要的两条就是割让香港和开辟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通商口岸，作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据点。1858年订立比南京条约更苛刻的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以及1860年订立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等以后，帝国主义在我国各地所开辟的商埠和租界便更加扩大，强占的土地也更为辽阔。总计自1845年起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止，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先后强迫清朝政府开辟的租界有上海、广州、厦门、福州、天津、镇江、汉口、九江、烟台、蕪湖、重庆、杭州、苏州、沙市、鼓浪屿、长沙等16处，另有澳门、九龙、胶州湾、旅顺大连湾、威海卫、广州湾、北京使馆界等7处租借地。<sup>①</sup>单英帝国主义一国在中国开辟的租界就有13处之多。凡是被划为租界的地区，行政权、经济权、司法权、军警权都

---

<sup>①</sup> 参阅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1版，第49~56页。

为帝国主义国家非法操纵，儼然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解放以前，租界是寄生在中国人民身上吸吮血汗、榨取脂膏的毒瘤。二十几处租界和租借地，就等于中国人民身上生长了二十几个致命的毒瘤。

帝国主义者除了在大都市和通商口岸划辟租界强占土地外，对于广大的农村和内地小城市也没有放过。它们在河北塘大区所强占的土地，比它们在上海、天津等七个大城市所占土地总数还大三分之一以上。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基督教在内地传教所霸占的土地数字更为惊人。天主教在云南一省就在35县市占有土地和房屋。湖北老河口的一个天主教堂占有农田1,000多亩。甘肃的天主教势力，更形成了大封建主的规模，它不仅占有几千几万亩土地，而且还雇有大批农民为它做奴隶，为它服劳役。此外，各国在华设立的企业也占有不少土地。单就日本帝国主义来说，其在东北、华北所强占土地的数字，就大得难以计算。例如1940年日伪所办的垦殖公司在河北沿海一带圈占农地达100万亩，在冀东沿海一带圈占农地更达700万亩。<sup>①</sup>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设立的所谓垦殖公司，实际上就是最大的榨取机构和军事机构，也是奴役中国农民的机构。

按照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性质分析，地产部分所占比重相当大。按东亚研究所估计1931年为33,900万美元，占投资总数的10.5%；1936年为48,400万美元，占投资总数的16%（不包括企业房地产）。在地产投资中，以国别论，英国占首位；以地区论（不计东北），70%集中在上海；而上海外人的地产，英国又约占60%。英国的地主和资本家对于土地投机和土地剥削，是

<sup>①</sup> 参阅樊承明编：《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版，第67~68页。

有传统經驗的，因而，英帝国主义一侵入上海，首先就選擇交通最便利的地段，迫使清朝政府划为“租界”，进行大规模的霸占。

只要我們細致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巨額不动产投資，大部分是从土地壟断和城市土地增值上得来的。帝国主义在上海，是只有租賃土地居住权，而沒有土地所有权的。但它們却在上海圈占、强占到大量土地以后，坐等地价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增值，然后利用土地壟断的形式非法高价出卖或出租，从而获得惊人的利潤。現在我們就从地价增值和土地壟断两方面来分析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所謂不动产投資。

英国人于1845年在上海取得居住权后，便开始大量攫取土地。他們在中国沒有土地所有权<sup>①</sup>，便濫用土地租賃权，用极低的代价一大片一大片地占用土地。1846年，英国領事館仅出价約17,000两銀子，即将外白渡桥南英国領事館及其附近的120

① 外国人在中国沒有土地所有权一点，連英国人自己也完全承认。1862年9月8日，英国駐北京公使布利斯給英国駐上海領事麥特赫斯的訓令說：“此种計劃（指把上海改为自由市計劃——引者），租地人不能采用，盖此系中国政府之土地，中国政府仅容許有約各国人有管轄該国国民之权而已，仍然保留其一切对于土地及其人民之权力。……所謂上海外人居留地的地位，有一种极大誤解。上海的英租界既不是將該处地方轉让，也不是租与英国政府。不过是議定在某地方內，容許英人自便取得土地，俾得聚居的利益。如此取得的土地，依然是中国的土地，要照常繳納地稅。”（見徐公肅、丘瑾璋：《上海公共租界制度》，国民党政府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3年版，第15~16頁。）另外，1932年7月英国在华駐沪最高法庭对哈同遺產案的判決文，曾引用科得納克斯所著《上海会审公堂和工部局》一书第38頁的論点，駁斥原告关于在上海土地所有权的主張。1937年，該法庭对哈同遺產糾紛案的判決文中，又引用1904年英国法官汉奈在天津地產訟案的判決，认为英国人在中国的地產并无不动产的性质，只是租賃权利。外国人在华沒有土地所有权，又何来不动产投資。故所謂外人在华的土地投資，根本不能成立，应当一笔勾銷的。

多亩土地和房屋攫为己有，土地每亩代价不过 30 两左右。1848 年，英国商人組織跑馬总会，一下子就在现在南京东路河南中路附近永租了 80 亩土地。根据 1845 年上海道台宫慕久与英国領事協定的地皮章程第十五条规定：“……嗣后英商租地亩数，須加限制，每家不得超过十亩，以免先到者占地过广，后来者占地过狭，其租定土地而不架造房舍以資居住及屯貨者，应认为违背条約……。”<sup>①</sup>上海跑馬总会一开始就租地 80 亩，又不建造房屋，显然是违犯规定的。1853 年，因小刀会在南市起义，租界人口驟增，地价急升，跑馬总会就乘机将 80 亩土地以高价出卖，再用每亩 65 两的低价，在现今之南京东路浙江中路到西藏中路之間低价购进大片土地。到 1862 年这一帶繁荣了，跑馬总会就又将这块土地出卖，售得白銀約 10 万两，旋将所得价款之一部分 12,500 两（一說 13,254 两）来圈占面积大几倍的南京西路的跑馬厅（即现在人民公园和人民广场），面积共达 500 多亩。从 1848 年到 1862 年这 14 年間，跑馬总会竟做了三次大量的土地投机，从而获得了大量的利潤。据历史記載：跑馬总会的英国人第二次将所购土地高价出卖后，即騎着一匹馬从西藏路南京路起（新世界口），向西經黄陂北路、武胜路直到现在的工人文化宮，繞了一个大圈，所經路綫都竖起木标，围圈起来。圈内 500 多亩土地，完全是中国老百姓的农田、村庄和坟山。当时这片土地完全在租界范围以外，英国人根本无权在那里圈占或租賃土地，但英国侵略者无視中国主权，无視条約规定，无視当地农民利益，把这 500 多亩土地圈占以后，就把圈内农民赶得精光，禁止中国人入内，

① 徐公肃、丘瑾璋：《上海公共租界制度》，国民党政府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 1933 年版，第 30 頁。

原来的土地所有人进去看望坟山或耕耘自己的土地都被驅逐出来。后来跑馬总会这批人为了取得所謂“法律依据”，就强迫农民出租地皮，用仅及当时市价十分之一的地价即每亩15千文（約合10两銀子）来强租。当时在圈占地內之土地业主共有325戶，因代价太低，都不愿出租，后經种种威胁，才有205戶勉强收受低微的租款，其余100多戶，始終沒有很好解决。跑馬总会在这500多亩地上所花代价总共不过1万多两銀子，但到1933年工部局估价时，这片土地竟估值22,365,405两，較之付出代价竟增长了千倍以上，由此可以証明，英国人取得南京西路的跑馬厅，完全是一种强盜行为。1843年上海开埠之初，外滩一带最高地价每亩不过50元左右。1844年，仁記洋行向吳会元租进的一块外滩土地15.9亩，每亩价为62,600文，照每元兌換1,200文計，仅52元多一点。林賽公司于1844年10月向吳金盛等租进四川路、江西路与四川路、汉口路之間的一块土地面积11亩，每亩价为50,000文，折合銀元約41元。1888年設立的专营土地投机的英商业广地产公司，在苏州河北岸的黄浦路、大名路、乍浦路、昆山路、漕沽路、海宁路、北四川路、北河南路、北江西路、武昌路、溧阳路、东嘉兴路、梧州路、杨树浦路等处获得大量土地，都是只出些微代价，勾結当地不法地保愚弄乡民而半圈半占来的。

我們可以說，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占有的地产，所出代价多是微不足道的，他們仅将出卖鴉片所得暴利之一小部分作为原始資本投到土地上去，等待土地涨价而获得巨大之利潤。事实証明，帝国主义者在上海的不动产的价值的90%以上，都是由于都市日益繁盛而从地价增值中增加起来的暴利，并不是他們在上海有过什么巨大的不动产投資。我們可以從下列統計資料来考察一下过去几十年間上海地价增长的情况。

旧上海公共租界地价增长表 (平均每亩价,单位两)①

年 份	中 区	北 区	东 区
1903	13,549	4,819	2,529
1930	107,882	37,863	11,864
1933	132,451	41,802	15,385

根据此表,自1903年到1933年这30年间,各区地价(东区略低)平均每亩约增加10倍。

旧上海公共租界地价总值表 (工部局估,单位两)②

年 份	中 区	北 区	东 区	合 計
1903	30,086,386	9,714,534	12,541,081	52,342,001
1930	134,741,148	85,229,513	117,231,733	337,202,394
1933	385,831,871	98,811,115	154,471,999	634,114,985

就整个公共租界看,根据上表数字,从1903年到1933年的地价增值,与每亩价格的增长一样,30年中约增长10倍。但这是平均增长,其中包括好地段和差地段。事实上有若干较差地段的腹地,地价增长较少,有些交通便利和市面繁荣的地段,则地价增长很快。按照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市区土地的占有情况来分析,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占有的土地,极大多数都集中在市中心商业繁盛地带。当时最热闹的黄浦区,帝国主义者占有的土地为50.5%,老闾区占28%,新成区占32%。由于帝国主义者所占土地大部分集中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的精华地带,因而其地价增长远超过平均增长率。如黄浦区内的土地,从1903年到1933年的30年间,有增加30倍甚至40倍以上的。现将我们最熟知的几块土地的增值情况,列表如下③:

①② 根据1936年出版的《建筑月刊》第4卷第3期。

③ 此表估价系根据前工部局土地征税估价册。

户名	旧管业系统	1890年	1916年	1920年	1924年	1933年	面积	1933年 全丘总值
华懋饭店	沙逊洋行	(每亩价) 9,000两	(每亩价) 90,000两	(每亩价) 150,000两	(每亩价) 200,000两	(每亩价) 360,000两	(全丘) 6.899亩	2,483,640两
永安公司	哈同	(每亩价) 5,000两	(每亩价) 47,000两	(每亩价) 73,000两	(每亩价) 90,000两	(每亩价) 225,000两	8.631亩	1,941,975两
先施公司	雷士德	(每亩价) 5,000两	(每亩价) 45,000两	(每亩价) 60,000两	(每亩价) 95,000两	(每亩价) 225,000两	10.563亩	2,376,675两
新新公司	哈同	(每亩价) 4,000两	(每亩价) 38,000两	(每亩价) 55,000两	(每亩价) 82,000两	(每亩价) 200,000两	5.316亩	1,063,200两
汇丰银行	汇丰银行	(每亩价) 16,000两	(每亩价) 184,000两	(每亩价) 193,000两	(每亩价) 290,000两	(每亩价) 450,000两	14.207亩	6,393,150两
跑马厅	跑马总会	(每亩价) 6,000两	(每亩价) 22,000两	(每亩价) 26,000两	(每亩价) 38,000两	(每亩价) 110,000两	463.861亩	51,024,710两
英领事馆	英领事馆	(每亩价) 6,000两	(每亩价) 45,000两	(每亩价) 78,000两	(每亩价) 100,000两	(每亩价) 185,000两	48.650亩	6,567,750两

以上土地，1933年地价較之1890年都涨了三、四十倍。

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不动产投資，在1914年为10,500万美元，到1936年增为48,400万美元，增加了3倍多一点。上海是它們的所謂地产投資最集中的地方。根据上述上海地价增长情况来看，帝国主义在这一时期中不动产投資的增加，可以說全部都是土地增值的結果。当时它們还以奇高的价格，把上海的一些房地产出卖給軍閥、官僚和买办，从中得到一笔厚利，抽走了巨額資金。如孔祥熙等就曾在這個时期內，向帝国主义者购进了大量房地产。当然，从1914年到1936年这二十多年間，帝国主义者在上海也建筑了不少高楼大厦，但其房屋建筑費，多是靠发行公司債券或股票利用中国人的錢建筑起来的，如业广地产公司所建的百老汇大厦（即现在的上海大厦），沙逊建筑的华懋飯店（即和平飯店），万国儲蓄会所建的毕卡第公寓（即衡山飯店）等，都是利用发行公司債券或股票兴建的。另一方面，由于外国房地产商边建边卖，建筑了一些房屋，同时又出卖了一些房屋（如孔祥熙的培恩公寓〔现为培文公寓〕、諾曼第公寓〔现为武康公寓〕大楼，就是万国儲蓄会出卖的），因此就房屋的固定資產來說，不会有很大增加，帝国主义者帳面上的房地產資金的增加，主要还是由于土地增值。本来，这种由于城市发达、人口增加、交通運輸改善等等社会条件所造成的土地增值部分，应当归社会所有，由国家以土地增值稅的名义，将增值的大部分都征收为国家所有。但上海因有租界存在，旧中国政府无法征收土地增值稅，因而全部土地增值，都为土地垄断者所独占。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所謂房地產投資的增长，揭开黑幕，真象就是如此！

在上海的帝国主义房地产商，除了坐享地价飞涨的暴利外，他們还从土地垄断中收取高額地租。

帝国主义者在上海的地租剝削，說起来更駭人听闻。照最初的地皮章程，外人在上海只能租地自用，根本不能有土地所有权，更不能将我国的土地轉租图利。但是上海的外国地产商人凭借帝国主义势力，从来就不遵守章程，径自非法进行土地投机。上海租地关系是极其复杂的，地租也是高昂的，其中有一种最严重的剝削就是租地造屋、期满后房屋归給地主的制度。这种剝削制度，是英国人从伦敦搬运过来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中曾談到：“这里不要忘記，在租期（通例为99年）滿后，土地及其上已有的建筑物，以及租期內每每不只加倍或三倍的地租，都会由建筑投机家或其合法继承人，再归到原来的最后的地主手里。”<sup>①</sup>这就是說，土地垄断者把土地出租給他人造屋，租約明白规定：在租期內收取一定的租金，但期满后，租地造屋人应将房屋无条件归給土地占有者。这种租地制度之所以剝削严重，不仅由于地租高，而且由于地上的房屋建筑費实际上也成为地租。这种租地造屋的租期，伦敦較长，一般为99年，但英国殖民主义者把这种貪婪的剝削制度搬到上海来以后，就变本加厉，租期縮得很短，一般都是20~30年。过去一百多年中，帝国主义房地产商采取这种租地办法从中国人身上榨取去的金錢，是无法計算的。帝国主义在上海的許多高楼大厦、工厂、仓库，都是用这种租地造屋办法从中国人手里搶去的。上海大地产商哈同，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这种剝削制度发家致富的。沙逊的許多房屋也是靠这种租地办法归为己有的。上海南京路上几个最著名的商场大楼如永安公司、新新公司（现在为中国食品公司）、慈淑大楼等，都是哈同把土地出租給中国人造屋，规定期满后房屋归哈

<sup>①</sup>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版，第1010頁。

同所有的。哈同于1900年搞进永安公司这块8.6亩的土地，连同永安后面的慈庆里土地，面积共约13亩，代价为18,000英镑，折合规银约13万两。当时地上有民富里房屋，每月有大量房租可收。到1916年4月永安公司创办时，需要租用这块土地盖商场，哈同便以土地垄断者的姿态出现，提出最苛刻的租地条件，规定8.6亩地每年地租5万两银子，租期30年，到期后，永安公司应将这座大楼（即现在永安公司使用的七层钢筋水泥大楼，面积达29,000平方米），无条件无代价地归给哈同。到1946年租期届满，房屋即按约归给土地出租人。由此，哈同不花分文建筑费，仅凭一纸租地契约，便白白得到了一座规模宏伟的大商场。当时哈同已死，由他的养子乔治·哈同继承，乔治看到永安公司还须继续使用这座大楼，便又以112.5万美金的高价，将房地卖给永安公司。总计30年租地期间，哈同收取到150万两银子的地租，最后又得到一笔卖价112.5万美元。其剥削之重，由此可见。又如慈淑大楼（九层钢筋水泥大楼，建筑面积近3万平方米）是大陆银行于1931年向哈同租地建筑的，每年地租20万两银子，原定租期32年，期满后房子连同土地也都要归哈同所有。后来这座大楼因地租太高，大陆负担不了，到1938年即提前归给哈同占有了。大陆仅陆续得到七十多万元贬值的伪法币补贴费。哈同则收了七年地租银140万两，并得到了一座大楼。其剥削更甚于永安大楼。这种租地造屋、到期屋归土地出租人的剥削办法，在上海是相当普遍的。除以上几个例子外，其他如劝工银行大楼、东方饭店（即现在的上海工人文化宫）、中央大旅社、国泰电影院以及其他许多企业工厂的房屋，都是中国人向帝国主义者租地造屋，规定在20~30年以后，房子要归土地出租人所有的。租期长短，大致看建筑物的好坏而定，象永安公司这类钢筋

水泥房屋，一般租期为30年左右。过去一百多年中，帝国主义者把这种贪婪的制度搬到中国来，利用中国的土地，出租给中国人，从中国人身上榨取巨额款项，这种剥削行为，真正令人发指！

帝国主义分子在上海从房地租剥削而变成百万富翁的人，不在少数，如哈同、雷士德、馬立士、雪佛萊以及泰利公司的白兰、普益公司的萊文等，都是些冒险家，原来一无所有，到上海后凭借他们狡猾、狠毒的欺诈手段，利用中国土地进行投机，才“血手起家”，变为巨富。在这些冒险家中，哈同是具有最大典型性的代表。

哈同是英籍犹太人，1874年来沪，在老沙逊洋行任职，嗣于1886年转入新沙逊洋行工作。新沙逊洋行是靠贩运大量鸦片发家的。哈同在新沙逊工作期内，在这方面也搞到了一些钱，作为经营地产的资本。后来由于他担任了工部局董事，借职务上的便利，预知拓放马路的计划，就捷足先登以低价买进各要道地产，转瞬间，就获利几倍。

1904年，哈同在南京西路铜仁路建造了一座占地170多亩的爱儼园（俗称哈同花园）。他造这座花园的主要目的，除了自己享受外，还为了繁荣周围的市面，以抬高附近他所有的其他产业的地价。当时他的经济力量已很雄厚，非但在地产业中举足轻重，而且由于他在工部局有很大势力，在市政设施方面也能左右一切。例如通往静安寺的一、二路电车，到石门二路不再一直往西而折向北京西路套一大圈儿行驶，据说就是由于哈同不愿电车通过他所住的花园门口，才改道行驶的。

哈同洋行设立于1901年，是哈同独资经营的。他买进产业，大都不是一次付清价款，而是多次付清的。有时候买进一处后，即拿到银行去抵押，将押款再买另一处产业。他的收租条件也最苛刻，是按阴历月份计租的，这样每年就比阳历计算多收若干

天租金。哈同凭着这样一套剝削手段，在三、四十年間，便从一个身无长物的流浪汉，变为一个声名赫赫、腰纏万貫的大富翁。1931年哈同死时，他的遗产有27处之多，每年房地租收入250多万銀两。从哈同遗产及租金收入的情况来看，我們不能不惊讶他财富积累之巨和积累之快，也不能不痛恨他从房地租中对中国人剝削之深重和手段之毒辣。

在上海的帝国主义房地产商中，最具有垄断性和侵略性的，要算沙逊集团了。沙逊家族是犹太人入英国籍的，早在十九世紀初即在印度經營鴉片。他們凭借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統治，先后在孟买、加尔各答、馬德拉斯等处設立了分支机构，大量向中国推銷鴉片。<sup>①</sup>老沙逊于1830年前后到广州設立沙逊洋行，专事經營鴉片及进出口业。据上海英文《字林西报》載：“在第一次战争的混乱时期（指鴉片战争），因遭受到战争的影响，沙逊洋行和其他洋行一样在香港海灣避难，这些洋行都是在香港開設最早的洋行。1845年它們在上海開設了支行。”<sup>②</sup>可见沙逊家族早在1845年（一說1850年）即在上海开辟商埠公布地皮章程准許外人居留的第一年，就到上海開設了沙逊洋行。十九世紀后期，伊利·沙逊来上海設立洋行，經營同类业务。上海人因两个洋行都以沙逊为名，极易混淆，遂依其設立先后，分別以“老沙逊洋行”和“新沙逊洋行”称呼。其实新老沙逊是出于同一个家族。老沙逊洋行的业务，后来逐渐轉移或归并到新沙逊洋行，所以近几十年来上海臭名远扬的沙逊垄断集团，实际上都是新沙逊系統。

沙逊洋行初期在上海最主要的业务，就是大量販运鴉片。因

① 参阅陈真等編：《中国近代工业史資料》第2輯，三联书店1958年第1版，第62~90頁。

② 同上书，第38頁。

为整个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正是英国人販运鴉片来华的“黄金时代”，平均每年进口鴉片总值約在3,000万銀两以上。在1900年前后，沙逊洋行每年运进上海的鴉片都在4,000~6,000箱之間，大体等于全部鴉片进口总额的10%。

沙逊洋行在上海的主要活动，除大量販卖鴉片外，同时还进行房地产投机。老沙逊在上海的房地产投机，在1853年間就已开始，因当时正值太平天国奠都南京和上海小刀会起义，上海县城及邻近各县的富商地主，紛紛逃入上海“租界”，以致当时英租界內人口从500人左右突然增加到2万以上。沙逊和其他一些外国商人，便乘此机会借英国殖民主义的势力任意强占土地，建造简单木屋，高价出租。从1853年小刀会起义到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这一段期間，即为沙逊进行房地产投机的重要时期。当时沙逊洋行內設有地产部，作为专責經營机构。沙逊所占有的房地，遍布于南京路、北京路、二馬路（即九江路）、三馬路（即汉口路）、四馬路（即福州路）一带熱鬧地区。

1900~1920年間，几乎是沙逊在中国壟断鴉片販卖的疯狂时期。1907年，腐敗的清朝政府与英国政府訂了一个协定<sup>①</sup>，双方同意在十年內禁絕鴉片。在这十年內，中国方面每年减少十分之一的种植量，到第十年完全禁絕；英国商人也每年减少十分之一的鴉片出口量，到第十年禁絕。这样一来，中国国内生产是减少了，公开的进口也减少了，可是由于吸鴉片的人并没有减少，于是就发生供不应求的现象，市面上的鴉片价格随即飞騰上涨。此时上海沙逊家族及其他一些經營鴉片的英国商人，便在租界內利用帝国主义特权，疯狂走私，高价出售；尤其是沙逊家族与

<sup>①</sup> 参閱威罗貝：《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三联书店1957年第1版，第671頁。

新康洋行共同組織的鴉片托辣斯，几乎壟斷了鴉片市場，并拒絕履行十年期滿完全停售鴉片的協定，從而掠奪到一笔驚人的財富。有人估計，仅在1907年到1914年这短短几年中，沙遜家族在販賣鴉片中所得的暴利，就有2,000万兩銀子以上。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后，新沙遜仍在中国經營鴉片及進出口貿易，在印度經營紡織業。大戰期間，沙遜利用戰爭機會，囤積居奇，投機倒把，又獲得了一笔厚利。大戰結束後，由于日本及印度紡織工業崛起，鴉片經營又為中國人民反對而漸趨沒落，因此，自1920年起，沙遜家族便將沙遜洋行改組為新沙遜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以經營房地產業為主了。新沙遜于1926年設立華懋地產公司，于1928年在上海設立遠東營業公司，經營地產及金融投機。華懋地產公司專責經營房地產業務；新沙遜公司本身則負責資金調配。1928年又設立了上海地產投資公司專營地產。1930年設立新沙遜商業銀行上海分行，負責資金的籌劃調度，對各地產公司給予指導和監督。1934年又設立了一個與中國官僚資本合作的中和地產公司。計自1920年到1935年間，沙遜家族以其毒辣手段，乘世界經濟危機的機會，先后兼併了李鴻章、盛宣懷的大量遺產及愛爾德、高易、業廣等地產公司的房地產，大興土木，建築了不少高樓大廈，如十八層大樓（茂名公寓）、十三層大樓（錦江飯店）、華懋飯店（和平飯店）、河濱大廈、漢彌登大樓（福州大樓）、都城大樓、開文公寓等等。

此外，在帝國主義分子控制下的上海天主教會，也壟斷了大批房地產，其中計有法國人的天主教上海教區和首善堂，比國人的普愛堂，西班牙人的修德堂，另外還有三德堂、方濟堂、拯亡會等等，名目繁多。解放以前，這些天主教會在上海市內共占有土地几千畝，房屋近100萬平方米。單是天主教上海教區就

占有土地 2,000 多亩,房屋 4,000 多幢(多数是里弄危险房屋)。首善堂、普爱堂、三德堂也各占有 10 多万平方米的房屋。这些天主教会除了将房屋高价出租外,它们也同其他帝国主义房地产商一样,兼做抵押、买卖等投机活动,经常与金融机构勾结往来。这些教会的大量房地产,多数是从中国教友那里诈骗过来,或是从农民那里掠夺过来的。它们将从教友和农民那里骗取来的空地,出租给他人造屋,租期满后(一般为 20 年租期),房屋即无条件归教会所有。同时,教会也利用历年所收的房租、地租和捐款,兴建了一些房屋出租。因此,上海的几个天主教会,就逐渐成为利用房地产贪婪地直接剥削上海人民的投机机构。

更严重的,是帝国主义企业利用上海土地作资本,进行高额利润的榨取。大家知道,上海是帝国主义者对我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中心,帝国主义最主要的金融机构、运输机构、工厂、仓库、码头及进出口贸易等都集中在这里。因而,上海的土地也便成为它们的掠夺对象。抗日战争以前,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工商企业在上海占有的土地总数约 16,000 亩,其中 80% 都集中在 30 多家垄断企业手中。英帝国主义的亚细亚火油公司、怡和洋行(包括怡和纱厂、公和祥码头)都占有土地 1,000 亩以上。美帝国主义洛克菲勒财团的美孚火油公司、德士古火油公司,日本帝国主义的三井洋行、内外棉厂、公大纱厂、同兴纱厂等,都占土地 500 亩以上。

帝国主义垄断企业在上海所掠夺的土地,是它们资本构成的主要部分。土地是不动产,但帝国主义企业由于有银行的特殊支持,可以得到土地抵押借款的特殊便利;同时,因地价不断上涨,土地又成为它们扩大资金、增加利润、抬高信用的有力工具。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内外棉厂,1934 年实收资本额为

2,400 万日元；它同年下期的固定资产，包括土地、房屋、机器设备共计 3,372 万日元。当时它在公共租界占有土地 697 亩，照公共租界工部局 1933 年估价以平均每亩 33,877 两计，土地总价值为 2,361 万两，等于它全部固定资产的 70% 以上。<sup>①</sup> 他如日本人的丰田纱厂、上海纺织株式会社、日华纺织公司等等，情况也都如此。由此可知，土地在帝国主义企业的资本构成中占着如何重要的地位，在它们榨取高额利润中成为如何重要的“资本”！

帝国主义者在上海究竟掠夺了多少土地呢？据统计，1933 年时总数约 55,360 亩（包括帝国主义房地产商以及帝国主义企业、教会、社团、私人占有地产），其情况如次表：

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土地占有<sup>②</sup>（单位：市亩）

	英 国	美 国	法 国	日 本	德 国	其他国家	合 计
公共租界	16,904.9	1,598.7	587.7	2,855.4	147.9	240.6	22,335.2
法租界	3,641.2	2,048.3	4,440.5	216.8	0.4	1,381.0	11,728.2
越界区	17,892.9	1,000.0	—	2,403.7	—	—	21,296.6
1933年合计	38,439.0	4,647.0	5,028.2	5,475.9	148.3	1,621.6	55,360.0

说明：其他国家系指资本主义国家。

帝国主义者在上海掠夺的土地，在抗日战争以前，单在公共租界这 22,335.2 亩土地，照工部局 1933 年的征税估价平均每亩 33,877 两计<sup>③</sup>，其地价总数即达 756,642,795 两。因而这些

① 张省梅编：《日本在沪投资》，商务印书馆出版。

② 参阅吴承明编：《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第 1 版，第 68 页。

③ 工部局的土地估价，是作为它的征收地价税的标准。这种征税估价，在 1931 年以前，一般低于市场买卖价 20~50%；1933 年以后因经济恐慌，市场地价跌落，征税估价高于市价。

地价竟然也成为他們的所謂“投資”，成为剝削中国人的“資本”。

由于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广占土地，又不断哄抬地价，他們的所謂土地投資在各类企业中便占着很大的比重。1936年英国在全中国虛假的賬面企业投資額为金融业16,921.2万美元，貿易业23,016.8万美元，运输业7,923万美元，矿业3,415.7万美元，制造业10,733.6万美元，公用事业3,110.8万美元，六类企业合計为65,121.1万美元，除其中有18,622万美元为房地产外，只有46,499.1万美元；同年英国在全中国占据的包括企业和非企业房地产为40,572.4万美元。又法国1936年在全中国虛假的賬面企业投資額为金融业3,626.9万美元，貿易业999万美元，运输业4,472.2万美元，制造业351.9万美元，公用事业1,317万美元，五类企业合計为10,767万美元，除去其中房地产831.4万美元外，只有9,935.6万美元；而同年法国在全中国的包括企业和非企业的房地产为8,602.3万美元。<sup>①</sup>从这些数字的对比来看，就更加充分說明了帝国主义在旧中国土地掠夺的严重及其企业投資的虛假。

## 第二节 美帝国主义利用剩餘軍用物資 掠夺中国房地产的陰謀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帝国主义独霸中国的狼子野心，彻底暴露。它一方面进一步利用蔣介石作为鎮压中国革命的御

---

<sup>①</sup> 參閱吳承明編：《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資》，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版，第161、173頁。

用工具，另一方面則用其儲存在太平洋區域的軍用剩餘物資，作為擴大侵略勢力的釣餌。

美國運存太平洋地區的戰時簡制軍用品，在戰事結束後，從經濟價值來看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這些簡制軍用品如果運回美國，連運費都不夠；如果就地傾銷，則戰後亞洲各國滿目瘡痍，根本沒有市場；如果繼續儲存，則倉儲費、保管費及損耗等更要大虧其本。所以實際上這些剩餘物資等於廢物。因而美國國會還在1944年肯定戰事即將結束時，就修正了剩餘物資法案，授權國外物資清理委員會來處理堆置在太平洋地區的這一批廢物。它的所謂清理，實質上就是要這個委員會去尋找國外市場，設法收回這些廢物的成本。

1946年國民黨反動政府與美帝國主義訂立了“中國與美國買賣剩餘軍用物資合同”，美國就用一部分價款3,500萬美元，專作購買中國的房地產之用。合同中明文規定：“等於美金3,500萬元之款項，用以支付美國政府在中國之費用，其數額以每次不超過等於美金200萬元為限，及用以購置指定之不動產及其改良設備，供美國之用，該不動產等，由中國按兩國同意之價格，從速撥售。”這充分表明了美帝國主義利用這批廢物換取侵略基地以及國民黨反動派利用這批剩餘軍用品來進行反人民的內戰而不惜出賣國家主權的罪惡勾當。合同簽訂之後，美國公使巴德華又於1946年12月給南京反動政府一個照會說：“協定中規定中國政府將若干產權轉讓與美國，並對美國于取得其他若干財產時，給予便利。美國政府認為關於此項財產之轉讓，除為呈遞文件，得予酌收之費用外，應予免收任何捐稅費用及其他課稅。”試看，美帝國主義者竟如此寡廉鮮耻，以一批廢品換取了大量房地產猶不足，還想獲得豁免任何捐稅之特權。但國民黨反動政

府对此苛刻要求，也竟予允諾。在租界时期，中国对于租界内之土地，尚有課稅征收权，而此項售予美帝国主义的财产，則連征稅权亦被取消，丧权辱国，无过于此。

自“合同”訂立后，美帝国主义即指定对其进行侵略最有利的地区及房屋强制购买。其指定的地区中，計有上海、南京、汉口、广州、青島、天津、台北、沈阳、重庆、昆明、北京等十几个大城市，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地区。其在各城市指定购买的地段和房屋又很多都是国防要塞或名胜古迹地区。由于美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宋子文这一笔买卖是十分丑恶见不得人的勾当，所以合同内容及其购买房地产的經過都諱莫如深，对中国人民极尽欺騙之能事。1946年9月1日《申报》所载：“宋院长与美国麦克布共同发表关于在西太平洋及中国大批民用剩余物资让售予中国政府一般合約的簽訂”一項声明，就完全是欺騙中国人民的花招。原合同里明明指的是軍用剩余物资，而在宋子文的声明里則說是“民用”剩余物资；在合同里明明规定了美帝国主义要用3,500万美元在中国各地购置不动产，而在声明中則說这3,500万美元是为了“在中国設領館及其他开支”。这显然是在用欺騙手法蒙蔽中国人民的耳目。

买卖軍用剩余物资合同簽訂后，立即又簽訂了补充合同，规定美国所拟攫取之房地产包括两大类：第一类原为中国公产，应由国民党反动政府立即移交給美帝国主义的，如南京西康路18号等5处高楼大厦（当然不只这5处）。第二类系中国人民的私产，但美帝国主义认为合用的，应由国民党反动政府协助美方强购；这一类私产被美国强迫购去的，計有南京的宁海路、上海路、頤和路、湖南路、江苏路等处的房地产，重庆的两浮支路185号，昆明的巡津新村10号、螃蟹巷5号，上海的武康路280号、安和

寺路 248 号等处。根据极不完整的资料，先后被美帝国主义强购去的有南京、上海、汉口、广州、青岛、天津、台北、沈阳、重庆、昆明、北京等大城市中 70 处以上的房地产。凡被强购霸占去的房地产，大都是巍峨大厦，富丽堂皇，为各大城市之精华和要津。这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被中国人民赶走前在大陆上所干的肮脏买卖之一。

根据这一笔肮脏的买卖，美帝国主义者不仅在中国攫取到了大批房地产，最重要的是通过占有这些房地产而得到了各种各样的特权：

1. 凡是被美帝国主义占有的房地及其附近地段，都警卫森严，成为禁区。这是罪恶的租界制度的复活和扩大。

2. 凡是被美帝国主义霸占去的房屋土地，都是各大城市的要冲地带，它们在这些地带驻兵演习，部署军事设备，使之成为太上军区及特务活动的巢穴。

3. 凡是被美帝国主义占去的房地，可以享受特权，不缴任何捐税。

由此也可以看出，蒋介石卖国政权是如何奴颜婢膝，腐败到了何等程度！

## 第五章 帝国主义对中国工矿业 的兼并和掠夺

### 第一节 帝国主义对中国工业的兼并掠夺

帝国主义是不希望中国发展工业的。因为帝国主义抱着这样一个卑鄙目的，所以它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来阻止中国工业的发展，企图使中国永远成为它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它们除垄断中国金融、控制中国海关、操纵中国的国际贸易、掌握中国的海陆交通等等，以扼杀中国工业的发展外，还对中国已经兴起的一些幼稚工业也极尽摧残打击之能事，穷凶极恶地采取兼并、掠夺等等手段，企图打垮中国工业，壮大它们自己的侵略势力。

帝国主义对中国工业的并吞，主要是通过其金融侵略势力，利用中国关税不自主而实现的。

帝国主义在中国设立的许多银行，除了支持外商企业的扩展外，它们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直接间接地兼并我国工矿企业。

前面说过，帝国主义银行一般是不对中国工矿企业放款的，但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就是它们认为某一华商企业很重要、很有发展前途，它们想阴谋兼并或吞食的时候，便在苛刻的条件下对其放款，以便通过高利贷的形式加以并吞。例如日本帝国主义

为并吞盛宣怀等官僚资本办起来的汉冶萍公司，就由正金銀行和台灣銀行等出面大举貸款。日帝国主义最初的貸款条件为汉冶萍每年供給日本鉄矿砂，让它运往国内作为制鉄制鋼的原料。自1902年到1911年，貸款总数近1,500万元，利息均在6厘以上。日本帝国主义貸款的目的：一为取得原料，控制汉冶萍地方丰富的煤、鉄矿产資源；二为收取高利貸利息；三为以后兼并伏下引綫。果然，到1912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就阴谋实施并吞，于2月10日由正金銀行經理小田切万寿之助和日本国营制鉄所长宮中村雄次郎，与汉冶萍煤鉄矿有限公司总理盛宣怀的代理人李維格，同时訂立了两个合同。第一个为公开的所謂汉冶萍公司預借矿砂价值的合同，规定由正金銀行貸給汉冶萍300万日元，年息7厘，并言明：如中国发生变乱，或因公司经营困难，即可由日方銀行和制鉄所暫作公司之代理人，代办煤鉄矿石的开采、搬运供給等事宜。另一个是在东京簽訂的所謂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的特別合同，这个特別合同議定：“……应須严密保管，非立合同人两面同意，則不得示知別人。”<sup>①</sup>根据这两个合同，规模巨大的汉冶萍煤鉄公司实质上已完全为日本帝国主义所操纵了。因为：1.公司全部财产已作为貸款押品，不得有自由处理权。2.公司所属的广泛矿区，非經日人同意不得轉让他人开采。3.公司购买机器材料，一切均須向日本采办；聘請技師，应聘用日人；所出矿砂应优先卖給日人。4.銀行貸款利息奇高，最低6厘，有高达1分以上者；但产品鉄矿砂的售價，因规定必須卖給日本制鉄所，則远較国际市场为低；这样公司营业便永无

---

① 汪敬虞編：《中国近代工业史資料》第2輯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125頁。

起色，永远背着高利贷的包袱，带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枷锁。<sup>①</sup>

湖北水泥公司成立于1910年，系湖北地方人士程听彝创办，厂址设在大冶石灰窑，原定股本120万银两。开办后，买地建厂，购买机器，建造码头、驳岸以及轮船、船等，需款浩繁，因而开办不久，就负债85万银两。到1910年，程听彝不得不以本厂名义向日本三菱洋行借款36万日元，年息7厘，议定分6年归还，每年还本6万元，以该厂附图及全厂机器清单以及将来扩展之机器、房屋、地皮、石山等作担保。至1911年又向三菱续借36万日元，每年分两期应还款12万元，利息另付，规定到期如不归还，即应将担保品及产品变价归款。1911年第一期款还清后，该厂对第二、三期款因无现款清偿，要求缓期；三菱存心打击，绝不通融，到11月间即要求鄂督黎元洪封厂。1913年2月间，三菱更通过日本驻汉口领事出面压迫，黎元洪便向帝国主义者屈服，发令查封。据当时黎元洪向北京政府工商部电称：“23日下午，日领来都督府询问此案究竟，以限期两日偿还欠款，否则封厂为请。元洪尚为请缓，该领则谓案已发生数月，该总理始终支吾，刻下万无再待之理。又正词严，无可拒駁，又恐激生事端，有损国体，只得允如所请。”<sup>②</sup>于是，这样一个粗具规模的现代化水泥工厂，便在帝国主义的侵蚀和压迫下夭折了。这一事实的经过，一方面说明了帝国主义者摧残中国民族工业手段之阴险毒辣，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脆弱，以及封建官僚的懦弱无能：竟将一个财产价值近200万元的工厂，仅负

① 参阅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119~126页。

② 同上书，第408页。

債約 70 萬元，即恐“激生事端，有損國體”，而遵從帝國主義之命，予以摧殘了。

帝國主義施展陰謀、運用經濟壓力兼併中國紗廠的事例更多。1913 年以前被英、日兩國兼併的就有上海的裕晉、興泰、大純、九成等 4 個紗廠；1914 年以後被兼併的有上海公益、鄭州豫豐、天津裕大、天津寶成、漢口第一、上海三新、華豐、崇信、振華等 17 個紗廠；前後被兼併的紗錠總數達 770,664 枚。在 1936 年抗日戰爭前夕，帝國主義分子在華紗錠有 2,356,404 枚，其中近三分之一都是兼併中國紗廠後增加起來的。他們兼併的方式，大多是先借款，然後被賤價拍賣或收購。如漢口第一紗廠是先由沙遜洋行和安利洋行借款 300 萬元，後於 1929 年被沙遜接管去的。鄭州豫豐紗廠是先由慎昌洋行借款 200 萬元，後因無力償還債務而被接管的。上海寶成一廠、二廠，是由日本東亞興業銀行借款 500 萬元，後於 1925 年被拍賣的。崇明大生紗廠是先由匯豐銀行借款，後於 1935 年被拍賣的。

此外，中國一些尚處於萌芽狀態的捲煙廠、麵粉廠、造紙廠、電燈廠以及煤礦、鐵礦公司等，被帝國主義先以借款、押款為誘餌，然後被扼死、被擠垮、被吞併的，更不知凡幾。法商東方匯理銀行在雲南地區，德華銀行在山東地區，日商銀行在東北一帶，英商銀行在上海、天津、漢口及華南各地，都十分惡毒地對中國工礦企業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過各種破壞活動和兼併陰謀。如門頭溝煤礦於 1911 年被英帝國主義兼併，焦作煤礦於 1915 年亦被英帝國主義兼併，撫順和本溪湖煤礦於 1905 年被日本帝國主義強占，井陘煤礦於 1902 年被德帝國主義侵入。帝國主義銀行用中國人的錢，借給中國人，通過高利貸形式而兼併中國工業，作法是十分惡毒的。至於帝國主義銀行及房地產商用貸款

抵押方式而并吞中国人产业的案件,更是数以百計千計。

茲將帝国主义自 1897 年至 1936 年兼并中国紗厂的情况,列表于下<sup>①</sup>：

兼并時間	被兼并厂	被兼并时的紗錠数	兼并者
紗錠合計数		770,664	
1897	上海裕晋	15,000	协隆紗厂
1902	上海兴泰	15,000	日本三井物产会社
1906	上海大純	20,392	日本三井物产会社
1908	上海九成	9,424	日本棉花会社
1918	上海裕源	26,936	日本内外棉紡織会社
1921	上海公益	25,676	英国怡和洋行
1923	郑州豫丰	50,000	美国慎昌洋行
1923	天津宝成	25,000	美国慎昌洋行
1925	天津裕大	30,000	日本东洋拓殖会社
1925	上海宝成一厂	41,472	日本东亚兴业会社
1925	上海宝成二厂	69,952	日本东亚兴业会社
1926	上海华丰	25,600	日本日华会社
1927	上海統益一、二厂	44,544	英国庚兴洋行
1929	汉口第一	88,160	英国安利洋行
1931	上海三新	69,000	英国汇丰銀行
1932	上海崇信	34,000	英国庚兴洋行
1936	唐山华新	26,800	日本东洋紡織会社
1936	上海振华	13,548	日本内外棉紡織会社
1936	上海同昌	11,500	日本内外棉紡織会社
1936	天津宝成第三	27,028	日本东洋拓殖会社及 日本大阪伊藤忠商事会社
1936	天津裕元	71,360	日本大仓洋行
1936	天津华新	30,272	日本鍾淵紡織会社

帝国主义者为什么能够通过經濟压力而并吞中国工矿企业? 而中国工矿企业又为什么要饮鸩止渴向帝国主义借款? 这

① 严中平等編：《中国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选輯》，科学出版社 1955 年第 1 版，第 138 頁。

就不能不談到中国海关不自主、封建政府压榨以及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資本双重压迫下中国民族工业所遭受到的厄运和衰落情况了。我們必須指出：关税权的丧失，对我国民族工业是一致命打击。通常外国貨进口，由于征收了一定的关税，其价格势必增高，这样就很难在市场上与国产品竞争，所以任何独立国家，为了保护国民經济的发展，都采取保护关税政策，对某些不利于国民經济的进口貨，用征收高额进口稅的办法，使其价格昂貴，根本不能在國內市场上推銷或与国产品竞争。但解放以前，我国情况則完全不同。我国民族工业不仅沒有受到关税政策的保护，反而还受到它的打击。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享有特权，它們的商品繳納輕微的进口稅后，就可在全中国暢銷无阻，任何地方不得再征捐稅；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經營的許多工矿企业也享有特权，它們受外国法律保护，照外国法律办事，中国民族工业不能与之立于平等地位。就捐稅負担來說，中国工厂的产品，要納关口重重的“厘金”，而帝国主义工厂的出品則按照洋貨納一道2.5%子口稅后，即可在全国通行，中国官厅不得再用任何名义对其征稅，如果稍有触犯，帝国主义国家的大使、公使、領事便出面交涉，因而即使在軍閥割据混战时期中国商品到处受阻、到处抽稅的情况下，帝国主义企业的商品却不受影响，仍然安全运銷全国，不怕有什么风险。国民党反动政府时代虽表面上廢除了“厘金”，但事实上，各厂产品繳納出厂稅后，各地方軍閥仍然稅卡林立，任意抽征。这种稅收負担上的軒輊，显然是有利于帝国主义企业，而十分不利于华商企业。在1925~1927年間，华商烟厂风起云涌，但1928年以后，忽轉失敗，其关键全在征稅之不平等。1928年国民党政府举办卷烟統稅，国产品稅額比舶来品增收2.5%；而舶来品进口，又不繳2.5%奢侈稅，

則國產品實際上等於增收統稅 5%；同時英美烟草公司又以先墊稅款之故，繳稅方面得享優越權利；華商烟廠處此情勢之下，自必難以立足。這裡所謂英美烟草公司享受的“優越權利”，就是指宋子文做國民黨政府財政部長時，以英美烟草公司預付一筆稅款為條件，竟將該公司應評為七級的高級香烟降低為三級或五級課稅，因之，華商稅負較高，無法與其競爭，不能不趨于失敗。

和封建政府有密切聯系的張謇在論到稅負的時候，也坦白地說道：“洋貨稅，向定值百抽五，再子口半稅以抵厘金，則口岸銷售洋貨，為 5% 之稅，內地銷售洋貨，為 7.5% 之稅。……此就表面言之，固無人不知者也。今試問口岸之洋貨，果盡入內地否？即入內地，果盡完子口稅否？檢海關貿易冊，每年子口稅，能得正稅之几成，觀其年短一年，不可不深求其故。凡口岸之洋貨，就地歸商店售賣，化整為零，即多不在應納厘金之限，名為化厘為稅，實多化為無。蓋此子口稅之必不能符正稅之半數，自昔已然。迨今口岸日多，所接近之內地亦日益相懸，馴且洋貨止有正稅，几無復子口稅，則并厘為稅之文，將成虛設。洋貨在其本國，大率免出口稅，銷至我國，完至輕之正稅，其子口稅名完而實免。分運熟貨固如是，采購生貨亦然。外商貨物，成本皆輕，足以制內商之死命而有余矣。”<sup>①</sup>張謇是南通大生紗廠的創始人，他的看法，頗足以代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對稅收方面只利洋商而不利華商的一種怨憤。又據 1913 年 8 月 23 日《時報》載：旅滬客幫商務聯合會，以洋土貨稅則不平，致土貨銷路阻塞，特

<sup>①</sup> 汪敬虞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 2 輯上冊，科學出版社 1957 年第 1 版，序文第 35 頁。

开会議决定，发出通告云：“敬启者，本会調查近年国貨改良，足以抵制外貨者甚多，如絲光布、电光布、格子胶布、爱国布以及絲光被面、絲絨、絲袜、綫嘑嘑等，皆因稅則不平，阻碍銷路，甚且以真正国貨借用洋貨派司，希图免稅，言之痛心。”这一个通告，充分表露了上海商人对于稅則不平之抗議，以及中国稅收只利洋貨而不利国貨之实情。本国产品在本国銷售，为了減輕稅負，竟忍辱作弊，借用“洋貨派司”，豈非天大笑話！1916年的关册貿易总論說：“中国已开始制造棉法藍絨与棉毯，惟此种貨物与同种日貨竞争，今已知其全无获胜可能。盖1858年天津条約规定外貨課从价稅5%，而1902年修訂之进口稅則，使日貨稅負实不及5%，影响所及，直使国内产业无复生理。”在这样不公平的稅收制度下，国貨負担重、成本高、貨价昂，如何能与外貨竞争？所以連帝国主义者主編的关册也不能不說已知其“全无获胜可能”，“直使国内产业无复生理”了。

除了棉紡业的稅負奇重外，中国矿业及其他各业的苛捐雜稅也十分严重，大大影响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以矿产品而論，課稅有7种之多：

- (一) 海關稅(复进口稅亦隶此类)：抽出口貨值5%。
- (二) 常關稅：一次繳納貨值1.5%之通行稅。
- (三) 厘金：随卡随算而异其稅率，可謂全出于稅吏之私意。
- (四) 矿产稅：交納出井矿稅，其数如下：
  1. 凡煤炭每噸納銀1錢；
  2. 鉄苗每噸納銀1錢；
  3. 凡此矿专系黄金或白金或銀，按照市价，抽取10%；
  4. 凡他項矿质中，含有黄金或白金或銀，其成数多少无定，应临时查其所得金、銀实数，按照市价，抽取5%；

5. 凡汞苗与錫苗及銅苗,按其价值,抽取3%。

(五) 矿区稅: 所領之矿地, 应按年遵照下开各条納矿界租:……

1. 按(《大清矿务章程》)第十一款丙字(編者按:指錒、鉍、鉀、銀、鎳、鎘、鈷、金、鉍、鉄、鉛、錳、汞、鉬、鋳、銻、鉑、銀、錫、鈾、鋅、軟石油、矿油类、地瀝青、柏油、硬煤、烟煤、木煤、硫磺、宝石)除金、鉑、銀、宝石外,其余各矿质,按年每一矿界繳租銀3两,合每亩銀2錢;

2. 金、鉑、銀、宝石各矿,按年每一矿界繳租銀4两5錢,合每亩銀3錢;

3. 略;

4. 此項矿界年租,乃在地面錢糧之外。

(六) 地稅(略)。

(七) 杂稅:以省稅、地方稅为多。<sup>①</sup>

再如云南箇旧之錫矿,均按純錫征稅,惟間有按苗价值取2%,以供修筑道路費者。純錫每庄(約一又三分之二吨)应有稅单2紙,計納捐稅7种:

一、常备軍餉	庫平 69 两
二、北京学生津貼	庫平 1 两 8 錢
三、照費	庫平 4 錢
四、厘金	庫平 16 两
五、太平会	市平 1 两
六、秤費	市平 1 两

<sup>①</sup> 參閱汪敬虞編:《中国近代工业史資料》第2輯下冊,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1130~1131頁。

## 七、岳庙

庫平 5 兩

此外，还有印花稅及所得稅，中国工礦企业都要照章繳納；而帝国主义企业則受本国法律保护，中国官吏不能查它們的眼，稅款也可以不繳。所以单从稅收負担上来看，由于过去反动政府对帝国主义的进口商品和在华企业百般优待，对本国商品則苛捐勒索，关口重重，結果我国民族工礦企业就正如張謇所說：“足以致內商之死命而有余矣！”

总之，解放以前，我国国民經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資本的双重压迫下，完全处于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落后状态。在帝国主义金融資本的操纵和打击下，我国工礦企业的資金始終十分枯竭；不仅无法与外商竞争，甚至不得不向帝国主义資本家登門借債，仰人鼻息。例如，我国最大的民族資本工业——拥有 9 个紗厂的申新公司和拥有 11 个面粉厂的福新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即該兩公司营业最旺期間，也不能不借外国資本接济；1917 年申新紗厂向日本中日实业公司借 40 万日元，到 1922 年申新紗厂又向日本东亚兴业借款 350 万日元。大工业尚且如此資力不足，頻頻举借外債，小型厂商的資金困难情况，更可想而知了。1936 年在上海的英帝国主义者的工厂平均每家賬面資本为 302 万元；美帝国主义者的工厂平均賬面資本为 134 万元；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工厂平均賬面資本为 106 万元；而中国有 30 个工人以上的工厂平均每厂只有 14 万元資本。因为中国已被帝国主义的鴉片傾銷、战争賠款、貿易入超以及金融势力的榨取，弄得山穷水尽、罗掘俱空，哪里还有力量来从事工业建設！所以，前清大官僚李鴻章、張之洞、盛宣怀等虽然也曾举办一些官督商办性质的工礦企业，但結果这些企业不是被帝国主义者挤垮，就是被兼并吞沒。历史悠久的上海裕順面粉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

即因資金周轉困難而為日本內外棉廠賤價收購。上海製造絹絲公司，也因經營困難而為日本鐘淵紡織會社所兼併。我國自辦的一些工礦企業，既因資金薄弱、稅捐奇重而負債累累，無法與帝國主義企業競爭，私人稍有資財者遂亦裹足不前，不敢再冒風險，他們或將資金存入帝國主義銀行希圖保本，或買帝國主義企業股票和公司債，妄想依靠帝國主義勢力分得一杯殘羹。這樣一來，帝國主義在華經濟勢力益占上風，而民族工商業則每況愈下。以鋼鐵工業而論，從張之洞於1890年（光緒十六年）創辦漢陽鐵廠起，至1949年全國解放，將近60年的時間，關內鋼產量最高年產只有9萬多噸，連日本人在東北經營的鞍鋼算進去，全國鋼鐵最高年產量也不過90萬噸左右。以航運業而論，自1872年李鴻章收購美商旗昌洋行的一些破舊船隻成立招商局起，一直沒有什麼發展；1907年招商局有輪船29艘，49,536噸位，到1930年噸位雖然增加了一些，達54,535噸位，但輪船隻數反而減到只有24艘了。差不多與招商局同時成立的日商日清輪船公司，在1907年時只有輪船14艘，總數29,353噸位，但到1930年輪船增加到27艘，總數達55,577噸位。紡織工業方面的淒慘情況，在華商紗廠聯合會1935年5月的一個報告中明顯談到：“吾業困苦日趨深刻，在過去一年中，會員之停工停業，時有所聞，停工已久者，有上海隆茂、天津恒源、武昌震寰、啟東大生第二諸廠，現隆茂經蘇綸收買，已改為蘇綸分廠，其餘均尚未复工。溥益一、二兩廠，春初停工月余，改組為新裕紡織公司，天津裕元，自去春減工后，更于去冬停工，本年三月宣告解散。上海民生紗廠，春初停工，擬召新股，再圖復業，奈以銀根奇緊，募股不易，亦經宣告清理。上海申新七廠，二月間曾以債務關係，為匯豐銀行非法拍賣，幸賴當局及各界援助，未致實行，其第二、

第五兩廠，以營業困難，亦暫時停工。”上海絲廠的窮窘境況，據1935年3月2日報載：“上海絲廠，自絲價慘落，外銷滯塞，皆相率停工，截至去年十二月，開工絲廠僅達十六家，而今年開工絲廠，已僅三家，開車總數不滿七百架，較去年同期，僅十分之一。”作為中國工業兩大代表勢力的紡織與絲業，尚且如此困窘，其他工業，當然更是一蹶不振了。

## 第二節 英國對開灤煤礦及法國對 求新造船廠的掠奪

帝國主義除通過經濟壓力兼併中國工礦企業外，有時竟使出強盜手段掠奪中國重要的工礦企業。英帝國主義掠奪開灤煤礦的手段就是最卑鄙的。清朝政府於1877年成立開平礦務局，原資本額150萬兩，以後逐年擴充，發展很快，到1900年義和團事件時，已經成為中國唯一規模龐大的煤礦企業。“八國聯軍”入侵後，英軍誣蔑礦務局長張翼“通匪”，把他逮捕；在張翼被扣期間，英帝國主義者百般脅迫，使其出賣礦局。張翼被釋放出來後，即以保護煤礦為名，私自派出曾任天津稅務司的德國人德璀琳，與英商墨林的代表胡華（美國人，當時任開平礦務局工程師，即後來在1930年前後擔任過美國總統的胡佛，他幫助英國人詐騙開平煤礦的卑鄙手段，競選總統時曾被民主黨人寫的一本《胡佛小史》予以揭發）談判訂立“賣約”，將開平賣給墨林。墨林奸詐地將“賣約”竄改成一份假合同，請英國領事證明，再轉一手將開平煤礦賣給了東方辛迪加。東方辛迪加是英、法、比資本家集團組織的，墨林有很大股份。依據“賣約”所載，出賣的財產除唐山、

林西、胥各庄三个煤矿外，还包括承平銀矿、秦皇島地皮 4 万亩、新河地皮 8 万亩、运河十四、五里以及天津、塘沽、烟台、牛庄、上海、香港、广州等 8 处碼頭，暨上述各地及在杭州、苏州、吳淞、胥各庄、天津英租界等地的地皮 100 多亩。此外尚有輪船六艘以及建平金矿、永平金矿、洋灰厂和津塘鉄路的股份等等，财产之大，真是惊人！墨林依据“卖約”，成立了一个“英国有限公司”，即开平有限公司，名义資本 100 万鎊，规定以 37.5 万鎊的股票分給中国老股东，作为一切权利利益之完全賠償。这 37.5 万鎊股票，折合当时銀价，約值 340 万两，与当时开平的全部财产总值相差不远，表面上似属公平；但一研究实质，則完全是一幕駭人的騙局。原来所謂 100 万鎊股票，除分給中国老股东 37.5 万鎊外，計墨林分得 5 万鎊，东方辛迪加 15 万鎊，东方辛迪加指定之人分得 424,993 鎊，另 7 鎊酬劳签押人。这个英国公司的所謂 100 万鎊股款中，至少有 50 万鎊沒有繳过股金，純属虛股，完全是以虛股套实股的欺詐做法。尤其是东方辛迪加指定这一笔，甚至伦敦法院的判詞中也說：“此 42 万多股，并未于該公司詳細節目外載明已繳足……又何为而給予东方公司（即辛迪加——編者）指派之人 424,993 股？本官（法官）欲求其故而不得。然就审讯时所得之实情而論，被告公司騙去 425,000 股者，盖非无因”。<sup>①</sup> 因为中国人原有的实股，被英国人的虛股冲淡了，所謂 37.5 万鎊股票，只得到了原有财产权利的 37.5%，其余仅凭一张“卖契”便被英国公司的虛股騙占去了。而且后来連中国股东所分到的 37.5 万鎊股票，也在帝国主义的威胁下，被英国人賤价

---

① 參閱汪敬虞編：《中国近代工业史資料》，第 2 輯上册，科学出版社 1967 年第 1 版，第 61~68 頁。

收购而去。从此，这样大规模的、年产150万吨煤的开平煤矿，就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英帝国主义掠夺去了。

开平煤矿被英帝国主义掠夺去后，清朝政府鉴于损失太大，曾一度要求出价买回，并曾派人到伦敦法院去控告；但英帝国主义者对于这个已经掠夺到手的丰硕赃物，焉肯轻易撒手，所以，虽经长期交涉，赎回一节，完全无望。

开平煤矿既不能收回，清政府乃决定在开平附近的灤州另行创设灤州煤矿，以与开平相抗衡。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即以天津官银号名义集股开采，议定招商股200万两，后增至500万两，但实收仅300万两，仍属官督商办性质。灤州煤矿开采后，生产颇旺，当时在清政府当权的袁世凯曾梦想以灤州矿和开平矿竞争。1910年，直隶总督陈夔龙奏议收回开平矿，主张“……依据外务部前致英使节略宗旨，……拟具说帖，声明当日骗诈行为，引证切实案据，派员向英使解释，并派洋员马尼尔等赴英，向英外部详晰剖陈。……以为完全收回地步。至是洋员即本此往复辩难，抗议半年，英外部及英公司时而恫吓，时而要挟，变幻多端，无所不至”<sup>①</sup>。初英方漫天讨价索款270万镑，后减至178万镑，收回之议，原有达成的希望，故陈夔龙奏称：“……此案轆轳多年，中外注视，如能……全数收回，虽国家暂时担任百数十万镑之债票，而全矿产业皆为国家所有，每年进利足抵本息而有余。且此项矿界，范围极广，将来逐渐开采，洵为莫大利源，较之责认副约、空言合办，权利尽属外人者，此中得失，相去天渊。况秦皇岛通商口岸，关系国家疆土，尤非寻常矿产

<sup>①</sup>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69页。

可比……。”<sup>①</sup> 陈夔龙这一奏文，算是比较得体的，犹不失为挽回主权之一策，但即此主张，也为原开平矿务局的总办张翼所反对，而被他的“密奏”打销了。张翼密奏的理由是：不必用偌大款项去购回，只要向英人交涉让他做“终身督办”，就等于不花什么代价而收回开平。因为当年张翼出卖开平时，英帝国主义曾哄骗小孩一样答应他，让他做“终身督办”，后来英帝国主义将开平掠夺到手后，这一可耻的哄骗，当然不能兑现，因而张翼有此“密奏”。而清政府也竟接受了他的“密奏”，故出价收回之议，又败于垂成。

收回开平的打算失败后，乃有开平和灤州两矿合并联营的计划。此议先由英帝国主义提出，想以联营名议达到并吞目的。当时灤矿总理周学熙昏聩无耻，竟然允应。据 1912 年周学熙报直隶都督张锡鑾的呈文称：“开平知我股本未足，经济支絀，毫无后援，锐减煤价，实行倾轧。灤矿抵制竞争，势不得不宽备行本，而官府既补助为难，商号亦不通挪殆遍，不得已议发债票一百五十万两，以资周转。事已垂成，又复为开平所破坏，无米为炊，困窘殆不可言喻。……未几，开平挽人介绍，函请我公司推举代表，协议联合。”<sup>②</sup> 根据周学熙这一段叙述，英帝国主义掠夺到开平煤矿之后，得隴望蜀，欲进一步吞并灤州矿的狼子野心，跃然可见。英帝国主义的办法，就是先锐减煤价，实行倾轧，迫使灤矿经营困难，然后则以联合为名，达到并吞的目的。

当时，联合经营合同的要点为：“1. 开平矿务公司、灤州矿务

---

①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2 辑上册，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第 1 版，第 70 页。

② 同上书，第 73 页。

公司，为发达营业起见，联合組織，設一开灤矿务总局，該两公司均仍其旧，各照有限公司律例自行办理。此总局应照中国通行中外合办矿章办理，呈請北洋大臣奏咨立案。2. 按照本合同，两公司之股本，应各仍其旧。計开平股本 100 万鎊，灤州股本 100 万鎊。3. 两公司議定：总局按现有营业所得之利，应照以下所开分派，所有淨利在英金 30 万鎊以內，开平公司股东应得 60% 分，灤州公司股东应得 40% 分。过此贏余之数，应由两公司股东平分。嗣后总局兴办新事业，以及离现有之煤井，另开机器大井，所得淨利，应由开平、灤州股东平分。……4. 嗣后無論何事，如須添招股本或添募債票之时，应由两公司华、洋代表，用总局議事部議董名义开会，議定其数。無論若干，应归两公司股东平均分任，所得余利，亦应平分。……总局矿界应以开平、灤州两公司原定立案之矿界为限，矿区之內，不准他人开采。”<sup>①</sup> 除联合合同外，还有若干附件，詳載許多重要項目。

合同公布后，中外嘩然，当时东京《朝日新聞》报导：“商議已久的开平、灤州两矿的合并，‘終已成功，开平煤矿的經理那森少校取得了新公司的經理权。这对英国的在华权益說来，算是一个很大的成就……。”<sup>②</sup> 表面看起来，新企业中的代表是平等的，但这只是一个形式，实际上是英帝国主义取得了整个公司的控制权，灤州煤矿事实上并入了开平，原来的灤州矿务有限公司，只成了一个空名。依据灤州原呈，仅将营业一部分联合，但实际上則完全是产銷联合，财产合并，所有各种合同、附件、副則等

① 汪敬虞編：《中国近代工业史資料》第 2 輯上册，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第 1 版，第 78~79 頁。

② 同上书，第 79 頁。

等，都互相矛盾，故弄玄虛。总观全部联合办法，中国方面由联合所丧失的权利，实与开平的出卖騙局相同。这是因为：第一，英帝国主义騙占开平后，清政府始終不敢承认，墨林和胡华导演的那幕可耻的“买卖”，形成悬案，英帝国主义在开平的权益，始終无法理依据。现在有了这个联合合同，得到了中国政府（袁世凱）批准，便无异批准了英帝国主义掠夺开平的合法性。第二，“联合”时两矿資本各作 100 万鎊，表面平等，实际則由英方垄断。附件三规定：联合后的总理，前十年由开平举出。附件四又规定：如議事不决时，两公司已发債券多者可加一票表决权。債券多的显然是开平，这就无形规定开平有最后决定权，可以垄断新公司的一切事务。第三，原灤州矿区比开平大十倍；当时灤州煤产量占 7 成，开平仅 3 成。联合合同规定：淨利在 30 万鎊以內时，灤州只得 4 成，开平反得 6 成；如盈利 30 万鎊，則灤州每年損失 9 万鎊。第四，联合合同事实上变成无限期的。第十七条规定：二十年后灤州得将开平的财产由两造商定公道价格购回。事实上，經營有利时，开平就絕不会同意“公道价格”。而附件七又规定：灤州除依上法购回开平外，对该合同永远遵守。这等于要永远受英人管制。第五，批准合同又无异承认了开灤可以不遵守中国法令。合同第一条說：两矿合組的开灤矿务总局应照中国通行中外合办矿章办理；而副則第二条又說，所言中国通行中外合办矿章，包含有已經各国公认之意。事实上，帝国主义不会公认不违反中国主权的矿章，所以这一条又等于取消了合同第一条。开灤对于采矿、納稅、矿区、赔偿等，从来没有遵守过中国法律，儼然是一个享有帝国主义特权的外国公司，置身于中国法律之外。

开灤煤矿总局，是一个庞大的垄断企业。它靠剝削矿工和

操纵市场而获得高额利润。从1912年开平与灤州两矿联营之日起,到1931年年底止,20年间盈利达14,000万元,每年平均约700万元。兹将这20年间开灤的盈利数字列表于下<sup>①</sup>：

1912年	2,937,645元	1922年	8,722,571元
1913年	4,601,638元	1923年	10,292,097元
1914年	5,336,074元	1924年	5,847,189元
1915年	5,166,190元	1925年	5,499,607元
1916年	5,815,037元	1926年	8,959,958元
1917年	8,014,706元	1927年	11,575,047元
1918年	7,969,584元	1928年	9,233,999元
1919年	11,179,264元	1929年	9,230,908元
1920年	9,931,389元	1930年	8,129,949元
1921年	7,144,214元	1931年	10,027,866元

根据以上所述,英帝国主义之取得开灤煤矿,始终没有付出过什么投资,完全是凭借阴谋手段而掠夺到手的,而他们所获得的利润,仅在1912~1931年这20年间,就至少分得了8,000万元。

开平与灤州两矿合营,中国虽然丧失了莫大权利,但表面上灤州煤矿总还保持着独立地位,同时也还保存了将来收回开平的一线希望。但到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则连收回开平的一线希望都被断送了。1934年,开灤煤矿终于正式由联合经营改为合并。在英帝国主义分子策划下,开灤申请合并的呈文于1934年4月16日下午4时送进国民党反动政府实业部,当时的实业部长陈公博当天即予批准,第二天即将批准复文判行,第三天即

<sup>①</sup> 参阅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1版,第151~152页。

将批示繕稿封发。这种快速度的批准程序，实在包藏着最可耻的丧权辱国的重大罪恶。因为，合并和联合不同。联合是开平与灤州为两个单位，各为主体；合并则是开平与灤州共为主体。在联合形式时，开灤总局并非公司法人，其本身不能享有矿权；合并后开灤总局则成为一个公司法人，可以享有矿权。沒有合并以前，开平的矿权問題在法律上始終还是悬案，英帝国主义的强盗地位和被告地位始終沒有解除；但經陈公博批准合并以后，英帝国主义掠夺开平煤矿的强盗行为就合法化了。至此，英帝国主义多少年来处心积虑的阴谋詭計终于实现，他們的掠夺行为暂时得到了中国反动政府的承认，而且恬不知耻地居然把这种掠夺所得作为什么投資。英帝国主义为什么这样不擇手段、长期施展阴谋，必欲完全侵夺开灤而后已？此无他，因为开灤是中国最大的煤矿，是大有发展前途的重工业之一，故英国侵略者不惜使用最下流的手段，以达到掠夺的目的。在这里，我們对于英帝国主义掠夺开灤煤矿的經過，也許說得冗长了一些，多費了笔墨。但这件事实实在太丑恶，而且后来开灤竟成为英帝国主义在旧中国最重要的所謂投資，因此，我們非把这一黑幕彻底揭露不可。

当然，帝国主义对我国企业的掠夺，决不只是一个开灤煤矿，我国民族工业中比較大的上海求新造船厂，也曾被法帝国主义阴谋吞并。該厂为上海人朱志尧所创办，规模頗大，能自制船只。但因經營不善，曾欠下法国东方汇理銀行債款 80 余万两。至 1918 年 6 月，东方汇理銀行催逼很紧，朱志尧无法应付，遂由东方汇理銀行將該厂估价为 51 万两，議定拍卖給法国邮船公司和法国歇乃达鋼鉄厂。

拍卖消息传出后，上海的民族資本家及江浙士紳如陈宝鑫、

沈周、秦錫田、姚文枬等紛电当时的反动政府表示反对。后来北京北洋政府出面“欲代还东方汇理銀行之款，收为官办”，但法国資本家却通过法国公使提出拒絕。双方交涉很久，到1919年决定将求新造船厂改为中法合办，并将該厂改名为“中法求新机器制造厂”，資本定为120万两，中国政府出60万两，法国邮船公司及歇乃达厂出60万两，于1919年6月1日設立事务所于上海，新厂共有董事12人，內中华董6人（系中国政府所派），法国籍董事6人，以法国邮船公司远东部总經理柏烈道任該厂总理。如上所述，法帝国主义吞并求新是一种有計劃的行为，它是借債、逼还和法国公使出面干涉三部曲进行的。

求新名义上是中法合办，但实权却完全操于法国資本家之手。据該厂老工人談：在合办初期，还有中国政府的代表駐厂参加會議，但到后来，由于軍閥政府不断变动，董事會議中就不见有中国代表出席，而只看到法国經理在独裁一切了。此外，在該厂档案材料中还发现法国資本家将中国股东的股权涂改为法国商人股权的情形。就这样，中国新兴的一个頗具规模的造船机器厂，就被法帝国主义掠夺并吞去了，所謂“中法合办”，徒具形式而已。

### 第三节 抗日战争期間日本帝国主义及抗战胜利后 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工礦业的全盘掠夺

日本是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当它还处于資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时候，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已被列强瓜分完毕。为了替資本主义的发展找出路，日本一开始就采取“先强兵而后富

国”的政策，走上冒险的军国主义道路，依靠发动战争来夺取殖民地。当它在屡次侵略战争中尝到了甜头后，对外扩张和侵略要求就更加强烈，妄想吞并中国，独占亚洲称霸世界。1927年日本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公然提出了一个狂妄无耻的侵略计划，叫做“田中折奏”，主张“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按照这一狂妄的野心，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侵略。1931年，日本经济危机加深了，而当时中国的蒋介石集团又在扩大内战，连续发动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三次“围剿”，日本帝国主义就趁机发动最野蛮的军事侵略，于九月十八日一举占领我国东北。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后，立即对我国工矿企业大肆掠夺。不久，在它的刺刀下建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后，即把整个东北原有的工矿企业占为己有，如我国东三省官银号、吉林永衡银钱号、黑龙江省官钱号、边业银行等原来经营的粮栈、钱铺、运输、印刷、面粉、制糖、木材、矿产、船舶、酿造等大小几十个企业单位，均被日本侵略者夺去。同时它还大量搜刮掠夺中国人的资金来发展工业。据伪满洲国总务长日本人驹井自供，日本帝国主义占领辽宁后，单单没收某要人一笔巨款，现币即达45,600万元。<sup>①</sup>而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中国人的钱来掠夺中国的资源，更使它的势力进一步渗透了整个东北。“满洲重工业开发股份公司”的设立，就是一个铁证。在这公司下面的子公司，有昭和制钢公司、满洲煤矿、阜新制作所、营城子煤矿、满洲轻金属、抚顺洋灰厂等三十三个重要公司。<sup>②</sup>

---

① 参阅陈凤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8年第1版，第458页。

② 参阅上书，第499~500页。

“滿洲重工业开发股份公司”所属公司一览表

公司名稱	設立年份	資本總額(千元)	所屬系統
昭和制鋼	1929	200,000	滿鐵
滿洲煤礦	1934	300,000	中銀
阜新制作所	1938	4,000	—
管城子煤礦	1938	8,000	—
舒蘭煤礦	1939	30,000	吉林人造石油
滿洲坑木	1939	5,000	—
理春煤礦	1939	30,000	東滿產業
滿炭礦機	1939	3,500	—
滿洲輕金屬	1936	80,000	—
滿洲鑄工業	1938	10,000	—
撫順洋灰	1934	7,500	滿鐵
安東洋灰	1940	8,000	小野田洋灰
滿洲礦山	1938	150,000	—
滿洲鉛礦	1935	30,000	日滿礦業
錦西鐵道	1939	3,000	大同洋灰
滿山制作所	1938	1,000	—
熱河礦業	1935	600	—
滿洲特殊礦	1940	30,000	滿山日油
灤平鐵道	1941	3,000	—
滿洲飛機製造	1938	100,000	—
東邊道開發	1938	140,000	本溪湖
杉松崗煤礦	1939	2,000	—
滿洲汽車製造	1939	100,000	—
同和汽車	1934	30,000	—
本溪湖煤鐵公司	1910	200,000	偽滿政府 大倉事業
協和鐵山	1939	10,000	偽滿政府 上島
滿洲重機	1940	50,000	—
滿洲機械製造	1940	5,000	—
滿洲鑽探機	1940	2,000	利根鑽機
精炭工業	1941	5,000	—
密山煤礦	1941	100,000	日鐵 日鐵礦業
扎賚煤礦	1941	50,000	—
綏威煤礦	1942	50,000	滿炭 本溪湖
計:直接投資公司 16 个		1,567,000	
間接投資公司 17 个		180,600	

这一公司的資金，伪滿洲政府所占股份有一半。很显然，伪滿洲政府这一半是从中国人民身上刮去的。而另一半所謂从民間来的資金，名义上是日本的一些保險会社的，但实际上也是中国人民的脂膏。这就說明了日本帝国主义是怎样用中国人的錢来垄断东北重要工矿业的。

此外，在日本帝国主义軍事占領下，日本各大財閥也趁机滲入东北，用种种方式巧取豪夺，扩大垄断。如三井財閥到1945年止在东北直接占有的企业就有滿洲电业株式会社、滿洲拓殖会社、滿洲航空株式会社、南滿洲铁道株式会社等六十几个。又如三菱財閥侵入东北后，在东北占有的公司即达二十几个。大仓財閥、东拓財閥等也在我国东北橫行霸道，极尽掠夺扩张之能事。就这样，东北所有重要工矿业都被殖民者占为己有。

日本帝国主义占領东北后，吞并中国的野心并未得到滿足，1933年，它又占領了热河，并繼續向华北伸张。至1937年，它終于发动“七·七”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由于当时的蔣介石政府采取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日本侵略軍得以长驅而入，使我国大片土地都成为淪陷区。

日本帝国主义占領了我国大片土地后，为了急于吞并中国工矿业，立即在华北和华中設立了許多經濟侵略机构，如华北开发会社、华中振兴会社、中日实业公司等；而且在这些垄断組織下面，設置了許許多多的子公司，单华中振兴会社下就設有十几个规模庞大的子公司如上海电力株式会社、煤业株式会社等。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間，日本帝国主义在淪陷区的經濟掠夺，曾使用了一切恶毒办法，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普通的有以下三种方式：

(一) 軍管理。据日本帝国主义解释，所謂“軍管理”，是依

“国际公法”或“战时法规”对敌人财物加以没收的行为。但日本軍閥却以防止“不逞之徒”的破坏为借口，对我国許多私人企业亦加以接管。根据軍管理形式被没收的我国工矿企业，范围极其广泛，除电业及矿业已被归并在日本在华国策会社外，一般工厂被没收接管者，据很不完整的统计，共达 82 个厂。其分布地区計山西 38 个厂、河北 12 个厂、河南 11 个厂、山东 18 个厂、安徽 2 个厂、綏远 1 个厂。按工厂性质分，則为面粉厂 30 个，紡織厂 15 个，毛織厂、火药厂、制酸厂、火柴厂、水泥厂、冶炼厂各 3 个，机器厂 8 个，其他为制紙厂、制革厂、制糖厂等等。

(二) 委任經營。此項委任經營，系日本壟断資本家随着軍国主义势力渗入中国而掠夺中国企业的一种方式。根据委任經營的名义，日本壟断資本家凭日軍势力便把中国人的企业占为己有。此种方式，以华中、上海一带較多。日商用此种方式掠夺去的中国工厂，仅資本較大者，即达 137 个厂之多，其中包括紡織厂 40 个，面粉厂 18 个，造船厂 11 个，造紙厂 9 个，橡胶厂 9 个，其他为烟草厂、机器厂等。

(三) 中日合办。在抗战期間，我国重要工矿业被日本帝国主义用“中日合办”名义掠夺去的为数也甚多。日本帝国主义用这种形式来掠夺的企业有两种：一为日本国策会社壟断的独占性的企业，其中包括淪陷区一切电灯电力厂、电报电话局、铁路、机車厂、輪船公司、碼頭、仓库、公路汽車、煤矿、鉄矿、炼鉄厂、盐场等；这些事业都由日本帝国主义設立的独占經營公司管理，名为“中日合办”，实际則完全归日本的国策会社控制。另一种为一般企业，即日本帝国主义所謂的自由企业，多由所謂日本商人出面，用“中日合办”的幌子，来囊括中国私人企业。被用这种方式掠夺去的一般企业共有 70 多个厂，計化学厂 27 个，金属机械

厂10个,食品厂9个,其他各业工厂26个。

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上述三种掠夺方式,几乎把我国沦陷区一切较为重要的工矿企业都一网打尽,把我国的民族工矿业变为日本人的所谓“投资”了。太平洋战争后,他们又把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企业加以没收接管。这样,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所谓“投资”就急剧上升。但谁能够把这样的军事掠夺理解为国际投资呢?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帝国主义马上代替日本帝国主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对我国进行了侵略。它积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把大批美国杀人武器以借款、租借、救济等名义给予蒋介石,经过他的手来屠杀中国人民;同时,通过蒋介石还订立了许多公开和秘密的条约,明文规定美国享有各种特权,把中国殖民地的地位加以合法化。如1945年11月订立了美国在华空中摄影协议,美国由此取得了在中国领空作军事调查的充分权利。1946年5月成立了成渝铁路修建协定,规定了美国有修建此铁路的权利。1946年9月订立中美三十年船坞秘密协定,又使美国霸占了全部海港。1946年10月,中美宪警联合勤务议定书在北平签订,这是美帝国主义在华治外法权的复活。粤汉铁路借款协定成立于1946年10月,规定了美国有投资修建权。1946年11月,在南京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是中国人民新的国耻。通过这一条约,中国的全部领土和全部事业就此对美国开放,中国主权又一次被无耻地出卖了。1946年12月中美航空协定签定后,中国的领空主权又全部落入美国的掌握之中。1947年7月,滇越铁路管理与川滇铁路修筑协定成立。1947年10月,又签订了国际关税与贸易一般协定,使中国关税自主权全部出送。美军驻华美蒋秘密协定则于1947年10月由

蒋介石政府宣布，它使美国得到了在蒋管区无限制驻军的权利。除此之外，还订了许多条约或协定，通过这些条约与协定，我国的主权被美帝国主义蹂躏殆尽，掠夺无余。<sup>①</sup>

美国利用这些特权，向中国无限制地倾销商品，夺取生产原料。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整个蒋管区的工业、商业都逐步落入美国侵略者的手掌，加深了中国的殖民地化。

还在1944年底，美国垄断资本即在“协助”蒋介石政府设立战时生产局的名义下，派遣了大批“技术顾问”来进行活动。1945年2月，美国对外经济供应局发表了《中国工业化指南》一书，拟定了一个对中国工业、矿业及交通运输进行全面控制的计划。这一侵略阴谋如果得逞，中国国民经济的各部门都将为美国垄断资本所直接支配。抗战胜利后，除美国原有的在华企业——如泛美航空公司所指挥的中国航空公司，洛克菲勒系统的上海电力公司、电话公司等等已经恢复并日益加强其活动外，美国的大托辣斯环球生产公司获得了在中国西北探测与采掘油矿的权利。旧中国最大的“国营”轮船公司——招商局，拥有40多万吨位的船舶，在战前即已与美国资本发生联系，在抗战结束后，该公司事实上已为美帝国主义所支配。美国流氓陈纳德则组织了一个航空货运公司，并联合中国官僚买办资本的30多个代理人组成“中国实业公司”，企图垄断中国一切重要进出口的商货采办与运输。“中国实业公司”并在南京、蕪湖、九江、汉口、长沙、衡阳等地设立了分公司，自备车船运输商货。

美帝国主义的掠夺计划，就地区而言，主要在华南；就业别而言，主要在矿业、军用工业及交通事业。这是在当时人民解放

<sup>①</sup> 参阅刘大年：《美国侵华简史》，新华书店1950年第7版，第84～86页。

軍在北方各地节节胜利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力争华北、确保华中、巩固华南的战略思想在经济上的具体表现。当时美帝国主义阴谋掠夺的有湖南的湖湘、湘江、中湘等煤矿，海南岛煤矿，福建的10个煤矿，江西萍乡高坑煤矿，西南、华中、华南的铅、锡、锑、钨等矿，以及华北开滦煤矿，兰州玉门油矿等等。<sup>①</sup>

在工业方面，美帝国主义以掠夺电气工业为主。据现有材料，美帝国主义阴谋掠夺的44个重要企业中，电气工业占18个单位。<sup>②</sup>

美帝国主义特别重视广东、台湾两省。在广东方面，美帝国主义阴谋掠夺的工矿企业，有广东纺织厂、士敏土厂、橡胶制造厂、汽车配件制造厂、潞江水电厂、广东糖厂、海南岛钢铁厂、粤北坪石狗牙洞煤矿以及海陆丰的矿藏等。<sup>③</sup>在台湾方面，抗战一胜利，全部矿产包括石油、煤、黄金、硫磺、钨、锡等的开采权即由蒋介石政府出卖给美帝国主义。蒋介石政府准许美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在台湾公开活动，设立分支机构或办事处，并准许美军指挥下的日籍人员及日人长谷川清、鲇川义介（电力、汽车、煤矿等大资本家）的特别居住权。台湾有8种实业包括渔业、铁路、电力、糖业、铅业、林业、造船等，均决定由中美“合作”。其中最重要的有台湾铝业公司（辖高雄及花蓮港两厂）、台湾电力公司、东势水力发电厂、台湾糖业公司、台湾肥料公司、高雄炼油厂等。<sup>④</sup>由此可见，美帝国主义在抗战胜利后就全部控制了台湾的

① 参阅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8年第1版，第291页。

② 同上。

③ 参阅上书，第294~295页。

④ 参阅上书，第298~299页。

經濟命脉。它企图走日本帝国主义的老路，把中国变为美国殖民地的罪恶阴谋，也就彻底暴露了！幸而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迅速解放了全中国，美帝国主义企图奴役中国的全盘阴谋才被彻底粉碎。

## 第六章 高額利潤的榨取

### 第一节 帝国主义在旧中国投資的高額利潤

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所謂“投資”，从实质上看，不外是利用中国人的錢来榨取中国人的血汗，它們并不是真正拿了什么資金到中国来投資。表面上看，好象帝国主义也曾在中国办了一些企业，对清朝政府、北洋軍閥政府及国民党政府有过一些借款，但試問，它們这些投資和借款的資金是从哪里来的呢？归根到底，还不是利用中国人的存款、稅款、鴉片利潤、战争賠款等等轉化过来的嗎？还不是通过高額外利潤、利息的剝削从中国人民身上榨取去的嗎？关于帝国主义对华借款、投資与利潤、利息等等的关系，我們可用这样一个公式来表示：鴉片利潤及中国人的存款、賠款等——→借款、投資——→高額外利潤、利息——→借款、投資——→高額外利潤、利息。这就是說，帝国主义用中国人的錢，借給中国人或投資于企业，向中国人索取高額外利息、利潤，然后再借給中国人，再在中国投資，榨取更高更多的利潤、利息，并在政治上、經濟上奴役全中国人民。这就是中国解放以前一百多年中，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剝削和榨取的一套循环不已的公式。以政治借款而論，清朝政府、北洋政府以及蔣介石反动政府所借的外債利息，普通为六厘，有高达八厘者，而且还附有苛刻的政治条件。而国际貸款利息，通常都为三厘、四厘。据雷麦統

計，各國在華的一般政治借款，1914年為33,000萬美元，1931年為42,800萬美元。這裏要特別指出的，就是各國銀團借給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和蔣介石政府的款子，實際上絕大部分是中國人的存款和賠款，並不是從外國匯來的錢。即是从外國匯來一部分錢，也多數是用軍火及一些過剩滯銷品來抵充的。如袁世凱想做皇帝時的善後大借款以及蔣介石、宋子文的許多借款，都屬於這種性質，是為進行內戰、輸入軍火而借的，是帝國主義者為了要在中國培植反動勢力、維持封建地主階級的反動傀儡政權，以便進一步鎮壓中國革命和吸吮中國人民的脂膏而借子的。

至於帝國主義的所謂在華事業投資，其剝削手段之毒、利潤之厚，也是筆墨難以形容的。關於帝國主義在華投資的利潤，“從1924~1930年間，根據美商的報告，其平均帳面利潤約為投資額的10~25%。1934~1938年時期，根據九十九家外商（日本除外）的資產負債表，其平均帳面利潤為15.3%。自1933年中國經濟日趨蕭條以後，外商的帳面利潤也仍由1934年的13.2%遞升到1937年的18.4%，到1938年更高達20%。”<sup>①</sup>茲將這九十九家外商從1934~1938年間的帳面利潤情況，分業列表如下<sup>②</sup>：

	平均利潤率(%)	平均股利率(%)
銀行業	23.3	21.7
保險業	——	38.5
製造業	13.6	10.7
公用事業	12.3	14.0
航運業	12.7	8.7
電信業	14.8	13.2

① 魏子初：《帝國主義在華投資》，三聯書店1954年第3版，第13~14頁。

② 參閱上書，第14頁。

帝国主义在华经营的“事业”，由于利用了中国的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垄断了中国的消费市场，操纵了中国的金融和税收机构，因此它们所获得的利润，远比它们在国内经营的投资利润为高。英、美两国在中国设立的公司，自1934~1938年的平均利润率为15.3%。而美国本国的公司，从1923~1929年没有战争和经济危机的正常时期，其平均利润率仅为6.2%。英国本国的公司，从1923~1929年间的平均利润率为10.6%。就以帝国主义在华经营的造船业为例，如英商耶松船厂，其1896年的股东会议报告中说：“净利达190,613.55两，等于资本的25.42%，而前一年度则为21.98%。”<sup>①</sup>又该厂1902年的股东大会报告中说：“我们用发行6,900股新股票的办法，增加我们的资本，以缩减由公司合并所造成的银行大量透支。……新股票的发行得款1,552,500两。……上年度净利达1,848,550.30两，董事会建议作如下之处理：除了1月份付出的386,400两临时股息以外，再加上10%的最后股息552,000两。下余的750,000两提存准备金，60,150.30两移交新账。……回顾一下新公司存在的二年中的经历，我们已经付给股东45%的股息。这样一个纪录可以说是非常令人满意的。”<sup>②</sup>后来，耶松船厂与瑞熔船厂合并，改名为英联船厂，规模宏大，执中国造船业的牛耳。上海共有大船坞7个，英联即占4个，可修理3万吨以上的大船，为造船业中一大垄断组织。这个大船厂开办时的资本不过几十万元，后来得到这样大的发展，显然是靠历年的高额利润积累起

①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362页。

② 同上书，第362~363页。

来的。

帝国主义在煤矿业中的利润，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英帝国主义从中国人手上非法掠夺去的开平煤矿，其利润之厚，是十分惊人的。该矿1909年股东大会上主席致词：“我想各位股东将同意，本年获得的成就是令人满意的，特别是由于这些成绩是在中国贸易条件不利（引者按：当时灤州煤矿与开平煤矿正相互压价倾销）的情况下获得的。损益账上的总利润（毛利）为243,999英镑，按整数计，比头年增加了20,000英镑，经过一般的扣除以后，可供分配的净利润为160,938英镑，这个数字已列入资产负债表。董事们对于今年能够把提存的准备金增加到40,000英镑，与两年以前的数目相同，感到高兴。每股的暂定股息为1先令6便士，共计75,000英镑，已于今年5月1日拨付。我们建议在11月2日每股继续拨付1先令6便士，免纳所得税，凑成本年15%的股息。”<sup>①</sup>其剥削之甚、利润之厚，由此可见一斑。

纺织业方面的利润也同样优厚。1912年英商老公茂纺织公司的利润共达137,153两，股息达11%。德商瑞记纺织厂1912年获利172,082两，股息达10%。英商怡和纱厂从1912~1914年3年间所获盈利，相等于全部资本，每年红利高达2分以上。1913年怡和纱厂股东年会上主席致词：“本厂12个月开工的结果，利润为552,278.93两，而前一年为339,728.72两。这在当时是公司历史上创新纪录的数字。……正如你们在报告中看到的，我们建议你们批准付出股息，普通股每股15两，比前一年多4两。我希望各位股东满意于这样高的收入。……虽

<sup>①</sup>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368页。

然本年〔1913年〕后期，本地〔上海〕厂紗貿易并不很順利，但所有的紗厂营业无疑地都是很好的。随着鴻源紗厂的出色报告之后，怡和紗厂也肯定地做得很好。（引者按：当时上海各外商紗厂，不仅竞争营业和竞争利潤，而且还剧烈竞争提高剩余价值率，对工人进行最残酷的剝削和榨取。）在提存 225,000〔两〕准备金以后，除了付出优先股息和大量的折旧及其他准备之外，还有 15% 的股息。这种經理，是值得大大赞扬的。”<sup>①</sup>日本人在上海开设的紗厂，其利潤尤为优厚。据 1914 年日商上海紡績株式会社股东年会报告：“……就过去 5 年来該公司情况，举出一些数字如下：淨利 1,355,086 两，折旧 248,268 两，已付股息 645,070 两，准备金 450,000 两。”这对該厂实收資本而言，5 年中盈利等于其 135%，折旧等于其 25%，股息等于其 65%，准备金等于其 45%。换言之，每年平均盈利 27%。<sup>②</sup>日本人在上海所設各紗厂，自 1912~1914 年所得利潤，超过全部資本。日本人在中国开设的紗厂所获的利潤，比其在本国所設紗厂的利潤約高 15%。

英美烟草公司是一个世界性的烟草托辣斯，它的魔爪也伸进了中国，几乎垄断了中国的烟草市场。它从烟叶的栽植、生产、运銷、加工以至卷烟紙的制造和印刷，都自己办理，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托辣斯組織。英美烟草公司 1912 年的賬面資本总額为 8,352,169 鎊（包括优先股和普通股），获得淨利 1,981,159 鎊，本期股息达 26.5%。<sup>③</sup>

---

① 汪敬虞編：《中国近代工业史資料》第 2 輯上册，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第 1 版，第 370~371 頁。

② 同上书，第 372 頁。

③ 同上书，第 374 頁。

根据以上帝国主义造船、煤矿、纺织、烟草各业的经营情况来看，各行业的净利润至少都在15%以上。兹将开滦煤矿、上海电力公司、怡和纱厂这三个外商垄断企业自1912~1932年所获奇高利润的情况，列表于下①：

(单位：元)

年 份	开 滦 煤 矿	上海电力公司	怡 和 纱 厂
1912	2,937,645	333,463	487,691
1914	5,336,074	522,632	530,550
1919	11,179,264	1,198,062	
1923	10,292,097	3,967,776	
1927	11,575,047	5,617,824	
1928	9,233,999	7,011,951	
1931	10,027,866		3,650,959
1932	4,943,021		2,476,406

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所谓投资，完全是以追求暴利、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剥削为目的的。早在1855年，有一位居住上海的“最有势力之西侨”写给英国领事的一封信就十分直率地表露了帝国主义冒险家们疯狂图利的心理状态。信中说：“余之职务在于最短期内致富，将土地租与华人或架成房屋租与华人，以此取得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之利益，倘此为余利用我金钱最善之方法，余只好如此做去。迟则二三年，余希望能捆载而归，则上海将来之淪为滄海，或化为劫灰，又与我何涉？”② 这就是帝国主义

① 参阅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1版，第151~152页。

② 徐公肃、丘璜璋：《上海公共租界制度》，国民党政府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3年版，第11页。

强盜的真面目。他們唯一的目的，只是用一切手段盜竊別人的財物，攫为己有；至于失主的死活，他是不考虑的。在旧上海的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公司的一些經理老板的唯一目的，就是掠夺中国人的財富，“捆載而归”；至于上海人的死活，“上海将来之淪为滄海，或化为劫灰”，則根本与他們无关。写这封信的“西侨”，显然是一个进行土地投机的地产商，企图利用中国的土地，以“取得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之利益”。这是事实，他一点沒有夸张，上海帝国主义地产商人的利潤，确是在30%以上的。例如业广地产公司創辦于1888年，当时資本額仅60万元，但到1937年，除了历年分配紅利及股息約7,000万元外，尚有房屋3,000多幢。仅50年光景，业广在房地产投机中竟榨取了百倍以上的利潤，这样高的剝削，簡直駭人听闻！

## 第二节 帝国主义对中国工人的压榨

帝国主义在中国从事开矿、紡織、卷烟以及房地产等活动，为什么能获得如此巨大的利潤呢？这些利潤的源泉是什么呢？显然，它們在中国所以能够榨取到如此巨大的利潤，原因是多方面的，剝削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操纵金融資金、垄断运输机构、控制原料和銷售市场、掌握关税及电訊交通等等，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中国工人的残酷榨取。

帝国主义者剝削中国工人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其主要的有下列几方面：

1. 在劳动時間方面：在帝国主义开设的厂矿企业中，工人的劳动時間每天都有10~12时。这点連帝国主义分子自己也

承认。1896~1897年英国布莱克本商会訪华团的报告书称：“上海各紗厂一天24小时中日夜換班开工21至22小时，每年除假期以外，开工300天至320天。”<sup>①</sup>另一个在中国織布厂当监工的英国人在給曼彻斯特报纸写的通訊中也写道：中国紗厂工人，……他們工作从上午五时至下午六时，每隔一星期才能玩一次。<sup>②</sup>

2. 在劳动条件方面：帝国主义在中国開設的厂矿，为了追求高額利潤，不肯花錢改善設備，以致工人的劳动条件非常恶劣。譬如上海各紡織厂大多沒有飯厅，工人們站着吃飯，甚至一边吃飯，一边工作。厂里沒有托儿所，許多女工就只好把自己的嬰兒放在家里，让嬰兒嗷嗷待哺，哭得声嘶力竭。在炎热的夏天，不管紡紗厂、炼鋼厂、机器厂，都沒有什么通风降温設備，車間温度經常在120度以上，工人們就在这样灼人的热浪里工作十多小时，因而热昏、热病、热死的事事故不断发生。工人們病了不仅沒有医药費，而且还要扣工資；死了沒有錢埋葬。日本帝国主义開設的撫順煤矿，在1913年一年中，就发生了近三千次工伤事故，死伤3,000多人，几占全部矿工之半数。茲将撫順煤矿劳动灾害情况列表于下<sup>③</sup>：

---

① 汪敬虞編：《中国近代工业史資料》第2輯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1199頁。

② 參閱上書，同頁。

③ 同上書，第1208頁。

## 撫順煤矿劳动灾害統計

(1907~1913年)

年 代	灾 害 次 数	死 伤 人 数
1907	125	141
1908	203	209
1909	356	443
1910	581	600
1911	1,233	1,247
1912	1,861	1,864
1913	2,918	3,184
总 計	7,277	7,688

3. 在劳动待遇方面：中国工人不仅劳动時間长，劳动条件恶劣，工伤事故层出不穷，而且每日血汗劳动所得的代价——工資，更低微得难以令人相信，低微得无法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东北的撫順煤矿，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設立的最大煤矿，工資每天平均为 0.22 元；而日本本国的矿工工資則为 0.60 元左右。中国矿工的工資如此低微，其他輕工业方面的工資低到如何程度，更可想而知了。就以生活費用最高的上海來說，在二十世紀初期，紡織工人的工資，平均每天都在 0.15 元到 0.20 元左右。在抗日战争以前（1936 年），工人每天工資也不过 0.50 元左右；但物价和生活指数則已比以前高昂了几倍。据英国布萊克本商会訪华团报告书中說：“……当我们問到〔中国紡紗工人〕工資問題的时候，我們这些直接从工資很高的兰开夏工人中間来的人，才証实这种令人难以相信或者难以理解的事实真象。因为，我們发现除了紡紗工以外，所有工人都是按時間給工資的，而且一个体力很强的熟练工人，根据各人的工作能力一天只有 0.15 元至 0.20 元的工資，……至于童工，其年齡由 8 岁至 13 岁，每天

只有0.06元至0.09元的工資……。”<sup>①</sup> 中国工人与英国工人做着同样的工作，中国工人所得的工資收入，仅及英国工人的四分之一或六分之一。同一报告书中又说：“中国紗厂工人与兰开夏在同等能力的工厂的工人，其相对的效率和生产能力的比率为3与5之比。但在許多场合，中国工人达到的熟练程度，特别是质量方面，如果不高于，至少也等于英国及其他欧洲工人所达到的标准。”<sup>②</sup> 那么，为什么中国工人与欧洲工人做着同样的工作、具有同等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能力，而所得工資竟如此低微，仅及欧洲工人工資的四分之一到六分之一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帝国主义資本家对中国工人的剝削比对本国工人的剝削更为残酷，他們从中国工人身上榨取了更多的血汗錢。帝国主义資本家在中国經營企业所获得的利潤，比他們在本国高10~20%。外国工业中的剩余价值率虽然已高达100%左右，但帝国主义在华經營企业的剩余价值率，竟高达300~400%甚至500%以上。大家都知道，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忍受着資本家的高度剝削，生活已經十分凄惨；而我国工人解放以前更甚于他們三、四倍地受着帝国主义資本家的残酷剝削，同时还要忍受买办资产階級以及封建把头、监工等等的层层盘剝，其生活之穷困凄苦，可想而知。以帶有世界性的大托辣斯上海頤中烟草公司（其前身为英美烟草公司）來說，它对中国工人的束縛和压迫，簡直比對牛馬还厉害。頤中資本家对工人规定了8种不自由：1. 身体不自由，要人保，要押金，进出厂要抄身。2. 讲话不自由，在工作

<sup>①</sup> 汪敬虞編：《中国近代工业史資料》第2輯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1232頁。

<sup>②</sup> 同上。

时只准埋头做活，不准讲话，否则就停生活。3.行动不自由，这个车间的工人不准到另一个车间去。4.吃饭不自由，工人没有食堂，都站着吃，绝对不准到洋人的食堂去。5.大小便不自由，工人多，厕所少又臭，每上厕所必须排队等候，绝对不准到洋人的厕所去。6.生病不自由，工人终日劳动，生病也不能请假，甚至往往有女工在车间生育。7.会客不自由，在工作时间，绝对不能会见客人。8.请假不自由，工人遇有婚丧大事，请假也很困难。

总之，帝国主义在旧中国所榨取的亿万利润，都是中国劳动人民血汗的积累，是他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积累。

下列统计表，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帝国主义在华企业攫取暴利的真实情况。

**(一) 1932~1936年帝国主义在旧中国  
29个重要企业中的利润率<sup>①</sup>**

名 称	年 度	共計年份	平均利润率
怡和纱厂股份有限公司	1932~1936	5	12.0
上海内外棉纺织股份公司	1934~1936	3	13.8
上海纺织股份公司	1933~1936	4	29.0
上海钟渊公大实业股份公司	1934~1936	3	32.0
棉蒙毛织股份公司	1933~1936	4	24.2
蜜蜂纸线公司	1934~1937	4	70.5
英美烟公司	1935~1936	2	16.1

<sup>①</sup>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8年第1版，第848~849页。

名 称	年 度	共計年份	平均利潤率
正广和有限公司(飲料)	1932~1936	5	10.8
台灣制糖股份公司	1933~1936	4	38.9
祥泰木行有限公司	1936	1	12.3
別发洋行	1932~1936	5	28.1
上海自来水用具公司	1934~1935	2	26.7
中国肥皂公司	1932~1936	5	8.8
滿洲化学工业股份公司	1935~1936	2	21.0
耶松造船厂	1933~1934	2	8.0
大連机械制作所	1934~1936	3	38.0
昭和制鋼所	1931~1936	6	2.2
滿洲重工业开发股份公司	1933~1936	4	19.0
美商中国电气公司	1932~1936	5	12.0
上海法商電車电灯公司	1932~1936	5	20.4
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	1932~1936	5	14.2
上海大英自来水公司	1932~1936	5	12.9
台灣电力股份公司	1933~1936	4	12.4
南滿洲瓦斯股份公司	1933~1936	4	14.0
比商天津電車电灯公司	1934~1936	3	103.7
天津法商电力公司	1932~1936	5	121.2
上海电力公司	1934~1936	3	15.1
南滿洲鉄道股份公司	1932~1936	5	13.6
开灤煤矿总局	1931~1934	4	9.0
总 平 均			26.2

(二) 英美烟草公司(原中烟草公司)历年純益及利潤率①

年 度	資 本 額	純 益	利 潤 率
1919	8,501,911鎊	3,776,508鎊	44.4
1920	16,001,523鎊	4,879,177鎊	30.5
1921	16,015,645鎊	4,313,481鎊	26.9
1922	16,046,070鎊	4,400,784鎊	27.4
1923	16,071,327鎊	4,494,972鎊	28.0
1924	16,071,402鎊	4,866,266鎊	30.3
1925	16,071,445鎊	5,145,238鎊	32.0
1926	23,340,280鎊	6,195,817鎊	26.5
1935	34,181,761鎊	5,469,171鎊	16.0
1936	34,181,761鎊	5,541,756鎊	16.2
1937	34,181,761鎊	5,760,450鎊	16.9
1938	34,181,761鎊	5,590,886鎊	16.4
1939	284,956,000元	52,520,000元	18.4
1940	284,956,000元	104,435,000元	36.6
1941	284,956,000元	203,157,000元	71.2

(三) 开平煤矿公司历年純益及利潤率② (單位:鎊)

年 度	資 本	純 益	利 潤 率
1912~1913	1,000,000	85,854	8.6
1913~1914		155,659	15.7
1914~1915		159,067	15.9
1915~1916		201,725	20.2
1916~1917		291,562	29.2
1917~1918		522,600	52.3
1918~1919		652,873	65.3
1919~1920		1,112,412	111.2
1920~1921		587,994	58.8
1921~1922		354,686	35.5

① 參閱陈真等編:《中国近代工业史資料》第2輯,三联书店1958年第1版,第856頁。

② 參閱上書,第875~876頁。

年 度	資 本	純 益	利 潤 率
1922~1923		397,467	39.7
1923~1924		500,225	50.0
1924~1925		266,720	26.7
1925~1926		235,600	23.6
1926~1927		314,923	31.5
1927~1928		487,384	48.7
1928~1929		361,297	36.1
1929~1930		263,953	26.4
1930~1931		142,153	14.2
1931~1932		239,428	23.9
1932~1933		68,565	6.9
1933~1934		54,621	5.5
1934~1935		45,961	4.6
1935		24,744	2.5
1936		167,817	16.8
1937		184,496	18.4
1938		123,819	12.4

(四) 上海中美火油股份有限公司利潤率<sup>①</sup> (单位:美元)

年 度	資 本	純 益	利 潤 率
1946	417,460	98,610	23.8
1947	417,460	635,947	152.1
1948	417,460	474,334	113.6
1949, 1—8 月	417,460	156,971	37.6

<sup>①</sup> 陈真等編:《中国近代工业史資料》第2輯,三联书店1958年第1版,第889頁。

### (五) 上海电力公司的剩余价值率<sup>①</sup>

(以 1923 年度全年生产计算)

	(单位:两)
不变资本合计	4,707,717
煤炭	2,770,741
油料、水和其他物料	285,552
发电部修繕費	56,671
配电部保管費和修繕費	185,493
邮电費	7,995
印刷文具費	14,408
广告費	9,075
旅費	28,230
运输費	55,976
发电部和配电部杂費	44,200
营业部杂費	14,614
折旧	1,234,762
可变资本合计	854,692
发电部职工薪金和工資	296,970
配电部职工薪金和工資	264,334
营业部职工薪金和工資	293,388
剩余价值合计	3,010,234
房租捐稅等	105,828
保險費	53,896
董監事和會計師報酬費	13,550
本屆利潤	2,836,950
剩余价值率:	$\frac{3,010,234}{854,692} = 352.2\%$

<sup>①</sup> 陈真等編:《中国近代工业史資料》第 2 輯,三联书店 1958 年第 1 版,第 938~939 頁。

## (六) 天津法商电力公司剩余价值率<sup>①</sup>

(以 1935 年 7 月份 1 个月的生产计算)

	(单位:元)
不变资本合计	13,298.36
发电车间燃料	6,769.00
厂房及营业处用煤	23.10
发电车间、送电站营业处等用电费	4,792.83
发电车间及营业处用水费	105.30
修理及修缮费	824.41
发电车间材料费	367.10
杂用	259.94
营业处邮电费及办公用品	87.93
营业处广告费	67.00
运费	1.75
可变资本合计	9,162.15
营业处职员薪金	4,579.34
1935 年外勤人员奖金	27.32
发电车间华人工资	1,865.33
输电站工资	132.67
材料库华人工资	253.00
厂房华人工资及薪金	1,863.87
厂房电工制服和洗濯费	7.42
外籍人员医疗费	140.00
运输工人、泥水匠工资	293.20
剩余价值合计	50,296.25
补贴 F. 先生房租费	140.00
巴黎住所房租	100.00
外籍职员薪金	1,100.00
保险费	60.00
本屆純利	48,896.25

$$\text{剩余价值率: } \frac{50,296.25}{9,162.15} = 548.9\%$$

①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2 辑,三联书店 1958 年第 1 版,第 948~949 页。

### (七) 上海內外棉紡織股份公司剩餘價值率<sup>①</sup>

(以1940年8月生產20支棉紗1捆計算)

	(單位:元)
不變資本合計	710.853
棉花	655.500
原動費	19.338
溫濕調節設備費	0.216
工廠消耗品費	3.735
包裝用品費	11.894
照明費	0.740
機器補修費	4.063
工具修繕費	0.880
折舊	7.659
事務所費用	3.830
其他雜費	2.998
可變資本合計	21.713
廠內直接和間接工資	18.772
廠內職員薪金	2.272
事務所職員薪金	0.669
剩餘價值合計	77.434
各種捐稅	22.124
利息	7.659
本屆利潤	47.651
剩餘價值率·	$\frac{77.434}{21.713} = 356.6\%$

① 陳真等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三聯書店1958年第1版,第941~942頁。

## (八) 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剩余价值率<sup>①</sup>

(1947年9月份)

	(单位:镑)
不变資本合計	34,642.038
耗用电力	5,078.718
煤	10,087.900
燃料油	210.640
明矾	1,049.905
氣液	701.280
修理及其他	2,650.466
总水管和开关保养費	771.280
水表保养費	542.868
电灯和取暖費	132.948
运输費	379.635
文具費	302.118
折旧	4,130.000
杂費	8,604.285
可变資本合計	20,212.017
工人工資	12,078.784
职员薪金	5,450.284
医疗费	231.861
退职金	1,160.774
临时工資	1,290.314
剩余价值合計	73,806.414
高級职员薪金	5,450.284

① 陈真等編:《中国近代工业史資料》第2輯,三联书店1958年第1版,第936~937頁。

高級職員医疗費和退職金	1,892.636
捐稅	3,272.224
保險費	652.643
利息	2.334
房租	7.096
本月純利	63,029.197

剩餘價值率:  $\frac{73,806.414}{20,212.017} = 365.2\%$

由上列各表，可以充分看出剩餘價值率之高及外國資本家對於中國工人階級剝削之嚴重。

## 第七章 旧中国的国际贸易、国际收支 与华侨汇款问题

### 第一节 帝国主义对旧中国外贸的控制和掠夺

帝国主义对旧中国的经济掠夺，在控制中国的对外贸易方面也是一个重要途径。

我国对外贸易发生很早，海关制度也早就产生。远在宋朝，我国沿海一带，就与日本及东南亚一带有了频繁的货物往来。当时设立的互市提舶司，一方面征收进出口税，一方面又管理进出口货物，实际上就是一个海关机构。到清朝，正式设立海关，如上海的江海关，清乾隆年间就设立起来了。十八世纪中叶，我国对外贸易，规定在广州一地进行。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我国关税一向自主，对进出口货物管制甚严。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订立，确定协定关税的原则，我国关税主权始被英国破坏。南京条约规定，英国商民在通商口岸进出货物的税收，均宜秉公议定则例，以使英商按例交纳。1843年两国共同议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协定关税的恶例。根据这个协定，较之鸦片战争前，粤海关实收的税率减低了58~79%。这就开启了协定关税、主权旁落之先例，并为外货进口开了方便之门。兹将鸦片战争后第一次关税协定之税率降低情况，列表如下：

## 1843年中英关稅协定前后几种主要进口貨物的

### 新旧稅率水准<sup>①</sup>

(从价%)

貨 物	单位	1843 年前旧稅率	1843 年新稅率	新稅率較旧稅率 减少 百分数
棉 花	担	24.19	5.56	77.02
棉 紗	担	13.38	5.56	58.45
头等白洋布	匹	29.93	6.95	76.78
二等白洋布	匹	32.53	6.95	78.64
本色洋布	匹	20.74	5.56	73.19
斜 紋 布	匹	14.92	5.56	62.73

第二次鴉片战争后,于1858年6月訂立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約,拟定从价值百抽五的原則,关稅率进一步被降低。同年11月,續訂中英通商章程新稅則,正式确定以从价值百抽五为准,并明定了許多免稅品及禁止品,如金銀、面、粟、米粉、米、面餅、熟肉、熟菜、牛乳酥、牛油、蜜餞、外国銀錢、外国服装、金銀首飾、掺杂銀器、香水、碱、炭、柴薪、外国蜡烛、外国烟絲、烟叶、外国酒、家用杂物、行李、紙張、笔、墨、毡毯、鉄刀、利器、外国自用藥料、玻璃器皿等等,均为免稅进口品;另外,还规定兵器、弹药、中国产盐、銅錢等系为禁止进出口岸的物品。根据这次新规定,不仅稅率較第一次协定又大为降低,而且免稅物品范围广泛;某些物品虽然名义上禁止进出口,但事实上做不到,而且反为偷稅漏稅大开方便之門。由于有1843年的中英虎門条約、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約、1844年的中法黃埔条約等不平等条款,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可享受片面的最惠国条例,所以1858年中英通商章程內新规定的优惠稅則和稅率,英、美、法等国都

① 严中平等編:《中国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选輯》,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1版,第59頁。新旧稅率都是按1843年市价折算的。

可以同样享受。天津条约又规定修改税则以 10 年为期，使中国丧失了随时调整税率的主权，而且条约上虽然规定 10 年修改一次，但由于帝国主义者存心拖延，不肯修订，以致将近 50 年都没有得到调整，直到 1902 年才修订进口税则。兹将 1858 年中英重修进口税率情况，列表于下<sup>①</sup>：

**1858 年中英重修进口税则前后几种主要进口货物的税率水准**  
(从价%)

貨 物	单位	1843 年税率	1858 年税率	1858 年税率較 1843 年税率减少百分数
棉 花	担	6.54	5.72	12.54
斜 纹 布	匹	7.89	5.05	35.99
斜纹布(美)	匹	4.63	4.63	—
印 花 布	匹	14.25	4.98	65.05
製 装 布	匹	10.68	4.98	53.37
棉 紗	担	6.94	4.86	29.97
羽 緞	丈	9.46	6.31	33.30

說明：本表 1843 年税率水准是按 1843 年税则和 1858 年市价折算的，所以本表 1843 年税率和上一表所列 1843 年的税率不同。又本表 1858 年的税率同 127 頁表中 1858 年的税率不同，也因为一则以市价折算，一则以税则计算的关系。

根据前列统计数字，我们知道 1843 年的协定税率已经比以前粤海关实收的进口税率降低了 58~79%；而 1858 年的新税率，则又比 1843 年降低了 13~65%，可见 1858 年以后的税率已低到什么程度。在这样低的税率基础上将近 50 年没有修改，这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显然十分不利，我国国家财政收入显然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sup>①</sup>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 1955 年第 1 版，第 59 頁。

到1901年辛丑条約訂立后，因英、美、法等帝国主义者勒索賠款45,000万两，清朝政府无力支付，須以关税收入作为偿付賠款的財源，乃商得各侵略国的同意，修改稅率，规定进口貨物增加到切实的値百抽五。但事实上，这仍然是一句空話，只有棉紗、棉花、漂白市布等几种貨物的进口稅率，从2%提高到3%左右；另外几种貨物原已达到値百抽五者，如本色市布、車白糖等，則反被压低到3~4%的水平。到1918年，我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帝国主义者虽然知道中国无力出兵，但希望中国有大批华工去帮助它們做苦力，因此，允許修改关税进口稅率以为誘餌；其实，此时它們正在欧洲拚死作战，根本很少有貨物运到中国来，进口貨物已大大减少了。如1914年中国国际貿易的入超額达21,300万海关两，1915年减少到入超額3,561万海关两，1916年3,461万海关两，1919年則仅入超1,613万海关两，进出口額儿已接近平衡。所以当时在进口貨大大减少的情况下，所謂修改进口稅率，很少有实际意义；且此次修訂，系根据1911年到1915年5年间的平均物价为新稅則貨价的标准，并非照1918年当时的貨价征稅，因此，实征稅率仍仅値百抽三点五。大战结束后，于1922年又修訂了一次进口稅則，但也沒有达到“切实値百抽五”。茲再将自1858年到1922年这一时期的稅率修改变动情况，附表于下(见127頁)①。

根据該表，可知关税的稅率，有若干种貨物是越調越低的。而每次調整，都是在对帝国主义有利的时候，它們才允予修訂。

1927年蔣介石叛变革命，成立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他与宋子文等勾結帝国主义以鎮压中国人民为代价，于1929年、

① 严中平等編：《中国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选輯》，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1版，第60頁。

### 三次修改稅則前后几种主要进口貨物的稅率水准

(从价)

貨物	單位	按1902~1906年平均价格計算所得的稅率		按1917~1921年平均价格計算所得的稅率		按1922~1926年平均价格計算所得的稅率	
		1858年 旧征稅率	1902年 新訂稅率	1902年 旧征稅率	1918年 新訂稅率	1918年 旧征稅率	1922年 新訂稅率
本色市布	匹 (重七磅者)	5.03	3.15	1.68	3.06	—	—
漂白市布	匹	2.62	3.53	2.06	3.21	2.92	4.58
洋漂布	匹 (寬32英寸)	3.98	3.48	2.05	2.52	2.32	3.78
印度棉紗	担	2.85	3.87	2.02	2.73	2.68	5.44
日本棉紗	担	2.81	3.81	1.96	2.64	2.19	4.45
棉花	担	2.17	3.71	2.34	3.12	2.38	2.38
馬口鉄	担	6.43	4.66	2.59	3.49	4.25	4.91
車白糖	担	—	—	2.56	3.31	3.23	3.33
煤油	美加仑	—	—	3.16	5.00	5.00	6.84

1930年、1931年、1933年、1934年先后調整了稅則，提高了进口貨物稅率；但結果只是增加了反动統治者鎮压人民的資本，从外国多买了許多軍火来屠杀人民。抗日战争后，美帝国主义的势力进一步侵入和扩大，反动政府为了討好主子，于1947年又与美国簽訂关税协定，将100多种美国商品减低了进口稅1/2~5/6，因而美帝国主义的各类奢侈品及其在全世界都銷售不出的剩余物資，得以源源进口，独占市场，而使我国民族工业被排挤和摧残得无法生存；例如因为美国的克宁奶粉大量进口，賤价傾銷，致使我国乳牛场紛紛倒閉。

总之，解放以前的一百多年中，关税不能自主，对于我国国民經济的影响危害很大，它不仅沒有起到保护工农商发展的作用，相反地还为帝国主义所利用，成为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侵略和傾銷商品的工具。

鴉片戰爭以後，由於鴉片進口日益增加及關稅不能自主，我國國際貿易的入超情況是相當嚴重的。我國與各國通商甚早，前面已經談過。1715年，英國就在廣州設立了專事貿易的東印度公司；1824年美商旗昌洋行又在廣州設立；1832年怡和洋行繼之設立；1833年前東印度公司的貿易獨占權被取消後，英、美商人來廣州經商者更日益增多。當時清朝政府雖關閉了寧波、廈門等處港口，只准外人在廣州一地貿易，並頒布了“防範外夷條規”，對外人來華加以種種限制，但實際上，中國國際貿易並沒有下降。1836年左右，廣州外商約有55家，其中英商41家，美商9家，其他國家5家。茲將1833年以前中英貿易價值情況附表於下：

### 中英進出口貿易價值<sup>①</sup>

(1760~1833年每年平均數，價值單位：銀兩)

年 度	進 出 口 共 計	進 口	出 口
1760~1764	1,449,872	470,286	979,586
1765~1769	3,383,534	1,192,915	2,190,619
1770~1774	3,585,524	1,466,466	2,119,058
1775~1779	3,216,242	1,247,471	1,968,771
1780~1784	3,385,277	1,301,931	2,083,346
1785~1789	9,104,271	3,612,763	5,491,508
1790~1794	10,851,405	5,007,691	5,843,714
1795~1799	11,092,987	5,373,015	5,719,972
1800~1804	15,272,029	7,715,556	7,556,473
1805~1810	18,874,732	11,474,509	7,400,223
1811~1815	15,707,048	7,646,777	8,060,271
1816~1820	16,341,267	6,525,201	9,816,066
1821~1825	17,806,955	7,591,390	10,215,565
1826~1830	17,285,309	7,395,023	9,950,286

注：本表數字包括印度在內。

① 參閱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科學出版社1955年第1版，第3頁。

上表虽只說明了1833年以前的中英貿易情况,但当时中国对外貿易,绝对以英国为主,故完全有代表性。1833年以后,由于英国大量运进鴉片,进出口貿易的比重开始大转变;中国由出超国变为入超国了。当年中国对英輸出額为17,814,000两,由英国輸入額为22,304,000两;其中鴉片进口額12,878,200两,占入口貨50%以上;計淨入超4,490,000两。

1842年南京条約訂立后,我国貿易入超的逆差情势,更加汹涌而不可遏止。自1840年鴉片战争到1949年全国解放这一百多年中,只有1871~1876年这几年是出超(1876年出超数目为1,050万海关两),其余年份都是入超,在国际貿易上处于绝对一面倒的劣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欧洲各国无力东顾的时候,我国对外貿易虽稍有轉机,进口貨物大大减少,但也仅仅是入超数字减退,而仍然沒有达到进出口平衡。但大战一結束,各帝国主义立即卷土重来,大量向中国推銷貨物,因而1920年的入超額又达到22,061万海关两。到1933年入超額竟高达73,400万元。

茲將自1871~1936年这一期間的进出口貿易額附表于下(見130頁)①。

鴉片战争后中国国际貿易入超的根本原因,除了关税不能自主外,还由于帝国主义者垄断我国市场,用不等价貿易方法进行交易,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收购我国农产品和手工艺产品,又以极昂貴的价格出售其“舶来品”,結果造成我国历年国际貿易上和国际收支上大量的入超和不平衡,而帝国主义者則从这种不

① 參閱严中平等編:《中国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选輯》,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1版,第64頁。

## 进出口贸易净值

(1871~1936年)

(单位: 百万元)

(指数: 1871~1873=100)

年 份	出 口	指 数	进 口	指 数	出超(+) 或 入超(-)
1871~1873	110	100.0	106	100.0	+ 4
1881~1883	108	98.2	126	118.9	- 18
1891~1893	167	151.8	219	206.6	- 52
1901~1903	311	282.7	473	446.2	-162
1909~1911	570	518.2	702	662.3	-192
1919~1921	921	837.3	1,203	1,134.9	-282
1929~1931	1,464	1,330.9	2,082	1,964.2	-618
1933	612	556.4	1,346	1,269.8	-734
1934	535	486.4	1,030	971.7	-495
1935	576	523.6	919	867.0	-343
1936	706	641.8	942	888.7	-236

等价的交换中获得了亿万万元的利润。这种不等价的贸易，据一般估计，进口货至少被抬高了约5%的价格在市场上销售，出口货则被压低约5%的价格收购。他们用这种卑鄙毒辣的手段垄断中国的国际贸易，以致帝国主义进出口商除了获得平均利润以外，还获得了10%以上的垄断利润。因此，在中国的帝国主义贸易商，一般都获得了30~50%的惊人利润，甚至有超过100%的。如英商中国肥皂公司1925~1931年平均每年利润为144.8%，法商东方百代唱片公司1922~1926年平均每年利润为98.7%，英商祥泰木行有限公司1937~1940年平均每年利润为86.6%，怡和纱厂股份有限公司1937~1941年平均每年利润为118%。<sup>①</sup> 抗战后美帝国主义的中美石油公司更多方进

<sup>①</sup> 参阅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8年第1版，第843~851页。

行超額剝削。其利潤收入如下表①：

上海中美火油股份有限公司利潤率

年 度	資 本 (美元)	純 益 (美元)	利潤率(百分比)
1946 年	417,460	98,610	23.8
1947 年	417,460	635,947	152.1
1948 年	417,460	474,334	113.6
1949 年 1~8 月	417,460	156,971	37.6

中国海关自 1859 年开始有中国进出口貨物統計，自 1864 年以后正式公布中国进出口貿易情况。据海关統計，自 1868~1938 年这 70 年間，我国进出口貿易額的总情况是②：

1868~1938 年輸入总額 469 亿元

1868~1938 年輸出总額 349 亿元

1868~1938 年入超总数 120 亿元

(系由海关兩換算成法币，換算率为 1 海关兩 = 1.558 元)

70 年間，中国进口出口貿易总值为 818 亿元，总入超为 120 亿元。在 818 亿元的进出口总值中，被帝国主义分子抬价和压价的部分如合計以 10% 計算，即是 81 亿多元。我国自 1868~1938 年这 70 年間，所謂入超 120 亿元，其实絕大部分是帝国主义壟断我国进出口貿易（据日本东亚研究所調查，1936 年进口貨的 100% 与出口貨的 80% 为帝国主义操纵）进行不等价交换以及操纵海关和銀行汇兌的罪恶結果。

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收购土产品的价格和他們运到中国来推銷的商品价格，总是存在着很大的差价。尤其在 1929 年以后，进

① 參閱陈真等編：《中国近代工业史資料》第 2 輯，三联书店 1958 年第 1 版，第 889 頁。

② 參閱《各国对华投資与中国国际收支》，日本东亚研究所 1944 年版，第 220 頁。

口貨与出口貨价格之間高低悬殊更为厉害。以1934年为例，我国輸出入貨物价格之剪刀差，竟达60%。茲为說明这一問題之严重性，特將1927年以后之中国輸出入物品价格差数列表于下：

### 中国輸出入物品价格指数<sup>①</sup>

(以1926年进出口商品价格100为基数)

年 代	輸入物价指数	輸出物价指数	輸出物价指数为輸入 物价指数的百分比
1927	107.3	106.1	99
1928	102.6	104.5	102
1929	107.7	105.2	98
1930	126.7	108.3	85
1931	150.2	107.5	72
1932	140.2	90.4	64
1933	132.3	82.0	62
1934	132.1	71.7	54
1934年比1926年 物价涨落百分率	+32%	-28%	-約60

从物物交換价格上来分析，同一数量之輸出品，1934年交換而得之輸入品，比1926年交換而得之輸入品少46%。这就是說，比如在1926年出口1担大豆，換100斤石油，到1934年，則几乎要出口2担大豆才能換100斤石油了。这对中国国际貿易和国际收支的損害是如何巨大，何况在1926年时，以1担大豆換100斤石油的交換率对中国已很不利了呢！

帝国主义在华商人，不仅在垄断貿易中用奇高的价格出售舶来品以获取超額利潤，而且他們所运进来的物品也大部分是对中国不利的，如鴉片、軍火、炸药以及各种奢侈品等等。以沙逊集团而論，除了是尽人皆知的鴉片走私大王外，同时也是一个

<sup>①</sup> 1934年《上海物价年刊》，第10頁。

販運軍火的罪惡集團。沙遜系統的安利洋行，就是經常販運軍火的。它賣給南京蔣介石反動政府的武器，計1929年有“蛾”式教練機14架，1930年有來復槍8,000支及子彈1,500萬發，1931年有“蛾”式教練機13架。另外，賣給各地軍閥的軍火也有不少。帝國主義者從這些罪惡買賣中，除通過封建軍閥榨取了中國人民億萬金錢外，還助長了中國的內戰。而輸入品里很大部分是消費物品和毒物，對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危害甚大。1870~1892年進口貨分類統計如下表①：

22年間(同治九年到光緒十八年)進口貨的變化(單位：百萬兩)

	1870年 (同治九年)	1880年 (光緒六年)	1890年 (光緒十六年)	1892年 (光緒十八年)
鴉片	26	32	29	27
棉貨	22	23	45	52
毛織品	7	6	4	4
五金	4	4	7	7
煤、煤油	—	—	6	7
米	—	—	11	5
其他雜貨	10	14	25	33
共計	69	79	127	135

根據上表，1870~1880年間，鴉片進口額都占各類進口貨物的首位。如1870年，總進口額6,900萬兩中，鴉片占2,600萬兩；1880年總進口額7,900萬兩中，鴉片占3,200萬兩。這一張進口貨分類統計表，具體說明了我國進口貨物的真實情況。茲再將1873~1947年進出口貨物的分類統計表附志於後②。

① 參閱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冊，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9版，第215頁。

② 參閱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科學出版社1955年第1版，第72~73頁。

## 各 年 进 口 货

1873~

年份	总 計		生 产 资					
			合 計		机 器 及 大 工 具		原 料	
	值	%	值	%	值	%	值	%
1873	103,487	100	8,383	8.1	—	—	—	—
1893	235,823	100	19,733	8.4	1,450	0.6	—	—
1903	509,059	100	76,582	15.0	3,676	0.7	—	—
1910	721,299	100	126,948	17.6	10,991	1.5	455	0.1
1920	1,187,585	100	337,856	28.5	37,638	3.2	1,916	0.2
1930	2,040,599	100	549,672	26.9	75,481	3.7	39,209	1.9
1936	941,545	100	418,671	44.5	57,702	6.1	25,445	2.7
1947	10,681,326,574	100	5,633,006,496	52.8	873,094,848	8.2	254,208,616	2.4

资料来源：历年海关报告。

## 各 年 出 口 货

1873~

年份	总 計		原 料					
			农 产 品 (农林渔牧在内)		矿 产 品			
					手 工 开 采		机 器 开 采	
	值	%	值	%	值	%	值	%
1873	108,449	100	2,866	2.6	—	—	11	*
1893	181,713	100	28,423	15.6	—	—	—	—
1903	333,961	100	89,496	26.8	796	0.2	767	0.2
1910	593,387	100	231,957	39.1	1,300	0.2	3,116	0.5
1920	843,860	100	307,047	36.4	7,426	0.9	23,415	2.8
1930	1,394,167	100	628,285	45.1	17,331	1.2	47,860	3.4
1936	705,742	100	311,037	44.1	18,152	2.6	11,247	1.6
1947	6,376,504,297	100	1,949,570,519	30.6	283,524,654	4.4	1,976,619	*

资料来源：历年海关报告。

原编者注：\* 不及 0.05%。

## 物 分 类 统 计

1947年

(价值单位: 千元)

料		消 费 资 料					
建筑用品;设备(包括车辆船艇);小工具;器材;半成品;材料;燃料等		合 计		消费品原料		直接消费资料	
		值	%	值	%	值	%
8,383	8.1	95,104	91.9	8,756	8.5	86,348	83.4
18,283	7.8	216,090	91.8	30,723	13.0	185,367	78.6
72,906	14.3	432,477	85.0	113,365	22.3	319,112	62.7
115,502	16.0	594,351	82.4	122,526	17.0	471,825	65.4
298,302	25.1	849,729	71.5	201,166	16.9	648,563	54.6
434,982	21.3	1,490,927	73.1	353,059	17.3	1,137,868	55.8
335,524	35.7	522,874	55.5	122,376	13.0	400,498	42.5
4,505,793,032	42.2	5,048,320,078	47.2	2,671,802,538	25.0	2,376,517,540	22.2

## 物 分 类 统 计

1947年

(价值单位: 千元)

半 制 品				制 成 品			
手 工		机 制		手 工		机 制	
值	%	值	%	值	%	值	%
40,613	37.4	—	—	63,173	58.3	1,786	1.7
51,644	28.4	177	0.1	96,945	53.4	4,524	2.5
57,298	17.2	49,250	14.7	109,788	32.9	26,566	8.0
77,760	13.1	70,599	11.9	168,092	28.3	40,513	6.9
69,564	8.2	103,466	12.3	262,882	31.2	70,060	8.2
48,732	3.5	170,653	12.2	378,122	27.1	103,184	7.5
47,029	6.7	39,570	5.6	228,308	32.4	50,399	7.0
124,791,999	2.0	659,398,648	10.5	2,103,222,526	33.0	1,244,019,332	19.6

(一) 1903~1936年中国的国际收入①

(单位: 百万元)

项 目	1903	1912	1928	1929	1930	1931	1933	1934	1935	1936
总 計	601.7	961.6	2,230.6	2,360.9	2,416.5	2,646.3	1,609.2	1,516.9	1,569.6	1,776.8
出口总計	374.2	583.5	1,561.4	1,637.8	1,476.5	1,687.1	673.0	615.5	662.2	811.0
占收入总額%	56.55	60.68	70.00	69.37	61.10	63.75	41.82	40.58	42.19	45.68
出口貨值	368.0	577.3	1,487.0	1,523.5	1,342.3	1,382.6	611.8	535.2	575.8	705.7
出口貨价低报			74.4	114.3	134.2	276.5	61.2	80.3	86.4	105.9
陆路貿易出超	6.2	6.2				28.0				
在华外船費用	18.7	31.2				43.6	25.0			
占收入总額%	2.88	3.24				1.65	1.55			
金銀出口总計	51.5	43.1		3.0	47.4	211.9	203.6	391.4	357.4	335.2
占收入总額%	7.78	4.48		0.13	1.96	8.01	12.65	25.80	22.77	18.87
生金出口				3.0	47.4	211.9	189.4	111.5	68.0	45.6
生銀出口	51.5	43.1					14.2	279.9	289.4	289.6
外人在华投資	43.1	155.8	96.0	170.0	202.0	43.6	30.0	80.0	140.0	60.0

占收入總額%	6.36	16.20	4.30	7.20	8.36	1.65	1.86	5.27	8.92	8.38
四項總計	61.5	85.7	224.7	216.0	218.0	218.1	190.0	注180.0	注150.0	注160.0
占收入總額%	9.29	8.91	10.07	9.15	9.02	8.24	11.81	11.87	9.56	9.00
在華外國使領館費	7.8	10.9	30.0	32.0	38.0	39.3	80.0			
在華外國陸海軍費	35.1	45.2	139.7	124.0	100.0	65.4	100.0	180.0	150.0	160.0
外國在華教會“教育”、“文化”、“慈善”費用	9.3	14.0	25.0	30.0	40.0	78.5	50.0	(注)	(注)	(注)
外人在華“游歷”費	9.3	15.6	30.0	30.0	40.0	34.9	10.0			
華僑匯款	113.7	62.3	250.6	280.7	313.3	359.9	200.0	250.0	260.0	320.0
占收入總額%	17.19	6.49	11.23	11.89	13.09	13.60	12.43	16.48	16.56	18.01
二項總計			97.9	53.4	156.3	82.1	237.6			90.0
占收入總額%			4.40	2.26	6.47	3.10	17.88			5.06
其他			4.0			56.7	5.0			90.0
無法證明來源數			93.9	53.4	156.3	25.4	232.6			

注：包括在華外船費用。

① 參閱平中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科學出版社1955年第1版，第86~87頁。

(二) 1903~1936年中国的国际支出①

(单位: 百万元)

项 目	年 度	1903	1912	1928	1929	1930	1931	1933	1934	1935	1936
总 计		661.7	961.6	2,230.6	2,360.9	2,416.5	2,646.3	1,609.2	1,516.9	1,569.6	1,776.8
进口总计		483.7	737.1	1,794.0	1,898.7	1,964.6	2,270.9	1,480.2	1,184.2	1,129.2	1,141.5
占支出总额%		73.1	76.65	80.43	80.42	81.3	85.81	91.98	78.07	71.94	64.24
进口货值		483.7	737.1	1,794.0	1,898.7	1,964.6	2,224.2	1,345.6	1,029.7	919.2	941.5
私运进口							46.7	134.6	154.5	210.0	200.0
运费及保险费		10.5	15.6	15.0	15.0	20.0	21.8				
占支出总额%		1.59	1.62	0.67	0.64	0.83	0.82				
金银进口总额		57.6	84.8	168.7	158.7	100.5	70.3				
占支出总额%		8.7	8.82	7.56	6.72	4.16	2.66				
生金进口		57.6	84.8	168.7							
生银进口					158.7	100.5	70.3				

外人在华企业盈余	24.9	31.2	179.0	198.5	198.0	87.2	24.0	55.0	70
占支出总额%	3.76	3.24	8.02	8.41	8.19	3.3	1.49	3.5	3.94
四項总计	83.5	92.0	73.4	89.5	124.4	195.1	99.0	113.6	199.8
占支出总额%	12.62	9.58	3.30	3.79	5.15	7.41	6.15	7.82	7.87
军火私运进口額	7.8	5.5							
外債賠款本利	68.9	79.5	63.0	79.1	111.4	178.7	93.0	112.6	127.8
中国在外使館費用	2.1	2.3	4.4	4.4	5.0		6.0	6.0	12.0
华人在外留学及游历費用	4.7	4.7	6.0	6.0	8.0	17.4			
二項总计	1.5	0.9	0.5	0.5	9.0		6.0	214.1	425.5
占支出总额%	0.23	0.09	0.02	0.02	0.37		0.38	14.11	23.95
其他			0.5	0.5	9.0		6.0	20.0	
无法証明来源数	1.5	0.9						194.1	425.5

① 参阅严中平等編：《中国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选輯》，科学出版社 1955 年第 1 版，第 88 頁。

从表列資料，可見進口貨絕大部分都是消費資料。1902年以後，生產資料的進口雖逐年增加，從1903年的進口額15%增加到1936年的44.4%；但這裡有兩種情況必須說明，即在進口的生產資料中，機器及大工具僅占6%，而建築用品、小工具、器材、半製品、材料、燃料則占35%，真正用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生產資料仍占極少數；另外在這些進口的生產資料中，有很大一部分為外商用來在中國直接創設廠礦的，真正用來發展中國國民經濟的生產資料，則是微乎其微。

總之，舊中國的國際貿易在帝國主義壟斷之下是十分不利的：（一）進口稅低，海關不僅不能保護本國工農業的發展，反而為帝國主義所控制，翼助了它們的商品傾銷；（二）帝國主義壟斷中國國際貿易，用不等價交換手段榨取中國人民的血汗，造成中國大量的貿易入超；（三）進口貨多是消費品、奢侈品、毒品、軍火等等摧殘中國國民經濟發展的東西。因此，帝國主義壟斷中國國際貿易，一方面利用貿易關係，掠奪了中國人民的財富，作為發展它們的資本主義經濟的資本積累；另一方面則把中國人民的血汗榨取干淨，使中國經濟不能發展，長期處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狀態。帝國主義者的無恥和罪惡，就在這裡。

我國國際貿易的入超情況以及它對整個國民經濟的影響，從我國的國際收支情況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自鴉片戰爭到1949年中國大陸解放這一百多年中，中國的國際收支，由於戰爭賠款的支出、國際貿易的入超以及帝國主義企業高額利潤的榨取，幾乎是年年不平衡，支出多於收入，每年都給帝國主義列強繳納一筆巨款。

為便於我們了解舊中國國際收支的真實情況，特先錄兩張國際收支簡表於上。

根据上列二表，中国历年的收支总数，表面上都是平衡的，如1903年收入66,170万元，支出也是66,170万元；1936年收入177,680万元，支出也是177,680万元。但这些都是假象，如果加以逐项分析，则收支不平衡和极端不合理的现象，立即毕露。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国际收入的情况。以较有代表性的1936年来说，在收入中，最主要的有：（一）出口货总值为81,160万元，占收入总额45.68%；（二）生金生银出口33,520万元，占收入总额18.87%；（三）华侨汇款32,000万元，占收入总额18.01%。这三项收入，合计占总收入的82.56%。从这一分析中说明，我国之所谓国际收支平衡，主要是依靠土产品出口、现金银出口和侨汇而求得的平衡。

其次，我们再来分析国际支出，也以1936年为例。在支出中最主要的有：（一）进口货总值114,150万元，占总支出的64.24%；（二）外人在华企业利润7,000万元，占总支出的3.94%；（三）偿还外债及赔款本息12,780万元，约占总支出的7.19%。这三项支出合计为133,930万元，占支出总额的75.4%。这三项支出中以进口货来说，极大部分都是消费品、奢侈品和军火。1936年在生产资料的进口中，机器及大工具57,702,000元，工业原料25,445,000元，合计只有83,147,000元，仅及进口货总值的8.8%。其他都是消费品原料或直接的消费资料和奢侈品。第二项支出所谓外人在华企业利润、保险费 and 运费，是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直接剥削所得，是它们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一种榨取。第三项所谓偿还外债及赔款，一为高利贷利润，一为战争掠夺，都是不义之财。另外，在1936年的支出数字中还有一项巨款42,550万元，这是所谓无法列出项目的国际

支出(即支出表的最后一項)。这一項支出,包括购买軍火的秘密付款以及帝国主义和官僚資本的套汇暗賬等。一句話,这是一笔见不得天日的黑賬,也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中国人民不能交代的劫掠。

从国际收支的角度上看,过去一百多年中中国被帝国主义掠夺去的資金总數究有多少呢?也就是說,我国为了弥补国际收支平衡、为了抵偿收支差額而被帝国主义榨取了多少物資、金銀和侨汇呢?这方面的資料,我們掌握的还不够完整,但我們仅从下列四个方面来看,也已大致可以得出一个梗概。

第一,从帝国主义的投資利潤方面来考查。我們在前面說过,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所謂投資,大部分都是鴉片利潤和战争賠款的轉化,实际上它們并没有向中国輸入多少資本。相反地,它們从这些投資中所获得的利潤,倒是十分巨大,而且这些利潤已被輸出到国外去了的。

帝国主义在投資名目下掠夺去的利潤,数字确实惊人,大大造成了中国国际收支的逆差和恶化。其情况可以下表来証实。

帝国主义投資与我国国际收支<sup>①</sup> (单位:百万美元)

时 期 (年)	国 际 收 入			国 际 支 出		
	企业投資	政府借款	合 計	投資利潤	借款本息	合 計
1894~1901		85.1	85.1		83.6	83.6
1902~1913	290.7	335.7	626.4	381.6	491.0	872.6
1914~1930	651.3	210.6	861.9	1,229.1	628.4	1,857.1
1931~1937	93.2	69.5	162.7	398.4	226.0	624.4
合 計	1,035.2	700.9	1,736.1	2,009.1	1,428.6	3,437.7

<sup>①</sup> 參閱吳承明編:《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資》,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版,第91頁。

从这一张国际收支簡表中，显然可以看出，帝国主义的所謂投資，从1894年到1937年，包括政府借款在內合計只有173,610万元，而中国支出的投資利潤和借款本息，則高达343,770万元。二者相比，支出額超过收入額的1倍。正如吳承明同志所指出的，“必須注意，这表主要是根据帝国主义者所提供的材料；特别是1930年以前，它对企業資本的輸入是按投資額增加数來估計，肯定是偏高的，而利潤輸出是按投資額4%估計，又肯定是偏低的。虽然如此，我們还可以看出：在二十世紀初期，中国資金的出口即超过外国資本的輸入，約合資本輸入的1.4倍；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九一八’事变时期，資金的出口就合到資本輸入的2.2倍；而‘九一八’到‘七七’抗战时期，又增加为3.8倍。1894~1936年40几年間，帝国主义輸进中国的借貸資本約合7亿美元，而它們自中国取回去的本息（主要是利息）在14亿美元以上，同时还在中国保留有9亿多美元的債权；同一时期，不計‘九一八’以后的东北，它們輸进中国的企業資本（很大部分是战争賠款和鴉片利潤的轉化——引者注）約合10亿美元，而从中国所汇回的投資利潤达20亿美元，同时在关內还保持有19亿美元的企业财产和房地产。这就是說，40几年間，它們自中国所取回去的資金为它們所輸入資本的2倍，同时它們在中国所持有的債权和财产达它們所輸入的資本的1.6倍。也就是說，它們每投入中国100元，就取回去200元，还存留下160元。”<sup>①</sup>

这里必須指出，帝国主义对中国政府借貸資本的利息絕不

---

<sup>①</sup> 吳承明編：《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資》，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版，第92頁。

止4%，事实上一般都在6%左右，上表所列的借款利息約低估了1/3。而帝国主义直接經營的企业利潤率更不止4%，平常情況下至少是10%以上。这种高昂的利息、利潤，是造成中国历年国际收支不平衡的主因之一。即使根据上表低估了許多的数字，从1894~1937年帝国主义也攫取去了利息7亿余美元、利潤20亿美元，合共27亿余美元。

第二，如前所述，由于帝国主义垄断中国国际貿易，采用不等价交換手段掠夺去的总額为81亿元。照1925年汇率折算，这笔掠夺額等于405,000万美元。

第三，英美等帝国主义在傾銷鴉片中所攫取去的淨暴利約20亿銀两，折合15亿美元。

第四，是战争賠款。根据本书第二章所分析，在过去一百多年中，帝国主义曾对中国发动过多次侵略战争，这几次战争的结果，帝国主义都从中国勒索去巨額賠款。第一次鴉片战争、第二次鴉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义和团之役等，勒索去的賠款总額本息合計約达127,700万两。这些賠款照1914年的汇率折算(賠款的大部分都是1914年以前付出的)，約合95,000万美元，减除德俄两国庚子賠款1918年后未付部分，也仍有75,000万美元左右。这还仅是公开勒索去的賠款額。至于帝国主义在战争过程中海盜式的搶劫掠夺，如它們两次占領北京、天津的大规模搶劫物資財宝，都未計算在內。在战争中中国人民所遭受的浩劫和損害，当然更无法計算。

根据以上四方面的分析，帝国主义在过去一百多年中从中国人民身上掠夺去的資金，計借款利息、投資利潤27亿余美元；在进出口貿易中用不等价交換手段掠夺去的405,000万美元；鴉片暴利15亿美元；被勒索去的战争賠款实付額約75,000万

美元，总数为 90 亿余美元。大体上，这就是帝国主义从中国人民身上掠夺去的可以计算出来的总账。当然，这笔账可能还不很全面，也可能还有挂漏的地方，但总的主要的方面就是这些。

## 第二节 旧中国国际收支逆差的 弥补与华侨汇款问题

帝国主义从我国掠夺去的 90 亿美元，在国际收支上，我国是怎样支付，拿什么东西去清缴这笔款项的呢？

大家都知道，通常的国际清算，是用黄金、白银或外汇头寸来支付的。过去我国弥补国际收支逆差的手段也不例外。关于我国输出白银抵补入超的情况，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即已发生。在 1838 年，林则徐看到大量鸦片进口和白银出口，即对清朝政府奏称：“鸦片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抵御之兵，且无可以充餉之银。”<sup>①</sup>我国因大量鸦片输入，自 1830 年起，白银即源源外流。自 1814 年到 1843 年中国输出白银到印度的情况如下表<sup>②</sup>：

---

①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 2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新 1 版，第 142 页。

② 参阅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 1955 年第 1 版，第 34 页。

## 中印之間的白銀流向

(1814~1827, 1830~1844 年度)

(單位: 銀兩)

年 度	自中國輸入印度	自印度輸入中國	中國出超額
1814~1815	1,345,100	20,160	1,324,940
1815~1816	1,088,029	19,593	1,068,436
1816~1817	2,085,458	63,935	2,021,493
1817~1818	2,571,961	22,898	2,549,068
1818~1819	3,924,757	310,086	3,614,671
1819~1820	1,888,952	903,008	985,944
1820~1821	1,491,026	131,364	1,359,661
1821~1822	1,195,030	97,016	1,098,014
1822~1823	1,054,699	8,739	1,045,960
1823~1824	2,053,912	606,190	1,447,722
1824~1825	1,649,885	34,596	1,615,289
1825~1826	3,086,052	14,040	3,072,012
1826~1827	2,385,480	13,098	2,372,382
1830~1831	2,774,258	2,449	2,771,809
1831~1832	1,614,152	—	1,614,152
1833~1833	1,700,440	9,830	1,690,610
1833~1834	3,769,235	13,423	3,755,807
1834~1835	3,477,866	3,456	3,474,410
1835~1836	3,773,722	13,365	3,760,357
1836~1837	3,572,915	16,677	3,556,238
1837~1838	4,999,907	—	4,999,907
1838~1839	6,155,076	15,599	6,139,477
1839~1840	1,432,929	616,406	816,523
1840~1841	2,665,853	35,700	2,630,153
1841~1842	6,830,490	1,153,372	5,677,118
1842~1843	6,233,526	216	6,233,310
1843~1844	12,230,514	582,336	11,648,178

由上表可见，中国早就由于貿易入超，而以輸出白銀去抵补。从1845年到1895年这50年間，中国仍繼續輸出白銀。馬克思在1858年說：“因鴉片輸入而引起的白銀不断外流，已經开始扰乱天朝的国庫及货币流通。”<sup>①</sup>自1895年到1930年間，有时候也有一些白銀进口。1931年以后，我国白銀更是滾滾流出。其情况如下表<sup>②</sup>：

(单位：元)

年 代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白銀輸出数	47,429,681	106,932,954	94,954,914	237,355,432	710,394,397

根据这个表的統計数字，从1931~1935年这5年間，輸出白銀达1,227,067,378元。在1937年、1938年，即抗日战争初期，由中国輸出到香港的金銀約合9亿元港币。

反动政府除了輸出金銀外，还以华侨汇款作为抵补国际收支逆差的主要支付手段。美国资产阶级学者雷麦，也曾承认华侨汇款在中国国际收支上所占的重要地位，而把它列为中国国际收入上的重要項目。据东亚研究所統計，华侨汇款对于我国抵付入超方面所占比重，經常在30%以上。茲将侨汇在抵付我国貿易入超上所占之比重列表于下(见下頁)。

此表說明，在我国国际貿易中，由于帝国主义者采用不等价交易的办法而造成的历年巨額入超，仅从1934~1938年的5年中，总数即达272,900万元之巨。在同一时期，华侨汇款的总数达163,300万元，抵补了我国入超总数的59%。由此可见华侨

① 馬克思：《鴉片貿易》。《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版，第85頁。

② 參閱周伯楸編：《白銀問題与中国货币政策》，中华书局1938年版，第23頁。

汇款对于平衡我国国际收支的重大作用和重大贡献。

根据以上所述，輸出金銀和华侨汇款是弥补旧中国国际收支逆差的主要手段这一点，已經十分明显了。这里所說的收支逆差，实质上就是帝国主义强盜的掠夺总帐。

华侨汇款抵付我国貿易入超所占之比重表<sup>①</sup>

(单位：百万元)

年 度	輸 出 額	輸 入 額	入 超 額	华侨汇款	侨汇对入超額之百分比
1934	602	1,270	668	242	36
1935	641	1,159	518	249	48
1936	794	1,267	473	304	64
1937	944	1,300	356	359	101
1938	887	1,601	714	479	67

說明：本表所列 1934、1935、1936 年的侨汇数字，与前面国际收入表上所列的 1934 年 25,000 万元、1935 年 26,000 万元、1936 年 32,000 万元的数字略有出入。这些数字，都是估計約数，难以統一，故予并列。

我們前面計算过，帝国主义在一百年中从中国掠夺去的总額大体为 90 亿美元。我国用以抵付这笔国际收支逆差，即被帝国主义实际掠夺到手的，主要就是历年公开运出的約 25 亿两白銀和 115 亿元的侨汇。<sup>②</sup> 这二笔巨款照 1925 年的汇率折算(这个时

① 參閱《各国对华投資与中国国际收支》，日本东亚研究所 1944 年版，第 245 頁。

② 关于 25 亿两白銀弥补逆差一点，須加以說明。因为我国現金銀移动問題，雷麦他們只选择了白銀进口較多的 1902~1930 年这一段时期内的材料来分析統計，結果，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中国是白銀輸入国，而不是輸出国。誠然，从雷麦的材料看，1902~1930 年这一段时期内是約有 10 亿元(见雷麦《外人在华投資》第 152、153 頁)白銀进口。我在这里估計有 25 亿两白銀弥补国际收支逆差，是从 1830~1939 年这 110 年的整个历史时期来考查的。它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为 1830~1894 年。这时期由于大量鴉片进口，造成大量貿易入超。仅从 1871~1894 年的 24 年中，入超总額即达 2,151,279,000 海关两(见雷麦《中国对外贸易》第 181

期的金銀匯價比較正常，其匯價每關平兩折合美金7角5分，每一銀元折合美金5角），約為76億美元。當然帝國主義掠奪去的數字決不止這些，因為它們除了公開的運出金銀和套取僑匯以外，還採取卑鄙的走私手法，用兵艦、輪船偷運金銀及珍貴的珠寶等等出口。這正如沙遜洋行的一位老年職工所說：“外國人（指沙遜洋行里的外國人）經常在市面上搜購金銀、珠寶、美鈔，一捆一捆、一箱一箱往英國兵艦里送。”從這裡，我們可以了解，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掠奪，真正是海盜式的掠奪。不僅它們從中國人民身上掠奪去的財富十分巨大，而且掠奪手段也真正體現了海盜本色！此外，各帝國主義為了侵略中國、屠殺中國人民而經常駐在各口岸的陸海軍軍費，也是在這90億美元的掠奪總賬內開支的。

頁）。在1894年以前，帝國主義對中國既少政治借款和鐵路借款，也很少企業投資。無疑的，這時期內的巨大貿易入超和一部分戰爭賠款，除由僑匯抵充外（早期僑匯很少），主要是現金抵充。否則，巨大入超額的支付就會毫無着落。估計1830~1894年這一時期內的現金銀出口，為15億至20億銀元（實際上，直到1902~1908年這一段時期內，中國白銀也還純出超15,427萬銀元）。第二期，從1895~1930年，約有10億元白銀進口。第三期，從1931~1939年，單是國民黨政府及官僚、買辦運出國外的白銀，已經知道數字的約有20億元。而在抗日戰爭初期被英、美、法帝國主義銀行、企業公開或秘密運走的現金銀，還沒有計算在內。所以，從整個一百多年的時間看，我國是輸出了大量現金銀的。我估計為25億兩，是只少不多的。關於華僑匯款回國，有許多不同估計。揚馬士估計，1903年為11,000萬元；1906年為15,000萬元。據雷麥估計，1902~1913年，平均每年為15,000萬元；1914~1930年期內，平均每年為2億元。日本東亞研究所估計，1936年為30,400萬元，1937年為35,900萬元。現我根據各方面的材料，綜合估計為：第一時期1830~1894年60多年間總數為15億元，平均每年2,000多萬元。第二時期1895~1914年20年間總數為30億元，平均每年15,000萬元。第三時期1915~1939年25年間總數為70億元，平均每年28,000多萬元。三個時期合計為115億元。

## 第八章 帝国主义在旧中国 投資的特征

### 第一节 投資的虛伪性

帝国主义的所謂在华投資，尽管賬面数字很大，但实质上則十分虛假。这个特征可以从下列几个方面来考查。

一、前面說过，帝国主义在旧中国投資的原始資本，絕大部分是鴉片利潤和战争賠款的轉化，是用非法走私和侵略战争手段从中国人民身上榨取去的，并不是帝国主义者真正从他們国内带来了什么資本。自 1780 年到 1914 年英、美等国运到中国来推銷的鴉片，根据关册估計，价值至少有 25 亿銀两。从 1895~1914 年这 20 年間，販到中国来的鴉片价值每年平均达 3,000 多万銀两。例如 1908 年輸入鴉片值 34,226,337 两，1909 年为 35,744,979 两，1910 年为 55,410,850 两，1911 年为 48,256,745 两，1912 年为 47,706,774 两，1913 年为 41,023,012 两，1914 年为 37,364,736 两。我們前面估計过，英美等帝国主义在一百多年中从中国榨取去的金錢，单单鴉片这笔 20 亿銀两的淨暴利就有 15 亿美元。又鴉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及庚子賠款等战争賠款本息合計实付 7 亿多美元。两笔共計 22 亿余美元。帝国主义者对这两笔巨款的运用有两方面：1. 用来购买中国廉价的农产

品，运回本国銷售，以增强其資本主义的发展。2. 将一部分資金留在中国运用，更进一步地用中国人的錢来剝削中国人，美其名曰“投資”。事实証明，帝国主义在华的所謂“投資”，無論政治借款或它們自己直接經營的企业，极大程度上都是鴉片利潤和战争賠款的轉化。一向操纵中国金融事业的汇丰銀行，最初就是由几家英商鴉片行合資开办的。解放以前上海最有名的大垄断企业太古洋行、怡和洋行、沙逊洋行、哈同洋行等，原来都是販运鴉片的洋行，从販卖鴉片中賺了大錢以后，才扩大經營其他业务。十九世紀初，美帝国主义者为了弥补中美間的貿易逆差，也采取了与英国同样可耻的办法，大量向中国走私鴉片。它們把販卖鴉片看成为与販运奴隶、酿酒等买卖相同，經常地大宗地进行。美商旗昌洋行就是專門販卖土耳其鴉片到中国来的机构。

二、各帝国主义者根据不平等条約，先后在中国掠夺了23处租界和租借地，强占了我国許多土地。它們用土地垄断和土地投机的方式进行剝削，靠地价的飞跃增涨来扩大資財。在大城市房地产总值中，土地价值远比房屋价值为高，大致房屋价值仅占四分之一，土地价值要占四分之三。在上海的帝国主义者所占有房地产的总值，据日本东亚研究所估計1936年土地为461,494,000美元，房产为133,493,000美元，共計594,987,000美元。<sup>①</sup>由此可见帝国主义在华資金中土地价值所占比重之大。但我們必須指出，土地是属于我中华民族所有，絕不容許任何外人占有，即使在租界范围内，外人也不能有土地所有权。当时上海租界内流行的所謂“道契”，在法律上仅是一张土地租契，每亩

---

① 參閱吳承明編：《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資》，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版，第173~174頁。

土地每年都要向中国官厅繳納地租 1,500 文<sup>①</sup>。可见“道契”绝对不是什麼土地所有权証件。既然土地所有权都还是中国的，那么，土地价值怎么能够算是外人的投資呢？地价增值又怎么能够为外人所得呢？所以，帝国主义在华投資中的不动产部分——土地部分，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所謂地产，最初都是用极其低微的代价取得的，后来所謂几亿美元的土地投資，其实是土地本身增值的结果，并不是他們真正在土地上投过什麼資金。从国际收支的角度来看，所謂土地投資根本与国际汇兌沒有发生过关系，完全是外国人利用特权在中国土生土长起来的。所以过去許多人把帝国主义在中国强占的土地及其增值，也列为投資，是完全沒有

① 上海道契，系中国官厅发给外人租地的执照，属租約性质。茲将全文样本附后：“大清欽命監督江南海关分巡苏松太兵备道吳給出租地契事。照得接准大英国領事官麦照会内开：今据本国商人赵甲，稟請在上海按和約所定界內租业戶錢乙等地一段，永远租賃若干亩几分几厘几毫，北张田、南李界、东大路、西小浜，給价每亩若干千文，共若干千文，其年租每亩一千五百文，每年豫付銀号等因前來。本道已飭业戶錢乙等將該地租給該商收用，务照后开各条遵行。查該外国人按和約在界內租定地亩，却不能由己便，亦不得轉与別国未曾准住中国之人，必須中国官宪与領事官查視其租地賃房，无足妨碍，方准租住。又查向議章程，虽外国人有通融得益之处，但无准租地賃房与华民，展轉賃卖。若华民欲在界內租地賃房，須由領事官与中国官宪酌給盖印凭据，始可准行。上列各条，倘該商并后代管业之人，将来以其地轉与，不稟明本国領事官并道宪批准登籍，將其地整段分段，或已或人另造房屋轉租华民居住，若未領两国官宪允准凭据，并每年不将每亩年租錢一千五百文，豫付銀号，违犯斯章者，則此契作为廢紙，地即归官。須至租地契者。 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这是一张道契全文。外人租到土地后，多不遵守，不經中国官厅即私自轉让，故外人在上海占有的土地，毫无合法性，应当“契作廢紙，地即归官”的。（见徐公肃、丘瑾璋：《上海公共租界制度》，国民党政府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 1933 年版，第 163 頁。）

理由的。

三、过去有些人把中外合办的企业，完全列在外人投资范围内，这是非常不恰当的。明明在一个企业里有很大数量的中国股东和中国资金，为什么只凭一个外国商号的招牌，不问其资金构成如何，就完全算为外人企业呢？如果单从支配财产价值的角度来计算，就把中外合资企业的全部财产都列入帝国主义投资，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有许多原始凭证和资产负债表可以证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许多重要企业，都有中国股东加入。从1895年订立马关条约正式准许外人在华设厂开始，到1914年为止这20年间，帝国主义在华经营的工矿企业共有136个单位，其中有40个工矿企业，为正式的中外合资企业；其中计中日合办者13个，中英合办者9个，中俄合办者8个，其余为中德、中法、中美、中比等国合办。<sup>①</sup>这些都是1914年以前合办的企业，至于带有化名隐匿性质寄生在帝国主义企业的中国人的资金，以及1914年以后设立的中外合办企业，数量更大，资金更多。以煤矿业来说，1936年时，帐面上外人投资为155,062,496元，其中合资者95,612,174元。帐面上英国人的煤矿投资98,095,280元，其中中英合资者73,790,400元，纯英资者仅24,304,880元。这些隐藏在帝国主义企业名义下的中国人的资金，显然应予划出，不能一概列为帝国主义的投资。

此外，凡是外商企业，只要它们在中国市场上发行了公司债，或者它们的股票在上海众业股票市场上流通过，就必然会有大部分证券流入中国人手中，因而实际债券持有人是中国人，而

---

<sup>①</sup> 参阅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7~13页。

不是外国人；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名义上是外商企业，但实际上既然中国人握有股票，就不能认为是純外商企业了。我們計算帝国主义在华投資时，必須把中国人在某些外商企业中的資金划出来，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根据这种精神来研究分析，那么所謂帝国主义在华投資，就要大打折扣，大大减低了。过去雷麦他們估計的若干投資数字，是根据狡猾的帝国主义商人和會計師編制、統計出来的，是充滿着虚伪性和欺騙性的。

四、帝国主义在中国設立的金融机构，凭借特权势力，大力发行鈔票，大量吸收中国人的存款，作为剝削中国人的資本。1932年，帝国主义銀行在我国直接发行紙币的計有汇丰、有利、麦加利、德华、花旗、东方汇理、美丰、华比、正金、台灣、朝鮮銀行等11家銀行，包括英、美、日、法、德、比等6个国家，1933年发行紙币总额折算华币約达29,000多万元。

帝国主义銀行在我国所吸收的存款数字，則更为惊人，因为中国許多官僚、軍閥、买办、地主都把搜刮得来的錢存入帝国主义銀行。1932年，在上海設立的帝国主义銀行共有30家，其中15家主要銀行的存款数字約达115亿元。<sup>①</sup>这些存款中大部分当然是商业性的活期往来存款，但即使其中只有10%的定期存款，也有11亿余元，数字也已相当可观。由此可见帝国主义銀行吸收中国人存款数字之巨。而帝国主义者把吸收来的資金，又轉貸給中国政府作为政治投資，以获取巨利。过去汇丰銀行对清朝政府的所謂“銀借款”、“金借款”、“英德借款”以及各国銀行团对袁世凱的善后大借款等，都是全部或大部分由在华帝国主义銀行运用中国人資金和中国賠款而再轉借給中国政府的。

---

<sup>①</sup> 參閱1935年《上海市年鑑》金融篇，第83~86頁。

另外，它們又运用这些存款来支持帝国主义在华企业，使外商企业享有优先的低利借款、透支、抵押等权利，譬如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地产商运用銀行資金进行投机，就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上海几十家帝国主义地产商，沒有一家不是以銀行为后台。据日本东亚研究所調查，上海 8 家英国地产商及 3 家美国地产商的活动資金，大部分都是靠銀行透支的，其情况如下表<sup>①</sup>：

国 别	資 本 額	銀行透支額	透支占資本百分比	存 款	存款占資本百分比
英商 8 家	39,450	21,521	54.5	590	1.4
美商 3 家	14,156	12,707	89.7	1,604	11.3

(单位:千美元)

大家都知道，上海汇丰銀行是帝国主义企业的支持者，上海英商中最主要的 40 家大企业，如怡和集团、沙逊集团、业广地产公司、仁記行、太古集团等等，都与汇丰有密切的关系。汇丰銀行的董事中，有怡和、太古、天祥、沙逊等的代表；而汇丰的經理和董事又分別担任很多英商企业的董事。他們相互之間的关联，局外人簡直很难洞晓。据英国人估計，1929 年上海英国銀行单对地产商的押款就达 350 万英鎊。从这一个角度来看，即使是純外資企业，实际上也有大量中国人的資金在內。因为透过帝国主义銀行作媒介，由銀行吸收中国人存款，再由銀行貸給帝国主义企业充当資本，結果就形成这样一条綫：中国人的存款——帝国主义銀行——帝国主义企业。所以帝国主义在华企业，从表面上看虽有一些是純外資开設的，但事实上仍是黑幕重重，非常虛伪，不过它們丑恶的假象已被帝国主义銀行用“信贷

<sup>①</sup> 参阅杉村广藏編：《各国对华投資概述》，日本东亚研究所 1943 年版，第 28 頁。

关系”和“金融业务”这些粉红色的外衣遮掩起来而已。所以速雷麦也不能不承认说：“有许多在中国各大城市的外商银行家在1930~1931年的冬天告诉我，华人存户供给了他们足够的资金，以致可以说他们在中国完全没有投资了。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这样答复：外商银行是种产生进款的企业，而其进款又是流到通常不住在中国的外人股东手里的。”<sup>①</sup>又说：“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这种外国银行，吸收了中国人的存款，再投资于外国证券方面，并且将准备金存放国外。他们以为这种银行的营业，不啻是华资投于国外的一种方法。这在事实上自然是不错的，……”<sup>②</sup>

五、帝国主义的所谓在华投资中，有一笔很大的政治借款。帝国主义过去对反动的中国政府给予大量借款的目的是十分卑鄙的，它们一方面想通过借款来取得特权，掌握中国政治，支配中国财政，以更多地吸取中国人民的血汗；另一方面以借款来巩固封建王朝、封建军阀与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以加强其镇压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势力。因此帝国主义者侵入中国不久便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除利用特权直接经营各种企业外，同时还大量借款给反动政府，以获取种种政治、经济利益。计甲午战争以前，清朝政府向汇丰银行等借款共12笔，约合5,000万两，均以海关税作担保，其息率自5厘至8厘不等。此类借款，都已在1895年以前基本上还清。甲午战争后，清朝政府因须偿付对日赔款23,000万两，又于1895年以后陆续大举借款，如汇丰银行借款、怡和洋行借款、俄法借款、英德借款、英德续借款等等。民

<sup>①</sup> 雷麦：《外人在华投资》，商务印书馆1959年修订版，第70~71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299页。

国成立后,又有英商克利浦斯借款以及袁世凯向英、德、法、日、俄5国銀行团的善后大借款等。这些都是以关税、盐稅等作担保,息率自4厘至7厘不等。

政治借款和铁路借款最多的时期,是在1895~1914年。当时也是中国支付賠款最多的时期。甲午战争的对日賠款本息約为26,000万两,全部是这个时期付清的。庚子賠款一部分約計29,000万两(包括镑亏),也是1902~1914年这段时期偿付的。以上两笔賠款合計为55,000万两。

现将1894~1914年10笔政治借款和12笔铁路借款的数字列表如下:

1894~1914年間各国对华政治借款表<sup>①</sup>

借款年份	借款名称	数 額	年息	折扣率	折扣后实收数
1894年	汇丰銀款	1,635,000鎊	7厘	98%	1,602,300鎊
1895年	汇丰金款	3,000,000鎊	6厘	92%	2,760,000鎊
1895年	克薩鎊款	1,000,000鎊	6厘	95.5%	955,000鎊
1896年	瑞記洋款	1,000,000鎊	6厘	96%	960,000鎊
1904年	汇丰銀行新借款	1,000,000鎊	5厘	97%	970,000鎊
1895年	俄法借款	400,000,000法郎	4厘	94.125%	376,500,000法郎
1896年	英德借款	16,000,000鎊	5厘	94%	15,040,000鎊
1898年	英德續借款	16,000,000鎊	4厘半	83%	13,280,000鎊
1912年	克利浦斯借款	10,000,000鎊	5厘	89%	8,900,000鎊
1913年	善后借款	25,000,000鎊	5厘	84%	21,000,000鎊
合計总数		74,635,000鎊 400,000,000法郎			65,467,300鎊 376,500,000法郎
折合成美元后的总数:		445,712,500美元			396,089,770美元

說明: 汇率每鎊折合4元9角美元。每法郎折合0.2美元。

① 本表根据賈士毅著《国債与金融》(商务印书館1930年初版)外債編第6~12頁材料和刘秉麟編著的《近代中国外債史稿》(三联书店1962年第1版)第13~22頁的有关材料編制。

1898~1914 年間各国对华铁路借款表①

借款名称	年份	金 額	息 率	折扣率	实 收 数
京奉铁路借款	1898年	230万鎊	5厘	90%	207万鎊
正太铁路借款	1902年	4,000万法郎	5厘	90%	3,600万法郎
沪宁铁路借款	1903年	290万鎊	5厘	90%	261万鎊
汴洛铁路借款	1903年	2,500万法郎	5厘	90%	2,250万法郎
道清铁路借款	1905年	80万鎊	5厘	90%	72万鎊
广九铁路借款	1907年	150万鎊	5厘	94%	141万鎊
津浦铁路借款	1907年	500万鎊	5厘	93%	465万鎊
沪杭甬铁路借款	1908年	150万鎊	5厘	93%	139.5万鎊
津浦铁路續借款	1910年	480万鎊	5厘	94.5%	453.6万鎊
汉粤川铁路借款	1911年	600万鎊	5厘	95%	570万鎊
京汉铁路借款	1911年	1,000万日元	5厘	95%	950日元
陇海铁路借款	1912年	400万鎊	5厘	85%	340万鎊
合 計:		2,880 万鎊 = 14,112万美元 6,500万法郎 = 1,300万美元 1,000万日元 = 500万美元		2,649 万鎊 = 12,980万美元 5,850万法郎 = 1,170万美元 950万日元 = 475万美元	
折合成美元后的总数:		15,912万美元			14,625万美元

說明：汇率每鎊折合4.9美元。每法郎折合0.2美元。每日元折合0.5美元。

以上两表的借款总数，照1894~1902年的汇率每鎊折合4元9角美元，每一法郎折合2角美元，实收約54,234万美元。按当时1美元折合7錢4分2厘的汇率，为中国关平两73,090万两。这个数目，比中国从1894~1914年間实际付出的甲午战争赔款和庚子赔款仅多約18,090万两。这就是說，从国际收支角度来看，这个时期中国向外国实际借到的款項不大。而且我們还必须指出，这个借款数字，决非在这个时期内实际借进的外国資本。事实上，一方面借款，同时又是逐年逐年偿还本息的。如

① 本表根据賈士毅著《国債与金融》(商务印书館1930年初版)交通債務編，第9~33頁材料編制。

俄法借款，自 1896 年起即每年偿还本息 21,154,752 法郎；英德借款自 1896 年 4 月起，即每月偿还本息 80,579 鎊；英德續借款自 1898 年 3 月起，每月偿还本息 69,602 鎊。而汇丰銀借款 163.5 万鎊、汇丰金借款 300 万鎊、克薩鎊款 100 万鎊、瑞記洋款 100 万鎊、汇丰新借款 100 万鎊等，到 1915 年則本息均已全部清偿。所以，上表所列政治借款，大部分都已在 1915 年前偿还了。

帝国主义对中国反动政府的所謂借款，实际上仅仅是賠款的化名，将“賠款”二字，换成了“借款”二字。譬如俄法借款、英德借款、英德續借款三笔大借款共計 4,800 万英鎊，其中 90% 都未进入中国，而在伦敦就交割給日本人偿付賠款了。帝国主义者并且在借債这一个幌子下，从中国掠夺去更多的利益，对中国进行着更残酷的榨取。它們以借款为手段，夺取了海关、盐务机关的管理权和人事权；从借債折扣中，取得了更多的利潤和利息。仅善后大借款一笔，名为借款 2,500 万英鎊，但因八四折扣关系，实收仅 2,100 万鎊，虚額竟达 400 万鎊之多。这就是說，从借債日起，帝国主义者即先得到 400 万鎊、即近 2,000 万美元的厚利。而且最岂有此理的是中国沒有实收到手的虚数，竟然也要照付高昂的利息。善后大借款的利息原规定为年利 5 厘，但因八四折扣关系，实际息率已經不是 5 厘，而是将近 6 厘了。俄法借款息率名为 4 厘，但按折扣后实交的息率为 4.25%，到 1910 年，按所欠銀数核算計年息 5.67%；这笔借款从 1895~1934 年清偿时止，付出利息共計庫平銀 117,940,606.77 两，为所借本銀 130.2%。英德借款年息 5 厘，但按九四折实收的息率則为 5.26%，到 1910 年按所欠銀数核算为年利 6.88%；从 1895~1932 年借款清偿时止，共付利息达庫平銀 141,165,832.01 两，为所借本銀 152.7%。英德續借款年息 4.5%，但按八三折扣实

交數的息率為 5.4%，到 1910 年按所欠銀數計算，則為年息 7.05%；從 1898～1934 年所付利息達庫平銀 133,123,843.06 兩，為所借本銀 164.8%。<sup>①</sup> 這些借款，除了大打折扣和奇高的利息外，而且由於帝國主義銀行壟斷了中國的外匯市場價格，操縱匯率，當借款交付時，便提高外匯價格，少付銀兩，以獲取銀價差額。而當帝國主義銀行收取借款本息時，則又壓低銀匯率，以多收銀兩。如 1904～1907 年償付俄法、英德兩筆借款的本息時，就比這 4 年的平均匯價多付出了庫平銀 310,710 兩。而且所有借款在償還本息時，經手的帝國主義銀行都要多收千分之二點五的手續費。所以，深入分析一下，剝開外皮來仔細看一看，就可以完全明了所謂政治借款，根本就是帝國主義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對他們進行敲詐勒索的罪惡勾當。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政治借款，其實是鴉片利潤和中國人的銀行存款的轉化；實質上也就是帝國主義者榨取了中國人的錢，然後借給中國反動政府以進行更殘酷的剝削和掠奪的別名。

總之，帝國主義的所謂在華投資，是戰爭賠款、鴉片利潤、土地霸占、壟斷中國金融、壟斷中國國際貿易、利用中外合資等等一系列從中國人民身上榨取得來的資財的轉化，它們先掠奪到了中國人民的大量資金以後，再以對華投資形態、借款形態等出現，以進一步擴大經濟侵略。因此，帝國主義的所謂在華投資，揭開事實真象，實是黑幕重重，到處都充滿着虛偽和罪惡。

近百年來，英美帝國主義者除了利用大炮、兵艦在中國取得政治經濟特權外，它們還特別制定了一些法律來支持和鼓舞它們的冒險家來中國開創“事業”。根據英國“皇家殖民法”，很多

① 參閱徐義生：《從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時期清政府的外債》（上），《經濟研究》1967 年第 4 期，第 111～112 頁。

以中国資本为主的公司都在香港注册成为英商；1915年起，英国政府逐渐以法律规定：英国人应占有这些公司的总管理权和财务管理权，其董事、查賬員、清算人等都要英人担任，但准許这些公司大量吸收中国人的資本。1922年美国国会为了支持和鼓励美商在中国扩展势力，通过了“对华貿易法”，规定中美合資企业由美国保护。1925年，美国把这个“对华貿易法”又加以修改，其目的就是鼓励在中国的美国人攫取中国的資本来經營在华企业。美商中国营业公司、普益地产公司以及上海电力公司，1925年以后，在上海相继大量发行股票和公司債，都是以这个“对华貿易法”为根据的。由此可知，利用中国人的資金来发财致富，是帝国主义政府有計劃的险恶阴谋。它們一方面利用中国人的資金来大规模扩展其在华經濟势力，尽情剝削，攫取最大的利潤；另一方面又尽量把中国人的資金吸吮干淨，企图使我国民族工矿企业永远不能发展，从而使中国永远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

## 第二节 投資的流动性

帝国主义在华投資的第二个特征，就是資金的流动性。这也还带着海盜掠夺的木质。它們在中国經營的所謂企业，重工业固然很少，就是輕工业也不多。它們主要从事于商业性的掠夺和剝削，資金流动性和投机性很大。帝国主义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把中国永远变成它們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决不允許中国民族工业有所发展。这是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最高原則。在甲午战争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竞办工厂的时候，有一个駐华英国公使便說：“机器进中国，恐非西国之福。”他的意思显

然是不希望中国有工业，不希望运机器来装备中国的工厂。日、美帝国主义先后鼓吹“农业中国”“工业日本”、“农业中国”“工业美国”的阴谋诡计，也就是不希望中国有工业。正因为帝国主义者不希望中国有工业，不容许中国民族工业有所发展，所以它们自己在中国的经济活动，大都是商业性的掠夺以及同商业有密切关联的金融、保险、交通运输等，对于真正的基本工业则始终不积极，仅纺织、卷烟等轻工业略有发展。

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直接经营的企业投资，由于它们奸诈地、巧妙地运用了中国人的资金，帐面数字很大。据估计1936年时，帝国主义在我国关内外的直接企业投资，总数达269,347.4万美元。其情况如附表①：

(单位：千美元)

国别	金融业	贸易业	运输业	矿业	制造业	公用事业	未分类者	合计
英国	169,212	230,168	79,230	34,157	107,336	31,108	—	651,211
美国	36,827	70,238	12,234	—	20,999	70,506	—	210,804
法国	36,269	9,990	44,722	—	3,519	13,170	—	107,670
日本								1,629,533
关内	40,281	45,640	27,626	34,846	140,075	8,505	8,329	305,302
东北							1,324,231	1,324,231
德国	8,582	22,771	3,708	810	2,864	1,950	—	40,086
意大利	1,951	2,185	230	—	183	—	—	4,558
比利时	5,320	2,250	—	—	780	7,092	—	15,451
荷兰	11,707	2,068	274	—	—	—	—	14,149
瑞士	—	4,823	—	—	2,943	—	—	7,766
丹麦	18	2,192	26	—	333	—	—	2,569
其他国家	—	5,325	1,762	—	2,590	—	—	9,677
合计	310,177	397,650	169,321	39,813	231,622	132,331	1,332,560	2,693,474

说明：关于日本在东北的投资，据吴承明同志分析，运输业达55,000万美元左右，矿业约20,000万美元，制造业、公用事业约20,000万美元，金融业和商业各约15,000万美元，其他约5,000万美元。

在帝国主义直接經營的企业投資中，金融業及貿易業所占的比重为最大。在1936年，帝国主义金融業及貿易業（包括东北在內，以下同）的投資額約达10亿美元，占帝国主义在华投資总数的37%，即将近五分之二；交通運輸業約为72,000万美元，占总数的27%。三者合計，占全部帝国主义在旧中国投資总数的64%。

以上三种企业都是最具流动性和投机性的。以金融業而論，除了办公房屋及家具用品外，几乎全部都是属于流动性的資財，如有价証券、匯款票據、庫存金銀或紙幣等等，都是属于日常金融業務往来的資財，投机倒把和买空卖空的情况非常严重。現在我們为了說明帝国主义銀行資金的流动性和投机性，特將金融界最有势力的汇丰銀行和麦加利銀行1934年的資產負債表附志于下②：

(一) 汇丰銀行 1934 年的資產負債表 (单位: 港元)

資 产		負 債	
庫存現金及運送中之生金銀	315,309,443	實收資本	20,000,000
有价証券	194,414,110	公 积 金	86,097,561
放款及貼現	318,955,251	發行兌換券	133,946,215
应收票據	92,248,247	往來存款	504,204,989
保 証	4,916,689	定期存款	179,192,461
營業用房產	22,118,388	应付票據	9,690,000
		保 付	4,916,689
		損 益 賬	9,914,213
合 計	947,962,128	合 計	947,962,128

① 參閱吳承明編：《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資》，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版，第160~161頁。

② 參閱1937年《上海市年鑑》金融篇，第95~96頁。

(二) 麦加利銀行 1934 年的資產負債表 (单位: 英鎊)

資 产		負 債	
庫存及存放同業兌換券		資 本	3,000,000
現金准备	6,473,100	公 积 金	3,000,000
庫存及运送中現金銀	1,872,403	发行兌換券	1,851,106
政府公債及其有价証券		往来存款及备抵呆賬	26,854,135
等保証准备	17,359,970	定期存款	19,694,289
大英銀行股票	2,306,140	应付票據	1,720,525
匯票及國庫券	9,610,828	保 付	884,664
放款及貼現	21,646,286	应付抵押放款	3,670,942
保 証	884,664	代理处往来	8,200
代理处往来	96,879	雜項負債	504,475
雜項資產	326,169	損益賬	462,395
營業用房產器具	1,574,292		
合 計	61,650,731	合 計	61,650,731

根据这两张資產負債表,可见这两家銀行的資產,几乎全部都是兌換券、政府公債、有价証券、庫存及运送途中的現金銀等流动性資財,只要一条大輪船就可裝載运走的。至于它們的投机性,那就更加显然。汇丰銀行之操纵我国外匯市場、証券市場而兴風作浪、推波助瀾,是尽人皆知的事实。由于汇丰銀行控制了我国外匯价格,銀价漲落惟汇丰挂牌是从,因而当我国要支付大批款項給帝国主义时,它就将銀价压低,使中国大吃其亏,如1902~1905年3年間,清朝政府償付庚子賠款5,600多万兩,即因銀子匯价跌落吃虧达1,040万兩之多,最后迫使清朝政府不得不向汇丰銀行借款100万鎊(实收97万鎊,年息5厘),作为抵补鎊亏之數,这就是臭名昭彰的所謂“汇丰鎊亏借款”。帝国主义銀行也經常做投机性的販賣金銀勾当。例如,1934年当美帝国主义实施白銀政策打击用銀国家时,上海帝国主义銀行就

大量販運白銀出口，從1934年1月至8月，就被匯豐、麥加利、大英、花旗等行運走了13,000萬兩。僅該年8月21日一天，英國郵船“倫浦拉”號即裝載走了3,400萬兩，其中計銀元5,200多箱，黃金3,306大條。販運這批現銀出口進行瘋狂投機者，以匯豐銀行為最厲害，它運出的白銀數達1,150萬元。其次是大英銀行運出700萬元，麥加利銀行運出700萬元，花旗銀行運出400萬元。<sup>①</sup>當時，由上海運白銀到倫敦販賣，除去一切開支，每運100萬元即可獲純利6~7萬元，利潤之大，殊堪驚人，故帝國主義銀行不顧中國經濟危機和中國人民的死活，拚命投機外運，使我國經濟上遭受了一次空前的浩劫！

至於帝國主義在中國經營的國際貿易業，其強烈的流動性和投機性，則更加明顯。抗日戰爭以前，我國每年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大致為16億元。例如1934年進口總額為1,038,979,000元，出口為535,733,000元。1936年的全國進口貨總值為944,523,000元，出口總值為706,791,000元（不包括東北）。根據日本東亞研究所的資料，我國進口貿易的經營權，幾乎100%都操縱在帝國主義商人手中；出口貿易則80%為帝國主義所壟斷。各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直接經營的企業單位，以從事進出口貿易的洋行為最多。1936年帝國主義在華的輸出入商（日本除外）有771家，計英國262家，占33.98%；美國193家，占25.03%；德國108家，占14%；法國56家，占7.26%；其他國家152家，占19.73%。<sup>②</sup>大家都知道，經營進出口業的投機性最

---

① 參閱王承志：《中國金融資本論》，上海光明書局1936年版，第207~208頁。

② 參閱《各國對華投資與中國國際收支》，日本東亞研究所1944年版，第115~117頁。

大。据东亚研究所調查，1936年在上海的各国貿易商的資本，包括办公室房地产在內，平均每家也不过50万元。帝国主义貿易商所以能够用有限的資金来垄断中国大宗进出口商品，主要是靠銀行的透支或押汇来扩大营业，并非进出口商自己有那么大的資本。它們的資金的流动性和虛假性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进出口貨本身，也就是流动商品，經常处在流轉过程中。交通运输业的情况大体上也是如此，它的主要資財是交通运输工具和器材，如輪船、汽車等等。其中以輪船所占比重較大。在中国最有势力的帝国主义航业，有太古、怡和、日清三大輪船公司。帝国主义輪船公司不仅垄断我国外洋航运，而且长江內河航运也为它們所把持。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国际貿易海港，1935年，出入上海港的各国輪船吨数，共48,105,571吨，其中英国占首位，为18,541,804吨，日本次之，为9,197,376吨，中国仅有7,622,430吨，远較英、日两国为少。<sup>①</sup>在內河长江航运方面，以太古、怡和、日清和我国招商局的航运力量来比，招商局也处于劣势地位。1936年，四公司經常在长江航运的輪船总吨位为118,537吨，共53条輪船，其中太古16条，29,721吨位，占总吨位的25.1%；怡和13条，32,275吨位，占27.2%；日清17条，35,077吨位，占29.6%；招商局7条船，21,464吨位，仅占18.1%。可见长江內河的輪船运输，帝国主义三大公司占了绝对优势。帝国主义航运业的这許多輪船，經常在海洋上、江河上行駛，显然流动性是最大的。

根据以上所述，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經營占比重最大的金融业、貿易业及交通运输业之流动性，已經非常明显。就是制造

---

<sup>①</sup> 参阅1936年《上海市年鉴》交通篇，第175~176頁。

业中，原料、成品与日常周转金等也都是属于流动性的。正因为如此，所以1949年中国解放前夕，帝国主义在华企业的资财，除一些搬移不动的房地产及码头、仓库和一些陈旧的厂矿设备外，其余几乎全部被撤走到香港、新加坡、印度、南非及帝国主义国家本部去了。

### 第三节 投资的垄断性

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第三个特点，就是集中垄断性。以国别而论，1931年时，英国账面投资有1,189,194,000美元，日本有1,136,921,000美元，美国有196,824,124美元，法国有192,423,250美元，<sup>①</sup>4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占外人在华表面投资额324,250万美元的83.8%。

从帝国主义投资的地区分布来看，大部分集中在上海和东北。英国人的势力绝大部分集中在上海、天津等沿海大城市，日本人的势力则以东北为中心。据雷麦调查，1931年时帝国主义账面投资有34.3%集中在上海，27.1%集中在东北。据日本东亚研究所调查，1936年抗日战争前，帝国主义在关内的银行业账面投资的79.2%、进出口及商业投资的81.2%、工业投资的67.1%、房地产投资的76.8%都集中在上海。当然，这些数字本身并不可靠，它们还有虚假，但由此也可看出，从地区分布来说，上海是帝国主义势力最集中的大本营。“九·一八”事变以后，日

<sup>①</sup> 参阅吴承明编：《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版，第135~146页。美国部分不包括教会财产。

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它在东北地区的势力急剧上升，到1937年时，日本单在东北的表面的虚假投资数字就约有15亿美元，竟占各国在华投资总数的43%。东北之所以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中心，主要是从甲午战争、日俄战役以及“九·一八”事变以后形成起来的。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代替了帝俄在东北的势力，把旅顺、大连及南满铁路等据为己有；“九·一八”事变后，更逐渐扩大，进而独占了东北地区。上海之所以成为帝国主义势力的中心，主要是港口良好，历史悠久，鸦片战争前，上海商业即相当繁盛，人口达27万之多。鸦片战争后，被英、美、法帝国主义划为租界地，其后租界又不断扩大，国际贸易日益增进，上海便形成为帝国主义在远东最重要的侵略基地。

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我国最重要的企业都操纵在几个大垄断集团的手里，形成了垄断资本。英帝国主义在上海的侵略势力最大，它占帝国主义在上海直接经营的企业资本的65%，而英国势力又主要集中在4大垄断集团和4个国际托辣斯手上。所谓4大垄断集团，即怡和集团、太古集团、沙逊集团、颐中烟草集团。国际托辣斯在中国的4个分号，即亚细亚火油公司、中国肥皂公司、卜内门洋行和会德丰公司。这8个垄断组织的总后台是汇丰银行和麦加利银行。这8个垄断组织，直接附设着许多企业，并在中国各地设置了许多分支机构；它们的势力不仅垄断了上海的交通运输、码头仓库、纺织、化学、烟草及房地产等行业，而且其势力还渗透到了全中国。如颐中烟草公司、亚细亚火油公司及卜内门洋行的分支机构或推销店，遍设全国各大城市，甚至深入到西藏、新疆等内地。兹将英帝国主义在上海的这8个垄断组织分别简略介绍如后①。

1. 怡和集团。 怡和集团是英帝国主义在中国最先形成的一个垄断集团。这个集团的始祖怡和洋行，原是贩运鸦片的洋行。它在鸦片战争以前即 1832 年就在广州设立；1842 年又在香港设立机构，到 1843 年上海开辟为商埠后，即同其他经营鸦片的英、美商人蜂拥至上海。怡和洋行的创始人是渣甸和孖地臣。渣甸本来是东印度公司的重要人物，后来自己开设怡和洋行，独树一帜，自行经营。怡和为了便于走私鸦片，一开始便和航运业结合，拥有快艇多只。它所经营的所谓“快蟹扒龙船”，是著名的专门走私鸦片的船只。怡和洋行在上海设立的最初 20 年间，从走私鸦片中获得了 100 万英镑的暴利。1865 年，怡和与道格拉斯轮船公司、大英轮船公司合资创设香港黄埔船塢公司；同年设立省港澳轮船公司；1872 年在上海创设公和祥码头有限公司；1875 年在香港设立印度中国航业公司（即怡和轮船公司，规模宏大，1913 年时有轮船 38 艘，91,706 吨；1924 年有轮船 44 艘，113,395 吨）；1886 年设立香港九龙码头公司。由此可见怡和对于轮船码头业的重视及其关系的密切。随后怡和业务扩大，经营范围更广，除轮船业及进出口业务外，又在中国设厂经营制造业。1882 年，首先在上海非法创设怡和丝厂；1897 年在上海设立怡和棉纺厂和怡和毛织厂；1921 年，怡和兼并中国人祝大椿办的公益纱厂，成立了怡和纱厂有限公司；1923 年设立了怡和机器有限公司；1930 年又设立了怡和啤酒公司。怡和洋行在经营轮船业和制造业的同时，又与汇丰银行合作，于 1898 年设立了中英公司，1915 年设立了福中公司，从事铁路矿山投资。

---

① 参阅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2 辑，三联书店 1958 年第 1 版，第 31~160 页。

1895年6月怡和曾貸給清朝政府所謂“克薩借款”(克薩為怡和洋行總經理)100萬英鎊;1898年以後,怡和用中英公司、華中鐵路公司名義貸給清朝政府京奉鐵路借款230萬鎊,津浦鐵路借款185萬鎊(津浦借款總額500萬鎊,德國占63%,中英公司占37%),津浦路續借款111萬鎊,滬寧鐵路借款290萬鎊,滬杭甬鐵路借款150萬鎊,廣九鐵路借款150萬鎊。此外還有已訂約但未築成的寧湘鐵路借款800萬鎊,浦信鐵路借款300萬鎊。這些借款的條件都是很苛刻的。通過這些借款,怡和控制了中國最重要的鐵路交通。

怡和洋行從走私鴉片開始,一步步的發展和擴大,它所經營的業務遍及輪船碼頭業、工廠製造業以及鐵路礦山投資,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壟斷集團。它在上海、香港兩處設立的或與它有直接關係的各種企業,竟達35個單位之多。它的總分支機構分布在香港、上海、天津、漢口、廣州、廈門、煙台等處。茲將怡和集團最盛時期的關係企業,附表於下<sup>①</sup>：

### 怡和洋行關係企業

設立年代	企業名稱	所在地	簡 單 情 況
1832	怡和洋行本行	廣州	經營鴉片、軍火、航運及其他進口貨。
1835	保安保險公司	澳門	廣東商會、怡和等貿易機構合辦。
1836	諫當水險公司	香港	原名廣東保險公司,1881年改組,1926年資本達250萬元,實收100萬元。
1861	上海紡絲局	上海	有意大利式織機100架,1866年停閉。

<sup>①</sup> 參閱汪敬虞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上冊，科學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330～331頁；又：參閱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科學出版社1955年第1版，第256～257頁。

設立年代	企 业 名 称	所在地	簡 单 情 况
1865	香港黃埔船塢公司	香港	收买黃埔柯拜船塢与香港阿柏丁船塢加以合并成立，資本 24 万元，4年后增为 75 万元，1870年增資至 100 万元，1907年资产达 200 万元。
1865	省港澳輪船公司	香港	英葡合办，抗战前資本 120 万元，资产达 160 万元。
1871	香港九龍碼頭貨仓公司	香港	1906年有駁船 85 只，資本 300 万元。
1872	公和祥碼頭公司	上海	创办时資本 20 万兩，1906年增至 360 万兩。
1873	香港火燭保險公司	香港	1926年資本 200 万元，实交 40 万元，资产达 6,384,000 元。
1875	中华火車糖局	香港	1878年改組为股份公司，資本 90 万元，1887年增至 150 万元。
1878	怡和糖厂	汕頭	只制粗糖，出品全部运往香港加工，佣工約 100 人。
1879	香港雪厂	香港	收买庫里边制冰厂成立，資本 125,000 元，1900年扩充。
1882	怡和輪船公司	香港	資本 120 万鎊，实繳 495,890 鎊，开办时有船 12 只，13,567 吨，1907年增为 41 只，97,260 吨。帳面价值 1,062,985 鎊。
1882	怡和絲厂	上海	最初有織車 200，19世紀末，增至 500 車。資本 50 万兩。佣工 1,100 人，年产量 750 担。
1888	业广地产公司	上海	与仁記洋行合营，初办时資本 100 万兩，有地产 159.5 亩，1907年有地产 23 处，价值 600 万兩。
1888	怡和絲头厂	上海	专门清理廢絲。
1889	香港电灯公司	香港	创办时資本 30 万元，1898~1899 年增至 60 万元。
1889	香港置地及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	与老沙遜仁記洋行等合办，抗战前資本达 1,000 万元。
1896	怡和紗厂	上海	创办时資本 100 万兩，紗錠 4 万枚。1913 年資本增至 150 万兩，紗錠 72,264 枚。1921 年改为怡和紡織公司。

設立年代	企业名称	所在地	簡 单 情 况
1898	天星小輪公司	九龍	渡船业，抗战前資本 100 万元，实交 80 万元。
1898	中英公司	倫敦 上海 北京	与汇丰銀行共同設立，目的为进行对华铁路的投资。并曾进行开采奉天暖池塘煤矿。
1901	香港紡織公司	香港	資本 125 万元，紗錠 55,000 枚。
1904	香港電車公司	香港	有電車 36 輛，佣工近 300 人。
1904	华中铁路公司		与中英公司合办，至 1908 年时对华 5 次借款，計 3,539,851 鎊。
1905	怡和制材厂	上海	在汉口、牛庄、鎮江、南京等地都設立有支行，上海工场經常雇工 200 人左右。
1905	振华紗厂	上海	由怡和洋行大班凱福〔凱尔福特〕及中国人吳祥林合办，資本定額 30 万兩。
1906	香港铁矿公司	香港	販賣铁矿，資本 100 万元。
1907	怡和打包公司	上海	原与中国人合办，1919 年怡和洋行獨家經營。每年可打包 4~5 万件。
1914	杨树浦紗厂	上海	資本 150 万兩，紗錠 55,632 枚。
1915	福中公司		福公司、中原公司各 50 万元組成。1933 年改名为中福公司，主要为中美公司投資。
1921	香港广州制冰公司	香港	为香港牛奶厂公司所創立，又名香港广州冰场有限公司。
1923	怡和机器有限公司	上海	由怡和洋行的机器部独立，机械制作及輸入。
1930	怡和麦酒釀造厂	上海	
1934	霍葛鋼品公司	上海	
1939	怡和药厂有限公司	上海	

2. 新沙遜集团。新沙遜洋行創辦初期在上海最主要的业务就是大量販运鴉片。因为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初，正是英帝国主义販运鴉片来华最盛的黄金时代。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新沙遜洋行仍在中国經營鴉片及进出口。1920 年后，沙遜家族将新沙遜洋行改組为新沙遜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以經營房地产业为主。

沙逊公司于1926年成立华懋地产公司，經營房地产业务，沙逊公司本身則負責資金調配。1928年又設立了上海地产投资公司，专营地产。1930年又設立新沙逊商业銀行上海分行，負責資金筹划調度，对各地产公司进行指导和监督。1934年为了承受哈同妻子罗迦陵的产业16处，又用中和地产公司名义发行公司債1,800万元。

1935年5月，安利兄弟洋行因負債关系将一切财产和企业轉让給沙逊后，沙逊家族在华势力更加雄厚，壟断地位更加突出。至此它的控制势力已不仅在房地产业及进出口业，而且深入到金融、造船、交通運輸、鍋炉制造、釀造飲料等方面。它的壟断地位，已能与怡和集团并駕齐驅。尤其在1935年間，当全上海地价惨跌、金融恐慌极端严重的时候，沙逊倡議中国政府发行地产証券1亿元由他經銷一事(后未发行)，轰动全国，这些更表现了沙逊势力之雄厚。但这里我們要指出的，就是沙逊集团的扩张，中国官僚买办資本对它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从1930~1936年間，中国銀行和浙江实业銀行几乎都成为沙逊集团的御用金融机构，如沙逊集团的中和地产公司、中国国际投資信托公司、扬子銀公司等大量吸收了中国官僚資本和买办資本。中国銀行在宋子文作董理事长时，以近一千万元的巨資承购中和地产公司的公司債，这无异于以我国国家銀行資金去帮助帝国主义地产商加强侵略，完全暴露了四大家族彻头彻尾是帝国主义利益的代理人。因此尽管沙逊在表面上資力雄厚，但实际上他的企业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資金是靠发行公司債得来的，是属于中国人的資金。

3. 頤中烟草集团。頤中烟草公司是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經營的卷烟业中一个最大的托辣斯組織；它在烟草业方面，从原料

到加工制造、印刷、仓储、运銷及房地产，有一套完整的系統。頤中的前身是英美烟草公司。英美烟草公司成立于1902年，总公司設在伦敦，是一个世界性的烟草托辣斯。中国分公司一开始就兼并了原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些卷烟企业，收买了包括堆棧和老晋隆洋行經銷业务在内的前美国紙烟公司的产业，取得了克雷斯公司的經銷业务。同时，它自己在上海、汉口、沈阳、哈尔滨、威海卫等处設立工厂，积极扩大經營。它的分支机构及代理商号，遍布全中国。在烟叶生产量最大的河南、山东、安徽，还购买了几千亩土地作为烟叶种植场，直接控制原料出产，并以放高利貸的形式預先借款給农民，作为压价收购烟叶的誘餌。1934年，英美烟草公司改組为頤中烟草公司，规模扩大，壟断地位更为加强。1932年，頤中集团生产卷烟紅錫包、老刀牌、前門、大炮台等产量占关內总产量的45.9%。到1935年頤中集团的产量增加到64万余箱，占关內总产量的59.4%。該年国民党財政部征收卷烟統稅85,843,000元，頤中一家所繳統稅即达52,425,000元，而这个数字还是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特別优待，将七級高貴烟降低到三級至五級米征收的。1937年，頤中产量更增加到78万余箱，打破了历史紀錄。

4. 太古集团。太古初期的主要业务是販賣鴉片，从販賣鴉片中賺到暴利以后，逐漸轉向航运业。太古于1865年在香港設立省港澳輪船公司，1867年成立中国航运有限公司，1890年設立太古造船厂，1904年設立天津駁船股份有限公司。它們的总公司虽設在香港或伦敦，但在上海設有规模宏大的分公司，主要业务中心也在上海，控制着长江及中国沿海的航运。1934年，太古专在长江航行的輪船就有15艘，共計34,496吨位，全年載运貨物达343,988吨。太古公司在上海的碼頭长度有4,200

呎，拥有 60 座仓库，起重机多架，每天装卸货能力达 3,600 吨。码头容量可同时停泊大轮船数艘。除了本公司的轮船码头外，蓝烟囱轮船码头公司亦属太古集团。另外，与太古集团有密切关系的各国联号有 30 多个，它们来华船只都由太古代理，所以太古在上海港进出的轮船最多，平均每天都有两艘轮船靠岸。太古与怡和两个公司垄断了中国航运业的 50% 以上。我国的海河航运及码头业务，大部分操纵在它们手中。太古除经营轮船业务外，在上海、香港还设有几卡达保险公司、保守保险公司、海洋保险公司、东方保险公司、太古车糖公司及永光油漆公司等企业单位，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垄断集团，与怡和集团并驾齐驱。

5. 亚细亚火油公司。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又名英荷壳牌石油公司。这家公司原为荷兰殖民主义者所有，是一个名叫德特尔登的荷兰人于十九世纪末在印度尼西亚棉兰市创设起来的，最初叫荷兰皇家公司。1907 年，这个公司与英商壳牌运输和贸易公司合并后，改用今名。当时，荷兰占有资本五分之三，英国只占五分之一，但管理大权却操在英帝国主义手上。以后英帝国主义的资本逐渐增强，美帝国主义的资本又插进了一小部分，这个公司实际上便完全为英帝国主义所垄断，所以，在中国设立的亚细亚火油公司，都冠以“英商”名义。英荷壳牌石油公司是全球性的石油卡特尔，它在各国的分公司和油矿有 200 多个，雇用职工多至 25 万人。它的石油产品约占资本主义世界石油总产量的 30%。

在中国的亚细亚火油公司，创设于 1907 年，是壳牌石油卡特尔在中国的分号。最初有两个机构，一为华北亚细亚火油公司，一为华南亚细亚火油公司，后来两者合并为亚细亚公司。它在中国各处设有几百个分支机构或商行，甚至最偏僻的农村山

販也有它的代銷店。它是帝國主義者製造的一套深入我國腹膜的吸血管，吸吮着我國每一個人身上的血汗。在解放前它所銷售的火油經常占我國火油總銷售量的30%左右。

英帝國主義在上海除上述5個大托辣斯和壟斷集團外，還有卜內門洋行、中國肥皂公司、會德豐公司等也都是壟斷企業。卜內門洋行是英帝國主義的國際托辣斯，它在英國有300多個工廠。中國設立的分號則專營化學品進口及土產出口業務。它在各地的分支機構很多，營業額很大，最多時一年能夠營業470萬鎊，約合6,000萬元。中國肥皂公司是英國大托辣斯利華兄弟公司在中國的分號。它在上海設有規模宏大的全套制皂廠，每月能產洗滌肥皂2,000噸、香皂120噸，甘油一年產量2,000噸。它的產品如力士香皂、利華藥皂、祥茂肥皂等都銷行全中國，每年產量約占上海肥皂總產量的45%。會德豐公司在中國的历史很長，創設於1863年，主要經營輪船倉庫業務，在英商航業中僅次於怡和、太古兩家。

抗日戰爭以前，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壟斷勢力也極為驚人。南滿鐵路公司是一個最大的壟斷集團，它創設於1906年，是日俄戰爭後日本人從帝俄手中奪取到的贖物。南滿鐵路總公司設在大連，分公司設在日本東京，於1907年正式開始營業，最初資本定為2億日元，股票半數為日本政府所有，半數為商民所有，表面上為半官半商的企业，但實際上則完全由日本政府控制，為一典型的帝國主義壟斷企業。到1920年增資為44,000萬日元，資本之雄厚，在日本無與倫比。南滿鐵路公司一方面凭借自己資金雄厚，另一方面又利用帝國主義的特權，故其經營範圍極為廣泛。最初它以經營690公里南滿鐵路及撫順煤礦為基干，但後來逐漸擴大，其業務範圍竟遍及港灣、制鐵、海運、陸運、

电气、瓦斯、染織、煤矿、印刷、旅館以至土木工程、豆油制造、教育卫生等等。凡南滿鐵路公司所屬地帶及其經營範圍之內，它不仅具有商业权，而且还掌握了地方行政权，不受中国官厅管轄，儼然成为一个存在于中国境內的独立王国。南滿鐵路公司附属企业单位竟达130多个，形成垄断东北經濟和榨取东北人民血汗的一个大托辣斯。据美国人雷麦的統計，南滿鐵路公司自1907年開設起到1931年止，付給日本政府的紅利約为14,500万日元，付給日本股东的紅利約为20,000万日元，付給英国及日本的公司債利息在30,000万日元以上，賬面公積金18,860万日元，四項合計共达83,360万日元。据雷麦估計南滿鐵路公司本公司及其全部附属企业資財，在1930年至少有69,080万日元，占日人在华直接投資总数的39.5%，占日人在东北投資总数的63%。另外，在行政及文化方面的财产尚有1,045万日元，对中国政府的放款5,070万日元。南滿鐵路公司在1906年創辦时，虽号称資本2亿日元，但日政府的1亿日元資本全部由鐵路撥充；日商1亿日元，实收仅200万日元，当时營運金大半靠在英国发行的一批公司債。但从1907~1931年的25年間，計其所分紅利、公積金及現有财产共計竟达167,300万日元以上；垄断利潤之厚和剝削程度之甚，真正达到了极点。

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也很悠久，它的侵略魔掌几乎与英国同时深入中国。美国虽是后起但也是最凶恶的帝国主义国家，它在中国垄断經濟的形成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而且它在中国垄断地位的形成和巩固，与国民党反动派蔣、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引狼入室和为虎作倀有密切关系。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握有三种垄断經濟，一是电力的垄断；二是石油的垄断；三是民用航空的垄断。美帝国主义这三种垄断經濟都是在1925年以

后形成的。

1937年，帝国主义在华电厂发电量占全中国发电总量的77%；其中，大部分为美商上海电力公司和沪西电力公司所垄断。这两个公司1936年的发电能力达81万千瓦时，超过中国446家电厂的总和，其中85~90%都供应于工业用电，因而上海工业生产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为上海电力公司所掌握。上海电力公司对工业用电的收费是公开歧视中国民族工业的，它规定凡外商工厂用电每度收费4分，中国工厂用电每度收费6分，以高三分之一的电费来增加中国工厂产品的成本，使中国人设立的各项工业都无法与帝国主义企业竞争。这个垄断企业每年所获纯利都在600万元以上，如1934年纯利为6,623,539元，1935年为6,320,869元，1936年为6,147,928元。

解放以前，我国所用石油，几乎全部都为英、美两国的石油托辣斯所垄断。其中美国的中美、美孚、德士古三个石油公司又垄断了全中国石油消费量的70%。中美石油公司设立于1933年，账面资本额为417,460美元，系中美合资性质，专事进口和提炼石油。美孚石油公司设立于1933年，账面资本额为1,000万美元，专事进口和推销石油，并制造盛油器皿。德士古在华分公司设立于1925年，账面资本额500万美元，也是进口和推销石油，兼制盛油器皿。

我国民用航空事业，正式开始于1928年，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交通部成立了沪蓉航空处，开航上海——成都线。1929年春，反动政府明令组织中国航空公司，特派孙科兼任理事长，与美国航空发展公司签订航空运输及航空邮运合同，凡南京——北京线、上海——汉口线、上海——广州线一切运务及机航人员，都委托美国航空发展公司负责办理（不久，该公司让权与美国飞运

公司)。这一纸合同，无异于将我国整个国家的航空权出卖给美帝国主义了。中国航空公司名义上虽对外营业，但实际上一切业务和大权都操之于美帝国主义分子之手，完全是美国公司在中国进行活动。1929年10月17日由美帝国主义控制的中国航空公司的沪汉线开始飞行后，原交通部举办的上海——成都线大受打击，曾提出反对。同时，全国各界都认为中国航空公司与美国人所订的合同丧失国权太大，群起抗议。但反动政府不仅不将原订卖国合同取消，反在美帝国主义压力下，另订合同，进一步将中国航空公司改为中美合办，并将原交通部沪蓉航空处并入该公司，至此美帝国主义更名正言顺地控制了我国的航空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原来中德合办的欧亚航空公司，又落入美国流氓陈纳德之手，更名为中央航空公司，改由中美合办。至此，中国民用航空事业，便完全为美帝国主义所控制和垄断。

根据以上所述，可知英、日、美三个帝国主义国家对旧中国经济的垄断与压榨，是如何的严重。大家都知道，垄断企业有两个主要特点：一为排他性；一为高额利润的榨取。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各部门的垄断企业，也充分表现了这两个特性。旧中国工业长期不能发展的原因虽多，但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排挤、打击和侵害。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垄断势力是遍布于各行各业的。凡是我国比较重要的经济部门，它们的势力都占据很大比重，居于垄断地位。

1. 银行业方面，最先在中国设立银行的是英国。早在1848年，英国就在上海设立了第一家银行——东方银行。接着于1854年又设立了有利银行，1857年设立了麦加利银行，1865年设立了汇丰银行。法国的法兰西银行、德国的德意志银行也先后于

1863年及1875年在中国設立机构。到十九世紀末，帝国主义者在中國已有7家銀行开业，而中國却只有一家中國通商銀行（1897年設立）。据統計，1931年帝国主义汇丰、正金、花旗、東方匯理4家銀行与我国中央、中國、交通、上海、大陸等29家主要銀行的營業情况对比，無論就实收資本、存款、公積金及純益来看，華商銀行都远不及4家帝国主义銀行，其情况如下表：

**汇丰、正金、花旗、東方匯理与我国29家  
主要銀行營業情况比較<sup>①</sup>**

（单位：千元）

項 目	我国29家主要銀行	4家帝国主义銀行
实 收 資 本	155,784	516,000
公 积 金	47,347	257,606
存 款	1,860,656	6,803,152
发 行 鈔 票	392,367	352,941
本 年 純 益	21,065	54,745
資 产 总 額	2,569,606	8,472,314

看了这一张表，帝国主义銀行在我国金融業方面的优势和壟断地位，就可一目了然。

2. 在鐵路航运方面。解放以前，我国大部分鐵路与帝国主义有借款关系，都直接間接地受着它們的控制。在1903年，中國有鐵路4,360公里；其中帝国主义直接建筑經營的，如胶济鐵路、滇越鐵路、滿洲鐵路等达2,735公里，占63%，其余是中國借外債建筑，在财务上、人事上、經營上都受着帝国主义干預的。到1936年时，中國鐵路有19,028公里，其中帝国主义直接管理的有8,766公里；国民党所謂国有鐵路7,987公里，都有外債抵

<sup>①</sup> 參閱王承志：《中國金融資本論》，上海光明書局1938年版，第55~56頁。

押关系。帝国主义者对中国铁路交通的直接经营和给予借款，所以如此感到兴趣和重视，显然是它们知道铁路是侵略中国大陆的一把最重要的钥匙，同时又是最能获致厚利的交通工具，没有铁路交通，侵略势力就难以大规模地深入中国腹地。这就是帝国主义者为什么长期以来牢牢控制中国铁路的显明理由。同时，由于中国海岸线长，内河交通重要，因此帝国主义者一侵入中国便首先控制了航运事业。根据我国历年海关报告及日本东亚研究所的调查，中外航运业方面的比重：1913年，中国外洋航运和内河航运的吨位，外轮占78.7%，中国轮船及机帆船仅占21.3%；1930年外轮增加到81.2%，中国下降到18.8%。1936年，关内的外洋航运共4,520多万吨，其中外轮占83.8%，中国船只占16.2%。1936年在我国沿海和内河航行的各式外轮有609艘，总数约57万多吨；同时期中国船包括拖驳及机帆船共3,457艘，总数约576,000吨。就当时总吨位的表面数字看，中外各半，但中国轮船由于经常遭受帝国主义的排挤和打击，航运很不正常，并且经常有10万吨左右租给外商经营，因而中国轮船实际航运者仅三分之一强。<sup>①</sup>从前面这些数字看来，帝国主义在水陆交通方面都占着绝对优势。交通优势既被帝国主义掌握，那么，与水陆交通有密切关系的国内外贸易以及农、矿产品的运输，也就不能不为它们所控制和垄断。

3. 在电力方面。电力是近代大工业生产最重要的动力。没有电力，很多机器就不能转动，工厂就要停工。但是中国的电力，也正如其他经济部门一样，解放以前，大部分被控制在帝国

<sup>①</sup> 参阅吴承明编：《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版，第98~99页。

主义手中。1931年时，帝国主义办的电厂所占发电容量约为全国总数的60%，发电量所占比重为68.5%；1937年，帝国主义电厂所占发电容量升到73%，发电量增加到77.1%。在电力供应上，由于中国电厂规模小，用于电灯照明为主，而帝国主义电厂则以供应生产上的电力为主，以通过电力供应来控制工业。如美商上海电力公司供应工业用电，占其总发电量的85~90%，因而上海工业生产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为上电所掌握。<sup>①</sup> 英美帝国主义为了打击中国民族工业，除了在收取电费上一向公开歧视中国工厂以外，还常常采取对中国工厂停止供电的恶毒手段。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由于停止供电的缘故，迫使中国大批工厂停工，大量工人失业，使中国人的各项工业都无法与帝国主义竞争。上海电力公司为关内最大的电厂，它有十层楼那么高的高温高压锅炉，1936年它的发电能力达81万千瓦时，超过中国446家电厂发电量的总和。

4. 在煤铁方面。中国煤铁业基础最为薄弱。1916年，全国新法、土法采煤的总产量为13,438,000吨；而外人经营的煤产量占51.9%。1920年全国煤总产量21,260,000吨；外人掌握的煤产量占46%。1930年全国煤总产量25,991,000吨，外人掌握的占56.8%。1936年全国煤总产量35,923,000吨，外人掌握的占55.2%。在1936年，我国新法开采的铁砂，年产量约200万吨；其中由日本资本直接经营的鞍山和本溪湖铁矿占60%，中国官僚资本经营但为日本借款所控制的大冶铁矿占40%，该两矿所产铁砂99%运往日本，作为制钢原料，而中国本国的炼铁厂所

---

<sup>①</sup> 参阅吴承明编：《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版，第96~97页。

用的鉄砂,每年不过六、七万吨。我国炼鉄业,1931年日本人經營的鞍山和本溪湖两个冶炼厂的生鉄产量为335,000吨,中国資本的鉄厂則只有六河沟和保晋两个厂开工,年产量仅四、五万吨。外人經營的鉄产量的比重占70%,中国連土法产鉄計算进去也不过占30%。到1937年,鞍山和本溪湖的鉄产量增加到811,000吨,所占比重增加到95%。在鋼产量方面,1937年日本在东北的鋼材产量約246,000吨,中国鋼厂产量仅有50,000吨,外資占83%强。<sup>①</sup> 根据以上数字和百分比,可知我国煤鉄业大部分都为帝国主义所控制,尤其是冶鉄炼鋼业几乎全部为日本帝国主义所垄断。

5. 紡織业方面。中国手工紡織业有悠久的历史,就近代新式棉紡业而論,也早在1873年就有了一个机器織制的紡織厂。在中国民族工业的各部門中,棉紡业是比較发达的一个部門。所以在甲午战争以前,帝国主义在旧中国棉紡織业方面的势力还不大。但甲午战争以后,英、日帝国主义在华的紡織业就急速发展起来。现将1900~1936年間中外紗錠发展的对比情况列表于下<sup>②</sup>：

	华厂紗錠	百分比	外厂紗錠	百分比
1900年	336,722	67.7	160,548	32.3
1914年	544,780	54	464,976	46
1930年	2,345,074	57.2	1,757,004	42.8
1936年	2,746,392	53.8	2,356,404	46.2

① 參閱吳承明編：《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資》，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版，第94~95頁。

② 參閱严中平等編：《中国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选輯》，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1版，第134~136頁。

根据上表,帝国主义紗厂到1936年时已发展到230多万紗錠。单纯从紗錠方面看,外資所占紗錠比重还没有超过一半,但从生产总值方面看,则由于外資工厂享受到帝国主义在华的一些特权以及管理条件比较优越,产值和利潤都超过中国紗厂。以1930年为例,帝国主义工厂的資本有16,100万元,占中国棉紡业資金的56%;华資12,700万,占44%。华資紗厂工人有161,900多人,占总人数的67.8%;帝国主义工厂工人77,000人,占总人数的32.2%。<sup>①</sup>由于資金上、设备上、管理上以及生产运銷方面的种种原因,致使帝国主义紗厂占了极大优势,而中国紗厂则经常陷于停工和破产的境地。据不完整的統計,自1897~1936年,中国紗厂因经营困难被帝国主义兼并的竟有22个厂之多。甚至连中国最大的紗厂上海申新紗厂也往往陷于危险状态。在毛紡业和麻紡业方面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帝国主义工厂毛紡錠约占62%,毛織机占48%,麻紡机占89%,麻織机占91%。从以上数字看来,帝国主义工厂在棉、毛、麻三种紡織业上都居于垄断地位。

6. 房地产业方面。帝国主义利用中国土地进行剝削,是采取封建剝削形式和資本主义剝削形式同时并进的。它們在內地和农村霸占土地,主要是采取了封建剝削形式;在大都市如上海、天津等处的开辟租界、圈占土地、投机倒把等,则是采取了資本主义剝削形式。在內地进行封建剝削以英、美帝国主义的基督教內地会和法国的天主教为最厉害、最典型。基督教內地会,1905年在中国各地設有教堂及房地产475处;1917年增加到

<sup>①</sup> 参閱吳承明編:《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資》,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版,第101頁。

914处；1935年更增加到1,223处，另有支会2,261处。以法国势力为主的天主教，1935年在中国設有117个教区，在甘肃、云南等省都强占了大量土地。帝国主义教会在各地所霸占的土地，除造教堂和住宅外，还雇工耕种，使用了大批的雇农；或采取佃耕方式，直接将土地出租給貧农耕种，收取高租。許多内地教堂的牧师、神父，都是变相的封建地主，在占地較多的大教区里則簡直就是封建王侯。他們剝削手段之狠辣残忍，非一般人所能想象。此外，一些帝国主义企业在内地也占有土地，如頤中烟草公司在皖魯豫諸省占有几千亩地，以低微的工資雇用农民种烟叶，同时貸款給一般烟农，以便廉价收购烟叶，进行残酷剝削。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所占土地面积之广，更为惊人。1937年三菱、三井、住友等財閥組織的“滿洲拓殖会社”竟計劃占地16,000万亩；1940年日本人又成立了一个“滿洲开拓会社”，大事圈占土地，这两个日本殖民机构，竟强占了东北嫩江省耕地面积的45%。

帝国主义在城市进行資本主义性质的土地投机和垄断，以上海的情况为最典型。这在前面已經介紹过，这里不再贅述。

7. 国际貿易方面。抗日战争前中国每年进出口貿易总数約在二十亿元左右，其中出口的80%和进口的几乎全部都是外商經營的。<sup>①</sup>中国进出口商行实际只是外国資本的买办，替外商推銷洋貨和收购土产。所以，我国进出口貿易可以說完全为帝国主义貿易商所垄断。

以上从銀行、鐵路航运、电力、煤鉄、紡織、房地产及国际貿易等方面的叙述和分析，充分証明了帝国主义的势力在我国經濟的各个方面的各个方面都居于垄断地位，控制着各个部門的要害。

<sup>①</sup> 參閱杉村广藏編：《各国对华投資概述》，日本东亚研究所1943年版，第108頁。

## 第九章 帝国主义在旧中国 投资的没落过程

### 第一节 1931年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 投资开始走下坡路

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经济侵略势力，1931年以前是步步深入和增长的，但自1931年以后就出现了不平衡并开始走下坡路。自1931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这十多年间，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大肆劫掠，它的账面投资有显著增加。而英、美、法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侵略势力，到1931年则已到了顶点，此后就一年不如一年，逐步走向衰退和没落了。英、美、法各帝国主义在华投资在这一时期走向衰退的主要原因有三：（一）受到了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及中国白银外流的深刻影响；（二）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排挤和打击；（三）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兴起。

1929年开始发生、前后延绵四年多的世界经济危机，象狂风暴雨一样，袭击了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商业。1929年末，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开始被卷入危机的狂潮。起初是美国交易所的恐慌，在几个星期之中，美国有价证券狂跌了六、七百亿元。此时美国已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中心，它的恐慌立

即波及欧洲及亚洲各国，形成了世界规模的风暴。

随着交易所的恐慌，就产生了物价的暴跌和生产的萎缩。由于生产的萎缩，又引起了数千万工人的失业；失业人数增加和工人生活的困苦，又使得社会购买力激减，使得生产过剩的物资堆积如山，使得工厂、商店、银行资金周转不灵而纷纷破产和倒闭。1932年，世界钢铁（苏联除外）生产比1929年减少68.5%，钢产量减少46.8%。<sup>①</sup>美国制造汽车的机械只有11%开工。钢铁厂机器使用率仅达13%。由此可见生产衰退之严重。至于物价方面，在经济危机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物价跌落情形如下表<sup>②</sup>：

年平均	德 国	法 国	英 国	美 国	日 本
1929年	137	127	127	137	166
1930年	125	113	107	124	137
1931年	111	102	89	105	116
1932年	97	87	86	98	122
1933年	93	81	87	94	136

有一些农产品价格的跌落更为惊人，如世界市场上的小麦批发价格下跌70%，棉花、咖啡、毛类则下跌两倍多。

以上就是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轮廓。

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进出口贸易的恶化与工业生产的锐减，从而影响了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企业经营。1934年、1935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造成通货紧缩、银根奇缺，再加上农产品外销减退和跌价，农村经济更加破产，农民购买力

<sup>①</sup> 参阅彭迪先：《世界经济史纲》，三联书店1949年沪初版，第392页。

<sup>②</sup> 同.上。

更加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进出口贸易都大大降落,中国工业生产更加锐减。1934年,上海各部门工业的开工率,都非常低下,紡紗业仅有75%;制帽、水泥、針織业只有70%;制糖、染織业只有60%;油漆、印刷、电气器具业55%;搪瓷、鉄器、火柴、热水瓶、玻璃业50%;毛織物制油业54%;陶瓷业40%;橡胶业、造船业35%;鉄工业25%;生絲业20%。<sup>①</sup>1935年,中国59家紗厂,有24家停工,14家减产一半。上海商业的萧条情况是:“从1934年废历正月以后,上海全埠倒閉的商店多至300余家,单是法租界大馬路停业商店即达17家之多,南京路上有被封資格的商店,竟达半数以上……。”<sup>②</sup>因为工商业的萧条、减产和破产,銀行錢庄的放款收不回来,使得金融业資金周轉不灵,陷入恐慌,各地銀行錢庄紛紛倒閉。1934年、1935年各地倒閉銀行20多家,占銀行总数10%以上。錢庄、当鋪之歇业破产者更多。由于金融恐慌,銀行、錢庄收縮放款,反过来又使工商业更加陷入困境。上海房地产素占銀錢业押款之半数以上,押款总额达一亿多元。1932年以后,尤其是白銀大量外流以后,因通貨紧縮与百业萧条之故,房地产价惨跌,多数押款都无力清偿。結果房地产商固然破产不少,而上海金融业也深深陷入了这个泥坑。于是,中外商人,金融业、工商业、房地产业等各行各业,相互牽連,相互影响,愈演愈烈,便形成一片混乱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工商业固然受到很大打击,帝国主义在华企业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当时一向为帝国主义所操纵的中国进出口貿易額的萎縮情况,很可以表明这期間帝国主义在华企业的开始衰落。

<sup>①</sup> 参閱王承志:《中国金融資本論》,上海光明书局1936年版,第148頁。

<sup>②</sup> 同上书,第150頁。

同时，帝国主义企业所发証券的暴跌，信用的破产，更显示了它們所受到的打击。茲將 1929~1936 年間中国进出口貿易淨值列表于次<sup>①</sup>：

(单位：百万元)

年 份	出 口	进 口	入 超
1929~1931年	1,464	2,082	618
1933年	612	1,346	734
1934年	535	1,030	495
1935年	576	919	343
1936年	706	942	236

根据上表，可见 1933 年以后，中国进出口貿易額大为下降，直到 1936 年才稍形恢复。

世界經濟危机及中国白銀外流，只是使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經濟侵略势力受到影响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直接或間接地也打击了西方各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使得日本与英、美、法各国之間发生了剧烈的傾軋和竞争。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采取了野蛮的軍事侵略，东三省全部及华北部分地区都陷落在日本手里，因而日本在华活动地区大为扩大，而英、美、法活动地区則相应縮小。这种情况，使得各个帝国主义在华經濟势力发生了极其不平衡的现象。据雷麦的估計，1931 年英国在华的賬面投資有 118,920 万美元，占帝国主义在华投資总数的 37%；日本有 113,690 万美元，占帝国主义在华投資的 35%。据东亚研究所的調查，到 1936 年，英国在华的賬面投資額为 127,250 万美元，

<sup>①</sup> 参阅严中平等編：《中国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选輯》，科学出版社 1955 年第 1 版，第 64 頁。

絕對數字雖因土地價格估高(英國1936年單在上海的房地產投資，據東亞研究所調查有87,697萬元，顯然估高了很多)，比1931年增加了8,330萬美元；但從各國在華投資總數的百分比來看，則它已從1931年的37%降低到28.4%。反之，日本到1936年已增加到200,750萬美元，比1931年增加了87,060萬美元，已從占帝國主義在華投資總數的35%上升到44.5%。

英、美、法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經濟勢力，由於受到世界經濟危機、中國1931年發生的大水災、日本發動的“九·一八”事變、“一·二八”淞滬戰役以及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鬥爭等影響，自1932年以後，無論企業單位的數量、活動範圍或企業利潤，都大為減少。尤其是上海外商金融業、國際貿易業以及房地產業的急劇衰退破產情況，最為嚴重。帝國主義歷年來在中國設立的銀行有38家，到1936年僅剩20家。美帝國主義在華設立銀行14家，到1936年只剩4家。

當白銀外流緊急時，通貨突然緊縮，銀根奇緊，帝國主義企業的證券狂跌，股票市場形成混亂狀態。因此英美在華企業都遭到了很大損失。甚至象安利洋行(其前身為德商瑞記洋行)這樣大規模的托辣斯(號稱擁有資本3,300萬兩，包括中國公共汽車公司、瑞熔機器造船公司、揚子銀公司、中國鋼車公司、上海啤酒公司等)也於1935年5月間因負債而破產。當時怡和洋行也搖搖欲墜，幾乎破產歇業。其情況正如某外人所描述：“銀市風潮雖然使大班們狂忙了一陣，甚至忙得透不過氣來，但大多數洋行總算能維持過去……洋行當中這次受影響最大的就是怡和洋行。它的事業之中，有一部分竟完全凍起來，它的進口營業也大受打擊。好在匯豐銀行是肯維持它的，所以還不致十分狼狽。匯豐銀行是英國政府的一具經濟利器，況且從前又是怡和洋行發

起而設立的，所以它不肯让怡和洋行发生什么不幸的变化。”<sup>①</sup> 不仅怡和洋行如此，其他許多英商企业也是如此，在1935年前后如果不是得到汇丰銀行的支持，就不知要倒閉多少。但是大多数洋行能够維持过去，并不等于它們沒有遭受損失。当时許多洋行表面上勉强維持住了，实际上則处于凍結僵死状态。其具体表现为：（一）营业额一落千丈；（二）对銀行負債累累，利息逐日增加；（三）股票債券的信用下落，市场价格大降。因而，它們的财产实值，不能不大打折扣。例如，以最能体现企业公司信用的股票來說，1935年帝国主义企业股票大多陷于有价无市的状况。如中国营业公司每股10元的股票，在众业公所跌落到5角还没有人要。到了1937年，許多帝国主义企业股票的价格比1932年时还低得多。其情况可见下表<sup>②</sup>：

（单位：元）

外商企业名称	1932年股票最高价	1937年股票市场价格
业广地产公司	44.10	17.00
中国营业公司	18.95	1.45
国际信托公司	14.40	4.25
瑞熔船厂	9.25	3.00
上海电力公司 (电力六两优)	143.25	137.58

根据以上所述，可见西方帝国主义在华經濟侵略势力自1932年到1936年期间，是在萎縮、衰退、走向下坡路；它們在这

① 參閱赫意尔：《百年来的上海演变》，世界文化出版社1946年新1版，第205~206頁。

② 參閱王宗培：《上海外商股票市场》。《財政評論》第3卷第3期。

期間的在华投資額，決不是有所增加，而是比 1931 年時減少了。尤其是不動產部分，1936 年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房地市價，比 1931 年大大下跌，很少有人問津。至於日本帝國主義，從“九·一八”事變後，雖然強佔了我國東北，掠奪了我國很多工礦企業，但在關內由於我國人民展開了大規模的愛國抗日運動，廣泛抵制仇貨，它的經濟勢力也受到了一定的打擊。關內外一起平均算起來，除日本軍閥軍事強佔部分外，1936 年日本在華“投資”額，也不過維持在 1931 年的水平。

按照上述分析，關於 1936 年各帝國主義在華企業投資賬面數字，大致可作如下估計：英國較 1931 年減少 15%（主要因不動產及企業股票價格跌落），美、法、德減少 10%，日本維持 1931 年水平。其具體數字如下：

#### 1936 年各帝國主義在華企業賬面投資

（單位：千美元）

英 國	545,077.8
美 國	146,910.6
日 本	892,161.0
法德及其他國家	251,360.0
合 計	1,835,509.4

應當說明，上列估計，還是依照帝國主義在華企業虛假的賬面投資數字粗略估算的。實際上，如果我們考慮到：（一）帝國主義銀行幾億美元賬面投資的虛偽性，（二）土地投資應當勾銷，（三）中國人持有的帝國主義企業的股票債券額應當剔除等等，那麼，1936 年期間帝國主義在華企業的投資數字，就比上列估計還要大大減少，無論如何不會超過 10 億美元了。

## 第二节 抗日战争开始后英美法在华 投资进一步走向没落

前面所述，仅是西方帝国主义在华投资走向没落的开始。自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至1945年日本投降这个期间，帝国主义在华投资起了极大变化，英、美两国在华经济势力受到了进一步的打击。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国对外贸易陷于停顿，进出口货额都一落千丈。英商怡和、太古、会德丰等三家大航运机构，在抗战爆发后立即把大部分轮船调往香港，只留少数船只在我国沿海口岸行驶。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后，英、法两国在希特勒的闪电进攻中，处境万分危急，国家尚朝不保夕，当然也更无力来顾及远东了。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上海租界和香港后，中国与西方各国的海洋交通完全断绝，仅有的一条陆上交通线路——滇缅路亦一度被英国封锁。在这种情况下，美、英、法与中国之间根本谈不到国际贸易了。中国国际贸易既然陷于停顿，那么依赖中国对外贸易而生存的帝国主义航运业、金融业自然也受到致命打击。

日本帝国主义的物质基础本来是很薄弱的，日本军阀所以敢冒险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也有他们的一套“如意算盘”，即所谓“以战养战”，打算从战争中大量掠夺财富，以作为战时经费。日本帝国主义从这样一个“如意算盘”出发，所以在战争未爆发前，即对中国的国力及英、美各国在华企业情况作了详细调查。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就立即对中国的企业进行了大规

模的掠夺。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英、美、比等国的在华企业也当作“敌性”财产没收：凡是可搬动的原料、成品、现金，都被当作战利品运回日本，其不动产或企业机构，则一律实行军管理或委托某日商企业管理和经营。上海几十家英、美等国的“敌性”房地产商，日军接管后即全部交由恒产地产公司经营。在恒产地产公司管理的4年中，这些英、美地产商人的房地产，租金全部被日本帝国主义没收，房屋没有修理，全部动产如家具及较珍贵的安装设备等则被掠夺一空；某些房地产更被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卖掉。英帝国主义在上海的纺织工业，几被日本帝国主义掠夺殆尽。英商怡和纱厂的机器几乎全部为日本帝国主义搬走，原料和成品全部被没收。英商纶昌纺织公司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就与太古轮船公司一样，将原料、成品、现款移回英国，仅剩动力机械及一些重型设备未搬。被日本军管后，大部分机器就被移往日本人开设的工厂。英商惠罗公司是一个与永安、大新、先施、新新齐名的大百货公司，素以推销名贵货品著名；1941年日军管理后，全部珍贵存货被搬走一空，几已无法复业。英商蜜蜂绒线厂，年产600万磅绒线，有职工1,000人，为上海著名的绒线厂，日军管理后，机器被搬走一部分，动产、成品、原料被没收。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这个厂虽然由英国人复业，但营业规模已远不如昔。该厂复业后，1946年仅产绒线20万磅，1947年产60万磅，仅及战前的10%。英商平和公司系一机械制造兼制酒精厂，资本654,000镑。太平洋战争时，全部为日军接管；机器厂由日本大陆株式会社管理，酒精厂由日本酿造公司管理，除生产酒精外，兼产二氧化碳。抗日战争结束后，平和公司虽然把空厂收回了，但由于被严重破坏，无法恢复生产，已经是一个名存实亡的公司。英帝国主义在中

国的汇丰銀行，日軍接管后交由橫濱正金銀行管理；麦加利銀行由日本三井銀行管理。英商著名的食品工厂培林公司，被日軍接管后，即改为专制日軍軍用食品的工厂。美商德士古和美孚石油公司及英商亞細亞火油公司也被日軍接管。这三个公司的存油，被日軍作为軍用汽油，充分暴露了他們“以战养战”的阴谋。茲特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軍接管英美帝国主义主要企业的情况列表說明于下①：

### 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日本在上海方面接收之英美国籍工厂

名 称	国籍	管理方式	經 营 者
中国电气公司	美		
上海电力公司	美	委托經營	华中水电股份公司
沪西电力公司	美	委托經營	华中水电股份公司
上海自来水公司	英	委托經營	华中水电股份公司
上海煤气公司	英	委托經營	大上海煤气股份有限公司
平和洋行机器厂	英	委托經營	大陆铁厂
纪录机械制作所	美	委托經營	日本机械制作所
英国通用电气公司	英	委托經營	新华电气工厂
安迪生电料公司	美	委托經營	东京芝浦电气股份公司
中国紙版制品公司	美	設置管理人	王子制紙股份公司
永泰和烟草股份有限公司	英	設置管理人	丸三商工公司
美国烟草公司	美	設置管理人	华中烟草股份公司
美光火柴公司	美	設置管理人	华中振兴股份公司
精艺术行有限公司	英	設置管理人	三井物产股份公司
祥泰木行有限公司	英	設置管理人	三井物产股份公司
上海英商电气音乐实业公司	英	設置管理人	日本胜利留声机股份公司
中国肥皂股份有限公司	英	委托經營	日本油脂股份公司
白礼氏洋烛厂	英	委托經營	日本油脂股份公司
江苏药水厂	英	設置管理人	鍾淵紡織股份公司

① 參閱陈真等編：《中国近代工业史資料》第2輯，三联书店1958年第1版，第479~481頁。

名 称	国籍	管理方式	经 营 者
派德公司(药品)	英	設置管理人	东京芝浦电气股份公司
永光公司(油漆)	英	委托經營	大日本涂料股份公司
利达公司(印刷)	英	委托經營	
华懋洗衣公司	英	委托經營	公大紗厂
英美印花公司	英	設置管理人	上海精密机械工艺社
上海化驗室	英	委托經營	华中矿业股份公司
怡和啤酒有限公司	英	委托經營	中国啤酒公司
培林洋行(冷藏)	英	委托經營	日本水产股份公司
怡和冷气堆棧	英	委托經營	扬子蛋业股份公司
汉中有有限公司(冷藏)	英	委托經營	林兼商店
英国制蛋公司	英	設置管理人	扬子蛋业股份公司
班达公司(飲料)	英	委托經營	华中水产股份公司
正广和有限公司(飲料)	英	設置管理人	东方制冰股份公司
爱志尔物产公司(油脂)	英	設置管理人	中国食油公司
海宁洋行(制点心)	美	設置管理人	明华产业股份公司
怡和紗厂	英	設置管理人	在华日本紡織同业会
怡和杨树浦紗厂	英	設置管理人	在华日本紡織同业会
怡和公益紗厂	英	設置管理人	在华日本紡織同业会
綸昌紡織漂染印花有限公司	英	設置管理人	在华日本紡織同业会
德丰紡織公司	英	設置管理人	在华日本紡織同业会
保丰紡織公司	美	設置管理人	在华日本紡織同业会
合丰企业公司(紡織)	美	設置管理人	在华日本紡織同业会
安达紡織有限公司	英	設置管理人	在华日本紡織同业会
蜜蜂絨綫厂	英	設置管理人	华中羊毛工业組合
上海毛絨綫紡織有限公司	英	設置管理人	华中羊毛工业組合
英国羊毛产业公司	英	設置管理人	华中羊毛工业組合
尼可格斯毛絨厂	美	設置管理人	华中羊毛工业組合
隆茂洋行(打包)	英	委托經營	三菱倉庫信托公司
怡和洋行軋花厂	英	委托經營	华中棉花协会
棉华綫厂	英	委托經營	滿洲制綫股份公司
永宁公司(印刷)	美	委托經營	华中印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英美烟草托辣斯	英	另 定	另定
中华制鋼厂	英	設置管理人	日亞鋼业股份公司
霍浦克里浦塔爾工厂(医疗机械)	英	設置管理人	上海医疗机械制作所
中和灯泡公司	美	設置管理人	东京芝浦电气股份公司
美商恒丰机器厂	美	設置管理人	三井造船股份公司

名 称	国籍	管理方式	經 营 者
鴻和兴船厂	美	設置管理人	三菱重工业股份公司
馬勒造船公司及分公司	英	設置管理人	三井造船股份公司
美康克子呢帽坯厂	美	設置管理人	上海翔拔制帽厂
上海自来水用具公司	英	委托經營	上海机械工业厂
謀得利洋行	英	設置管理人	上海精密机械工艺社
养气鉄公司(制罐)	英	設置管理人	上海职工业組合
广大鉄公司(瑛瑛鉄器制造)	英	設置管理人	上海职工业組合
汇芳木材公司	美	設置管理人	三井物产股份公司
凤凰木行	英	設置管理人	三井物产股份公司
大美汽水公司	美	設置管理人	华中麦酒飲料水制造业組合
华昌公司(食油油脂)	英	設置管理人	中国食油公司
义利洋行(点心)	英	設置管理人	明华产业股份公司
怡和絲厂	英	設置管理人	三井物产股份公司
怡和机器有限公司	英	設置管理人	三井物产股份公司
太古洋行	英	設置管理人	东亚海运股份公司
鉅美猪鬃厂	英	設置管理人	岩吉洋行

1942年3月30日，日本帝国主义又以上海陆海軍最高指揮官名义将下列軍管理工厂委托民間經營<sup>①</sup>。

軍管理工厂名称	国籍	受 委 托 者
慎昌洋行杨树浦工厂	美	东京芝浦电气股份公司
永备电气公司	美	松下电气股份公司
上海造船公司董家渡造船厂	英	玉造船所
黄浦机器造船所	英	玉造船所
沙利文糖果公司	美	东洋制果股份公司
平和洋行酒精厂	英	东亚酿造股份公司
昌华玻璃有限公司	英	中华实业股份公司
上海啤酒有限公司	英	大日本麦酒股份公司
上海机器冰厂有限公司	英	日本水产股份公司
上海皮厂	美	华中制革公司
华懋工业制造厂	英	松华洋行

① 參閱陈真等編：《中国近代工业史資料》第2輯，三联书店1958年第1版，第481頁。

根据二表所列材料，可以看到太平洋战争发生后英美两国在华企业所受的打击和损失。至于法国在华企业，虽然由于具当投降希特勒，地位特殊而未被日军接管，但其重要企业如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也为日本所控制。据当时法电与日军协议，规定法电供给日军发电机、公共汽车、柴油、车胎、铁轨等等，并规定将该公司收入的30%归给日军。在1943~1944年间，该公司的一、二、三、四及九号5架发电机曾被日军劫去。其损失情况亦可想见。

总之，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太平洋战争后，英美等国在华企业可以说没有一个不被接收、不受破坏。其中有若干企业已完全毁于炮火或者被日本帝国主义搬走和卖掉。据初步估计，英美两国在华的所谓企业投资，从1937~1945年这几年中遭受的损失，包括毁坏、抢走、损耗、没收、并吞、卖掉的资财——不动产和动产，以及包括由英美帝国主义者自己在战前搬走的，至少占1936年英美两国在华企业投资的50%。这就是说，照前节的估计数字要打一个对折。1936年英国在华企业账面投资为545,077,800美元，美国在华企业账面投资为146,910,600美元；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英国的在华企业投资额估计只有27,288.9万美元，美国只有73,453,300美元。在1937~1945年这几年中，英美在华企业投资中约有20%是他们自己搬走或毁于炮火、或属于自然损耗的；有30%是被日本军管期间搬走、卖掉或没收的。其他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的损失，虽然没有英美两国那样严重，但由于中国战区太大，战争时间很长，它们所遭受的影响、损失以及自然损耗等等算起来，到1945年底其所谓投资大体也要比1936年时减少20%左右。

根据以上所述，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8年抗日战争以后，

至 1945 年底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企业投资，确实已经成为强弩之末了。日德两国的所谓在华投资，日德投降后，依照国际法和战时法规无疑地应当全部没收，很多原来属于中国人的企业应予收回。英、美、法等国的所谓投资，经过长期战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后，它们在中国残余下来的东西，也已经不多了。所以，到 1945 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如果还把帝国主义在华投资估计得比 1936 年高，那是不符事实的。

### 第三节 抗战胜利后帝国主义在 旧中国投资的残余

1945 年 8 月日本帝国主义正式投降后，英美商人以战胜国侨民自居，认为打败了日、德两个法西斯国家后，他们还可以在中国重操旧业，继续进行殖民剥削。但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人民的 8 年抗战，整个世界形势已经改变，远东形势变了，中国形势也变了。在中国的英美法帝国主义者一方面看到自己原来的工厂商店业已残破不全，另一方面看到中国革命力量的日益高涨，知道他们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已不能再恢复和发展。于是，自 1946 年起到 1949 年这一期间，帝国主义在华商人除少数美帝国主义者企图继续挣扎和扩大势力外，一般都抱消极态度，几乎全部都把总公司迁移到了香港、新加坡一带，在上海只挂分公司名义，并乘此机会抽走资金。同时，国民党反动政府于 1946 年间制定的新公司法<sup>①</sup>，也造成了帝国主义在华商人

<sup>①</sup> 参阅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2 辑，三联书店 1958 年第 1 版，第 308 页。

投机取巧、把总公司搬到香港去的机会。原来，许多帝国主义企业为了取得它们本国法律的保护，逃避中国法律的管制，一般都把总公司的空名义挂在香港或美国的达拉瓦州，实际营业则在中国，但中国政府对它们的一切活动却无权管理。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恶毒手法。这种侵略手法，对中国十分不利，我国有识之士，早就提出中国新公司法应当规定一条：凡外国公司在中国设分公司者，其总公司在它们国内必须有营业。这一条原已列入中国新公司法草案中，后因遭到美帝国主义的反对和干涉，宋子文和孙科这两个资产阶级大买办为了表示对帝国主义利益的忠诚，竟把最重要的这一条删除了。

结果，新公司法第七节第192条这样规定：“外国公司在中国设分公司经营企业的，其本国母公司可以不营业。”这一规定，对中国当然十分不利。1946年5月17日上海“星期五聚餐会”上就有人指出：“假如总公司资本1亿美金，而分公司资本没有规定，则中国分公司盈利时可随便呈报资本额，以逃避或减轻租税，如赚得400万元，按资本额2,000万元须抽税20%，如报4,000万，则抽10%，报8,000万仅抽5%。再说，股东红利所得税，因外国公司股东都在美国，亦都逃掉。不过，它本公司如在美国营业，亦须纳税给美国政府尚有可说，但公司法规定本公司不必定营业后，美国的捐税亦可逃掉，……外国公司在其本国既可完全免税，其在中国分公司亦可少报资本以逃税，……中国公司绝不足与之竞争，中国民族资本，将被摧残，而官僚资本将更进一步与外国资本勾结，操纵中国经济。”<sup>①</sup>这个批评，也把新公司法维护外国资本利益的皮剥开来了。

<sup>①</sup> 参阅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8年第1版，第308页。

这个维护帝国主义资本利益的新公司法公布后，一方面固然使帝国主义企业在中国“营业”得到了便利，可以持帝国主义特制的“中国贸易法”继续进行投机剥削；另一方面，也加速了原来设在中国的帝国主义企业把总公司迁移到国外，“合法地”在中国挂分公司招牌，这样它们的一部分资金也就乘机逃往国外了。最明显的是，抗日战争前，怡和洋行垄断集团在上海直接经营和有投资关系的企业就有14个，但到1948年，则只剩7个了。又新沙逊垄断集团在抗日战争前，它侵略活动最猖狂时，在上海直接经营和投资控制的公司不下30个，其中有中国公共汽车公司、中国钢车制造公司、霍葛钢品公司、扬子银公司、九个地产公司；但抗战胜利后，则大部分倒闭或结束，仅剩沙逊银行、安利洋行、上海啤酒公司及六个地产公司了。

所以抗日战争胜利后，一般说来，帝国主义在华企业投资是在继续减少，继续走向没落的。

但是，如果认为帝国主义会自动放弃对中国的侵略，那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在1946~1947年间，美、英帝国主义也还野心勃勃，仍与官僚资本勾结继续在中国维持殖民剥削。例如1946年春，美帝国主义与官僚资本合作，曾计划在南京、上海开设一个年产10~20万辆汽车的制造厂；流氓陈纳德与四大家族勾结，在上海设立了一个声势浩大的中美实业公司，企图搞工业品制造、农产品运销，操纵进出口贸易等。英国的罗斯罗伊厂也曾计划在上海利用官僚资本，设立煤汽轮机及喷射推进飞机引擎厂等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公开给蒋介石50亿美元的“援助”<sup>①</sup>，直接干涉中国内战，更表明了它的垂死挣扎。但帝国主义

<sup>①</sup> 参阅1946年5月7日、28日《申报》。

这一切挣扎，都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及至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美、英、法帝国主义者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革命胜利已成定局，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已不能在中国维持下去，于是它们把可以移动的物资如轮船、普通商品、股票、证券、金银等等，都大规模地搬到香港、印度、美洲、南非等处。这就是英、美商人所说的“大撤退”。经过大撤退后，帝国主义留在中国的企业投资则已微乎其微，除了一部分陈旧机器和多年失修的破旧房屋以外，已经谈不到什么投资了。

\* \* \*

总之，解放以前的一百多年中，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了残酷的侵略和榨取，我国人民被掠夺去了无数的金钱和物资，遭受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奴役、迫害和浩劫。但我国人民是勤劳、勇敢和坚强的人民。帝国主义者压迫了我们一个多世纪，我国人民也始终英勇不屈、前仆后继地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了一个多世纪，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八年抗日战争到三年解放战争，都表现出了中国人民敢于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斗争的顽强不屈的精神。所以，解放以前一百多年，是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过程，同时也是我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过程。

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说过：“华南人民在反对外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情绪本身，似乎表明对古老中国所处极度危险的一种觉醒。不要过多少年以后，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亲眼看到全亚洲新纪元的曙光。”<sup>①</sup>这个天才的预言，今天已经完全实现了。中国人民的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版，第79页。

伟大領袖毛澤東同志于1949年9月21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說：“……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中國人從來就是一個偉大的勇敢的勤勞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這種落伍，完全是被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反動政府所壓迫和剝削的結果。一百多年以來，我們的先人以不屈不撓的鬥爭反對內外壓迫者，從來沒有停止過，其中包括偉大的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辛亥革命在內。我們的先人指示我們，叫我們完成他們的遺志。我們現在是這樣做了。我們團結起來，以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內外壓迫者，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了。我們的民族將從此列入愛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態工作着，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立起來了。”的確，我們這個偉大的足以自豪的民族已經完全站立起來了！我們已經推翻了過去壓在頭上的三座大山，徹底消滅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勢力。

中國人民已經英武地站立起來。帝國主義耀武揚威的日子永遠地一去不復返了。

## 附录一 各国货币折合率

旧中国的货币单位极端混乱，各地区間又互不統一。在1856年以前，一般以銀元为单位，以后則改以銀两为单位。至1933年废两改元后，又以銀元为单位。至1935年，則改以法币为单位，与英鎊挂鈎，变为英国货币的附庸。至于中国货币与各国货币之間的汇率，完全操纵于帝国主义之手，几乎經常在变动。过去一百多年中，由于金銀比价及中外货币汇率之不断变动，中国吃尽了苦头。茲为帮助讀者了解各国货币折合率，特摘录折算表于下<sup>①</sup>，以供参考。

---

<sup>①</sup> 参閱吳承明編：《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資》，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版，第181頁。

## 貨幣折合率 (1894~1948 年)

(各種貨幣每一單位折合美元)

幣 別	1894~ 1902年	1911~ 1914年	1925年	1930年	1936年	1941年	1948年
英國 英 鎊	4.9	5.0	5.0	4.86	4.97	4.03	4.03
法國 法 郎	0.2	0.2	0.07	0.039	0.06	0.02	0.003
日本 日 元	0.51	0.53	0.50	0.50	0.29	0.23	0.003
德國 馬 克	0.24	0.24	0.24	0.24	0.40	0.40	0.30
帝 俄 盧 布	0.51	0.51					
荷蘭 弗 羅 林	0.4	0.4	0.25	0.4	0.64	0.53	0.38
印度 盧 比	0.35	0.35	0.35	0.36	0.38	0.30	0.30
加 拿 大 元				1.00	1.00	0.91	1.00
銀元及偽法幣	0.51	0.50	0.50	0.30	0.30	0.30	0.30
美 平 兩	0.77	0.75	0.75	0.45	0.45	0.45	0.45
庫 平 兩	0.75	0.74	0.74	0.44	0.44	0.44	0.44
公 砵 兩	0.71	0.70	0.70	0.42	0.42	0.42	0.42
行 化 兩	0.74	0.73	0.73	0.44	0.44	0.44	0.44
規 元 兩	0.70	0.69	0.69	0.41	0.41	0.41	0.41
洋 例 兩	0.72	0.71	0.71	0.42	0.42	0.42	0.42

(注) 法國法郎: 1938年~0.0283, 1939~0.025。

英 鎊: 1939~4.44。

比國法郎: 1936~0.0334。

## 附录二 英美帝国主义历年运进中国的 鴉片价值表

英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大量贩卖鴉片，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件大事，尤其在我国近代經濟史上是特別值得重視的一件大事。因为鴉片問題不仅引起了两次战争，而且直接影响了我国國民經濟的发展，毒害了我国无数的人民。关于英美帝国主义在一百多年中輸进中国的鴉片总值，本书曾估計为 25 亿銀两。现为証实这个估計，特根据手边所有材料編成两张表附录于此。第一表系鴉片战争前的数字。从 1816~1837 年間的 19 年中(內缺 3 年)，共計輸进鴉片 213,899 箱，价值 188,514,393 元。第二表系鴉片战争以后的，从 1840~1915 年間的 52 年中(內缺 23 年)，帝国主义公开輸进中国的鴉片总值为 1,624,639,249 两，平均每年 31,243,062 两。不公开的走私鴉片，还没有計算在內。

(一) 鴉片戰爭前輸入鴉片量的估計①

(1816~1837 年度)

年 度	數 量		價 值	
	箱	指 數	元	指 數
1816~17	3,698	77.4	4,084,000	70.5
1817~18	4,128	86.4	4,178,500	72.1
1818~19	5,387	112.7	4,745,000	81.9
1819~20	4,780	100.0	5,795,000	100.0
1820~21	4,770	99.8	8,400,800	145.0
1821~22	5,011	104.8	8,822,000	152.2
1822~23	5,822	121.8	7,989,000	137.9
1823~24	7,222	151.1	8,644,603	149.2
1824~25	9,036	189.7	7,927,500	136.8
1825~26	9,621	201.8	7,608,200	131.3
1826~27	10,025	209.7	9,662,800	166.7
1827~28	9,525	199.3	10,425,190	179.9
1828~29	14,388	301.0	13,749,000	237.3
1829~30	14,715	307.8	12,673,500	218.7
1830~31	20,188	422.3	13,744,000	237.2
1831~32	16,225	339.4	13,150,000	226.9
1832~33	21,659	453.1	14,222,800	245.4
1833~34	19,362	405.1	12,878,200	222.2
1837~38	28,307	592.2	19,814,800	341.9
十九年共計	213,899	—	188,514,393	—

① 參閱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科學出版社 1955 年  
第 1 版，第 23 頁。



2 022 0223 1

**(二) 鴉片戰爭后帝國主義歷年運進中國的鴉片價值表<sup>①</sup>**

(1840~1915年)

(單位: 兩)

年 次	類 別	價值統計	年 次	類 別	價值統計	年 次	類 別	價值統計
1840		10,309,500	1882		26,746,297	1900		31,090,811
1842		16,754,000	1883		25,345,613	1901		32,936,579
1844		14,333,500	1884		26,150,241	1902		35,456,656
1846		17,036,000	1885		25,438,914	1903		43,830,892
1848		23,000,000	1886		24,988,561	1904		37,094,172
1850		26,462,500	1887		27,926,865	1905		34,070,021
1853		33,250,000	1888		32,330,506	1906		32,285,377
1857		36,150,000	1889		30,444,869	1907		28,653,653
1858		37,450,000	1890		28,956,329	1908		34,226,337
1859		37,900,000	1891		28,333,156	1909		35,744,979
1860		29,300,000	1892		27,418,152	1910		55,410,850
1870		26,000,000	1893		31,691,399	1911		48,256,745
1876		28,018,994	1894		33,336,067	1912		47,706,774
1877		30,278,577	1895		29,164,800	1913		41,023,012
1878		32,262,957	1896		28,651,592	1914		37,364,736
1879		36,536,615	1897		27,901,056	1915		24,700,088
1880		32,344,628	1898		29,255,903			
1881		37,592,208	1899		35,792,768			
合			計:			1,624,639,249		

① 本表系根據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冊(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9版)的有關資料和黃炎培、龐涪編纂的《中國商戰失敗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17年版)的有關資料編成。表中1840~1860年的數字均按范本第81、123頁中的鴉片烟箱數乘以500兩而得;1870年的數字則直接從范本第215頁中轉引;1876~1915年的數字則從黃本直接引得。

關於鴉片的烟價,各個時期、各個年份相差很大,甚至早晚市價不同,情況十分複雜。本書所用各年烟價材料,凡是能找到具體數字的,則照錄;有些年份只有箱數而找不到烟價數字的,則加以折算。其折算標準,鴉片戰爭以前的年份,參照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冊的折算標準,每箱折價641元。鴉片戰爭以後的年份,則綜合各年材料,平均折價為每箱500兩。

